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Researching on David Harvey's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 大卫·哈维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张佳著

人民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主编)

# 大卫·哈维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Researching on David Harvey's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ISBN 978-7-01-013376-8



9 787010 133768 >

定价：49.00元



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Researching on David Harvey's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 大卫·哈维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张 佳 著

责任编辑:洪 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张 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13376-8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B0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306 号

## 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DAWEI HAWEI DE LISHI DILI WEIWUZHUYI LILUN YANJIU

张 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376-8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 第一批：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吴宁著，已出

《批判的社会理论及其当代重建——凯尔纳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颜岩著，已出

《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郭剑仁著，已出

《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王雨辰著，已出

### 第二批：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倪瑞华著，已出

《民主理论的批判与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张翠著，已出

《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熊敏著，已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王雨辰主编，即出

《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王雨辰著，已出

《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严泽胜著，已出

《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张佳著，已出

##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

王雨辰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算起,至今也不过 25 年时间。然而,这 25 年时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视阈的不断拓展,使得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对于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加深刻地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回顾和分析上述三个特点形成的过程和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学术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标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是出于理论自觉,而“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

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时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sup>①</sup>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存在着双重的错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虽然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但总的说来我国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起步阶段，加上“左”的教条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等话语系统一时还很难为我国学术界所理解；从理论背景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做是打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为日后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些准备性工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6年以后，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和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哲学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批判地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得失，体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更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理论视角的变化，使人们对于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热潮，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建构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图景。这场争论不仅使学术界熟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

<sup>①</sup> 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sup>①</sup>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sup>②</su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sup>③</sup>无论是否存在这种解读模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生态批判等,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使得学术界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研究其社会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二是研究方式从过去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和追踪研究,学术界不仅出版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多部研究专题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追踪研究方面,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阈中,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并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回顾我国学术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给我们比较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立足于怎样的哲学方法论来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② 张一兵:《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③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认识和评价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以此为裁判权，那么就势必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事实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流派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而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跳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也需要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也暗含问题。其一是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它到底是否反对列宁主义。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的确和恩格斯、列宁是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否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部分学者为了避免研究之前预先设定主观框架，于是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地域性概念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有特殊内涵的，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产生，以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目的的一股思潮。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的压制之下，才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不论其理论是否正确，但是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这其中既有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存在着仅仅只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保持名义联系的后现代思想家。显然，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思潮在价值和意义上根本无法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其二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并不能说已经很深刻。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问题研究、人物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事实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群体在不断缩小,更多的是引进和评介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冷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需要我們认真思考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笔者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重要研究方向。自 1981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以来,就一直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研究方向。2006 年我们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我们先后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年轻博士,形成了学术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团队,并把研究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为主体,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学科点,被纳入学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这套丛书就是我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术团队部分教师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或者他们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 目 录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王雨辰 /1

导 论 /1

第一章 哈维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13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13

一、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弹性”生产方式的转换 /13

二、全球化语境中空间问题的凸显 /16

三、西方社会城市危机的出现 /19

第二节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21

一、社会理论空间维度缺失的原因 /22

二、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理论和时代背景 /24

三、社会理论空间转向中的哈维 /26

第三节 哈维空间理论建构的思想来源 /29

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29

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34

三、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41

四、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46

第二章 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54

第一节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缘由 /54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 /54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60

第二节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 /62

- 一、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62
- 二、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路径 /70
- 第三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 /76
  -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77
  - 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79
- 第三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 /83
  - 第一节 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框架 /83
    - 一、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来源——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83
    - 二、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切入点——使用价值 /89
    - 三、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主题——空间生产 /91
  -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93
    - 一、资本初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93
    - 二、资本次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95
    - 三、资本第三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99
  - 第三节 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 /104
    - 一、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地理集聚与分散 /104
    - 二、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 /105
    - 三、全球空间的不平等结构体系 /106
- 第四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間批判理论 /108
  - 第一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 /108
    - 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 /109
    - 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和矛盾 /111
    - 三、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阶级斗争 /113
  - 第二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批判 /118
    - 一、全球化空间与资本积累 /118
    -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121
    - 三、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 /132
  - 第三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空间的批判 /140
    - 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141

二、灵活积累体制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143
三、后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	/145
<b>第五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放政治理论</b>	<b>/151</b>
<b>第一节 当前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挑战和困境</b>	<b>/151</b>
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151
二、西方左翼理论中“阶级政治”退化的趋势	/153
三、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与竞争	/155
<b>第二节 哈维解放政治理论的核心理念</b>	<b>/156</b>
一、正义的理念	/156
二、差异化的主张	/160
三、生态的视角	/163
<b>第三节 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探寻</b>	<b>/170</b>
一、替代性方案的设想——辩证时空乌托邦理想	/170
二、替代性方案的策略	/173
三、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实现途径	/179
<b>第六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b>	<b>/184</b>
<b>第一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定位</b>	<b>/184</b>
一、哈维与晚期马克思主义	/184
二、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	/188
<b>第二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b>	<b>/194</b>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195
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	/198
三、与苏贾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异同的辨析	/201
<b>第三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b>	<b>/204</b>
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得失	/204
二、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207
<b>结 语</b>	<b>/211</b>
<b>附录一 大卫·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综述</b>	<b>/218</b>
<b>附录二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特征</b>	<b>/227</b>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51

# 导 论

## 一、问题的出场

人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交织成的语境中得到不断地创新、嬗变和维系。16世纪之前,人类以部落为单位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活动,由于当时人类实践和认识能力有限,对于自己所生活地域之外的世界无法认识,人类也就没有去过多地关注空间,形成一定的空间观念。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大航海和美洲、澳洲大陆的陆续发现,地球变成了地表面积确定的世界,人类不再局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地理空间而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关系,也推动了近代空间观念的形成。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各国掀起了对美洲大陆的疯狂殖民活动,地理空间扩张这一空间实践活动带给人们强烈的空间体验,而时间在当时对历史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人类的时间体验是匀速的,因此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笛卡尔、霍布斯等讨论的主要是空间而不是时间。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在交通速度不断提高而地理空间距离不变的情况下,空间越来越缩小,时间和速度的加快使地理空间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因此,在整个近代认识论那里,空间是被看做静止的容器,这就造成从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大多沉湎于历史的想象,而漠视空间,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和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对历史情境的过分强调掩盖或扼杀了空间想象力。20世纪空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之外,当代空间获得了扩张的新途径,在生活继续加速的同时,空间也在扩张。都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hyperspace)<sup>①</sup>与其他空间形式相互碰撞、

<sup>①</sup> 超空间是后现代主义空间观念,超空间的显著特点是空间与时间分离了,表现为空间的非连续性和事物的虚拟性。

叠加、交织在一起,改变和重构着人的活动方式。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和艺术领域,人类都经历了空间体验的剧烈变化,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的空间观念和认知习惯,空间的重要性才被重新认识。随着资本主义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灵活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空间规划”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围绕城市空间的生产、消费引发的城市冲突和危机日益严重,全球地理空间扩张和空间争夺愈演愈烈,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共时性、网络化、流动化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发展形态使得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牵连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实践活动。

空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使之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空间转向。理论家们将目光从时间与历史上转移到空间和地理上,从空间的视角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作出回应与理论探讨。我们如果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可以发现从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开始,空间也逐步成为一个核心主题。围绕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产生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阿明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多斯桑托斯等人的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弗兰克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空间思想资源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逐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经验以及城市社会学、地理学新潮融合,最终成为洋洋大观的空间化潮流。在这股空间化思潮中,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成为理论家们共同探讨的主题。在叩问资本主义何以能够从马克思所处的充满竞争的工业时代生存至今,无论是列斐伏尔、福柯,还是哈维、苏贾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认为,占有空间并生产出相应的空间形态是资本主义淡化内在矛盾、摆脱生存危机、获得新生的工具性力量。但从研究的角度和取向来看,他们还是有所区别的,主要形成了三条研究路向:第一,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着重考察了空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福柯看来,“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形式的基础,又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sup>①</sup>城市中的空间和建筑布局就是资本主义权力运行的隐秘机制,资本主义借助于空间来锻造人,规训人,统治

<sup>①</sup> [法]福柯:《空间、知识、权力》,见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14 页。

人,使其为资本主义服务。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规训性空间并置的社会,是通过空间来进行统治和管制的社会。可以说,福柯是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对人的主体性的破坏和摧残这一问题时发现空间的政治功能的。第二,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尔等人为代表的都市社会学研究。强调从空间视角来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建构,关注城市社会运动和都市革命,对都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了理论和政治重视。第三,以哈维、苏贾等人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或后现代地理学研究。这一研究路径更关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空间特征,从地理学角度思考、探讨了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地理状况深刻影响着生态、性别、种族、阶级、国家等政治主题,从而使空间思想在全球化这个新的背景下得到充分深入的展开。在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学者中,哈维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独特的地理学想象占据着社会空间理论的重要位置。

## 二、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 1. 大卫·哈维的生平与著述

大卫·哈维 1935 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的吉林厄姆(Gillingham),1961 年获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1961—1969)、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系(1969—1989,1993—2001)、牛津大学地理系(1987—1993),现为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杰出的人类学和地理学教授。大卫·哈维的学科立脚点是人文地理学,以地理思维之长(空间审视),见人文社会之短(批判弊病)是哈维治学的主要特点,因此他被西方学界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领军人物,其思想历程分为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

20 世纪 60 年代,在人文地理学界发生的一场“计量与理论革命”的辩论中,哈维作为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出场。1969 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使他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地理学中实证主义的代言人。1969 年年底,哈维移居巴尔的摩,发现不公平、种族主义、剥削等现象随处可见,在这种背景下哈维开始转向激进地理学。1973 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是哈维思想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本书中,哈维提出地理学不能再保持所谓的“客观”立场,空间

分析必须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中,这实际上标志着哈维抛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从1973年到1982年这段时期,哈维用了长达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其理论成果就是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of Capital*)。在这本著作中,哈维从空间视角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详细论证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这就为其以后的全部研究奠定了方向与基础。此后,哈维在空间研究中始终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產方式的分析方法来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突出现实问题进行研究,陆续出版了《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意识与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和《后现代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996年,哈维出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方法论导论。哈维确立了以“过程”为中心的辩证法,在这一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对话语的作用、环境的本质、时空构造的基本机制以及今天政治诉求的可能性等一系列社会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标志着一种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诞生。此后,哈维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上。2000年出版了《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旨在说明资本在全球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给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巨大的困难。面对资本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带来的挑战,哈维坚信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的,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探寻全球化时代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可能性道路。为揭露当代西方右派所宣扬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哈维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出版了《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和《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分析,哈维揭示出它们不过是资本积累的政治工具,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给人们带来的不是自由、尊严,而是剥削、压迫和灾难,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由此,哈维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另辟替代性道路。综观哈维的理论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哈维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建构是沿着地理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思路来完成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的结束。相反,随着空间问题的日益突出,哈维的学术活动



依然活跃,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2.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主旨

当前,空间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哈维一生致力于将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紧紧围绕“资本主义是怎样生产它自己的地理学”这一问题来展开其理论研究。他确立了“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方法论原则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独特的地理现象。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哈维发现,资本主义的地理状况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必然产物。在资本逻辑推动下,资本运行规模逐渐从工厂内部空间的调整,到城市空间的构成与重组,最后到全球空间的最终形成,资本积累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历史地理空间的问题。哈维从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机制及矛盾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必然性,从而揭示出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地理景观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哈维以其资本积累理论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状况的分析到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新自由主义体制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再到探求全球化时代的解放政治学,建构人类理想的社会空间模式。可以说,哈维一直积极地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勾勒资本主义的变迁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试图在晚期资本主义环境下穿透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和弹性化的复杂格局,积极探寻如何彻底消除空间物化,探索出一条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解放道路。

哈维空间理论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他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抽象的探讨,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空间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哈维不仅秉承了列斐伏尔所开创的空间生产理论的旨趣,而且还具体解释了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以及它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他通过引入地理空间的视角,深刻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空间修复”完成了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城市化、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都是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的具体空间手段和结果。可以说,“空间”发挥着转嫁危机和深化资本积累的双重作用。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涵盖了从“城市化”、“全球化”到“日常生

活”、从“资本积累的经济空间”到“后现代的文化空间”等多种空间样态，他对资本主义各种空间化实践都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诠释，并提出了许多重要概念，比如“时空修复”、“时空压缩”、“不平衡地理发展”、“剥夺性积累”等，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空间视角加深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解。哈维在进行空间理论研究中，一方面始终将自身的理论逻辑严格限制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另一方面引入地理空间视角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最终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从而开辟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sup>①</sup>

### 三、研究意义

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重视和研究对于我们全球化时代如何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第一，哈维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众所周知，时间与空间是人类体验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两个重要尺度。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具有历史（时间）方面的偏好，而对空间（地理）重视不够。随着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空间、地理、城市等问题凸显，这些新问题的出现需要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地理布局的全面逻辑中来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和革命的理解需要有地理学的帮助。因此，哈维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旨在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增强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力。第二，哈维在研究空间问题时提出过程辩证法，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和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哈维认为，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教条由于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

<sup>①</sup>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新进展的左派学术思潮应然而生。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和根本观点，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框架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得出结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是后工业社会无法超越的。

以历史的客观规律替代了历史过程,以“客观规律的最后结果”替代了“作为过程的时间”,因此,它只重视对资本逻辑历史生成的宏观把握,而不会对历史生成过程中每一个当下的资本主义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进行微观具体的剖析,从而湮没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含的空间维度。应当说,哈维从空间角度再次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方法而不是结论,这提醒我们只有摆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才能真正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第三,哈维着重从空间和社会生产的关系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哈维分析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几个典型特征:空间生产、后现代文化、生态环境和城市问题等。哈维把马克思批判理论对工人车间生产的关注转向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关注,将分析范围由生产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从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第四,哈维对当代重要理论主题(如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等)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带给我们全新的启示。哈维从空间视角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具新意的见解,这使得他的理论探索对于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总的来看,哈维的空间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哈维这样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国内对其关注和研究显然还不够全面深入,因此关于哈维思想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可贵的启示。第一,从全球化的空间维度来看,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使资本的逻辑和空间生产成为全球性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分配、空间消费方面均处于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空间转移和扩张的对象。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如何利用好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空间上转移到我国国内的资本,另一方面如何在全球空间中谋求空间正义,改变在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的劣势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第二,从城市化的空间维度来看,中国

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的凸显期,这种矛盾集中体现为城市发展的区域空间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以及城市内部围绕城市空间生产和使用的空间矛盾愈益激化。因此,中国的发展现实迫切需要我们z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少走弯路。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无疑为认识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矛盾提供了一面镜子,启发人们参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考察现实变化,在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减少和免除西方社会曾出现的种种异化、失调和危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总之,哈维的空间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空间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四、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本书将哈维置于全球化和社z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中,依照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建构路径——理论基础——理论主题——理论评判的研究思路对其理论得失展开探讨。本书以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切入点,展开对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哈维发现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密切关系,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是对资本借由空间生产而造成的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的揭露。因此,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它使得哈维的空间理论不同于西方其他空间理论学者拘泥于抽象的谈论空间本身的视角,而能够始终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揭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空间理论,“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城市化批判”、“全球化批判”和“后现代文化批判”从属于空间生产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空间政治理论”则是其理论归宿。因此,本书将从研究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五大理论主题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比较它与西方其他空间理论的异同,阐明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的必要性、可能性。并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社z会空间理论的主要内容、理论特质和当代指向。笔者认为,对哈维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评价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有力地推动和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促使我们思考和发掘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被长久压抑的空间视域，他所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因热衷于追逐变幻无常的文化地理景观而忽视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批判，又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从而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二是它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实质的重新阐释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哈维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过程辩证法，使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流于抽象空洞的批判，而能够深入到当代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具体过程中，分析批判产生于这一过程中的物质空间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从而真正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下列六章和结语构成。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哈维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生产”的变革，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方式的确立与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使得资本的空间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空间规划”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由空间生产所推动的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危机和各种空间矛盾逐渐凸显。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社会理论呈现出空间转向。受列斐伏尔、卡斯特尔、福柯等人的影响和启发，哈维意识到“空间”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视角。从哈维空间理论的思想渊源上看，他对资本积累和空间生产的分析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他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学说深受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的影响。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研究成为哈维空间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哈维正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批判性地继承了理论先驱者们的空间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第二章分析了哈维为何以及如何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哈维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机械化的解读模式只强调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性，而不去关注现实的历史生成过程中的具体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由于缺失了空间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抽象空洞的结论，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化、空间化的新现实展开有力的批判。为挽

救历史唯物主义,恢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发展中被极大忽视了的的空间维度,哈维提出了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任 务。在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哈维首先做的就是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他强调从“过程”角度来重新恢复马克思辩证法具体的总体的视野。以过程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原则,哈维坚持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从而发现了资本积累过程是产生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现象和问题的根源,并揭示出当代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之间的矛盾关系。总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是哈维整个理论的根基,也是哈维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

第三章概述和分析了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积累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哈维也是从考察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体制的改变入手发现了资本积累与空间构型生产的密切关系,因此,资本积累理论是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哈维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使用价值”即固定资本为理论切入点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分析。通过对资本三级循环中资本积累危机的表现形式、根源、解决途径等的详细探讨,阐明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矛盾。针对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哈维将其归纳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并对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展开了批判。

第四章分析了哈维是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的。哈维紧紧抓住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结构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空间视角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展开了全面深刻地批判。面对日益激化的城市矛盾和危机,哈维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入手揭示了城市危机产生的根源,即城市空间生产,而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矛盾作用的结果。哈维同样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是如何产生、形成和不断扩大深化的。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而为过剩资本寻找赢利的新空间。哈维指出,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剥夺性积累”为主要手段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和侵占,导致全球空间结构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

着矛盾和对抗。面对当代西方社会最凸显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哈维同样从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入手来解释当代人体验时空的方式,揭示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特点和内在机制,从而开辟了一条批判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道路。

第五章论述了哈维解放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当前社会主义遭遇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下,哈维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基本立场,始终关注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是以正义和差异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因此,本章重点探讨了哈维政治理论中的正义、差异和生态三个核心理念。虽然当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还难以实现哈维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思考和探索。哈维设计了辩证时空乌托邦理想,以使人们产生将身体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的意愿,从而恢复人的尊严和普遍性权利。总之,哈维认为,当前解放政治的现实可行性方案只能是在一种适当的规模之上寻求把各种特殊利益结合起来的反对普遍物化和资本统治的阶级斗争。

第六章系统评析了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得失。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来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规律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将空间视角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中,从而更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因此,哈维是从属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面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以哈维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始终未抛弃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目标,而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去探寻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和全人类解放的实现道路。因此从本质上说,哈维的解放政治学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是分道扬镳的。当然,哈维的解放政治学说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哈维对现代性的空间反思和批判对中国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借鉴意义。

结语部分主要阐明了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后工业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



物的哈维,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视与重新阐释,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对无产阶级总体解放道路的探寻都表明其理论探索始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了“三个结合”:第一,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将哈维的空间理论放置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中来考察。第二,对比研究和述评相结合。将哈维与其他空间理论学者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研究,在分析他与其他思想家理论之间的异同中,凸显其理论特质,评价其理论得失。第三,谱系梳理与文本解读相结合。以哈维的原著为文本基础,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把握其理论的真实含义,对其理论作出准确的定位。



# 第一章 哈维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随之在社会各个方面引起了相应的变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弹性生产”的转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革新,促进了资本、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更加灵活。在资本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空间规划引发了一系列空间问题和空间矛盾,使得社会理论家们逐渐意识到空间“失语”所造成的社会理论的解释力和想象力的缺陷,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阐释。其中,哈维的地理学唯物主义以其独特的视野和问题域在当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一、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弹性”生产方式的转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使“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步确立主导地位。“福特主义”是因福特发明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而得名的生产制度。最早使用“福特主义”一词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是在讨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一问题时指出,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造成了现代国家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特征,并使国家的控制与市民社会的建构联为一体,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与霸权的获得联为一体。<sup>①</sup>真正把福特主义作为

<sup>①</sup> See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trans, By Quintin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p.2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来加以系统研究的是法国的调节学派。调节学派认为,从1945年到1973年间的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市场和劳动控制是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消费和国家福利主义。

福特主义在20世纪30至50年代,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进程在美国开始形成。福特主义调节模式的成功实施和推广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积极的影响:第一,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生产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第二,劳动合同的长期性、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需求,保证了国内市场的长期稳定。第三,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有效调节了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第四,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顺利进行资本积累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随着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长达20年经济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

然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鼎盛之后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一系列事件的冲击(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社会性动荡等)扰乱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正常运行的环境,使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缺陷完全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第一,生产能力扩大出现瓶颈,许多产品和生产技术皆已进入成熟期,很难再有突破性增长。同时,由于新市场的缺乏以及消费能力的普遍紧缩抑制了新技术的研发。第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分配和劳动契约的刻板无法激励劳动组织方式的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第三,大规模生产体系和固定资本投资项目庞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投资风险增大。第四,市场饱和以及消费模式向多样化的转变,使标准化、僵硬化的生产模式难以适应,出现生产能力和市场容量之间的落差。第五,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难以为继,造成政府财政困难。可见,福特主义的发展潜力在现存的调节模式内已被耗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效率、稳定性和协调能力,其生产率和利润率开始下降,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空前的危机。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这种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同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一起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

其核心就是用灵活弹性的生产方式替代僵硬刻板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西方社会由此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弹性生产”问题较早出现于查尔斯·F.萨贝尔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983年就提出“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这个术语来解释后福特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他肯定“弹性专门化”生产体系是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的一种生产倾向，只是由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义”所遏制而没有得到发展。<sup>①</sup>弹性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工业范式上，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系愈来愈无法适应变化快速的市场需求，而逐渐缩小或分解为多个小公司，少量多变的形态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特色。在科技发明上，大公司也不再是主要来源，灵活多变的中小企业逐渐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在行业结构上，伴随着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出现了许多新兴生产行业和生产部门。为适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咨询服务、营销策划等发展迅速。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构。一方面，从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向着日益依赖非全日制的、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的明显转变；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劳动体制得以复活和生长起来。第四，在调节模式上，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代之以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措施，让市场自动发挥调节的功能；同时，大批量削减福利预算，降低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第五，在国际分工上，由于弹性生产、跨国合作和资本流动的快速化，新的国际分工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区位分明，而是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生产相类似的产品。

弹性生产方式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建构一个工厂帝国就可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但帝国化的工厂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大，利润率也就随之下降。而弹性生产方式则要求资本主义通过加速资本周转时间，消除资本空间扩张障碍来实现资本积累。这一过程是通过以下三方面的发展来完成的：第一，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形成了地理上流动且回应灵活的更加紧密

<sup>①</sup> See Charles Sabel,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Re-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Ash Amin, *Post-Fordism: A Reader*, Blackwell, 1994, p.104.

的组织,使产品创新的速度加快,生产和消费的周转时间减少。第二,信息革命和交通通讯革命极大地消除了信息、资本、货物、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障碍,使生产和设计指令能及时发送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第三,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重组和金融调整加速了资金在全球地理上的流通,使资金得以瞬间来回穿梭于各经济体之间。哈维对这一变化描述为:“一方面是朝着金融集团的形成和惊人的全球势力的经纪人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活动的迅速激增和分散以及通过创造全新的金融工具和市场而进行的流动。”<sup>①</sup>

弹性生产方式的确立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不仅加速推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大规模集中生产通过垂直转包方式向世界各地进行分布,改变了资本的空间布局,在这一资本重组过程中,每一地区都被纳入到了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中,从而深化了资本的全球化。而且由于资本、商品、劳动力的灵活流动使人们深刻体验到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短暂和变动不居,因而,强调去中心性、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政治成为当今西方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使后现代主义不断垂直深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总之,资本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使得资本的空间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空间规划”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哈维正是紧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新变化,从空间维度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展开批判,从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空间批判理论。

## 二、全球化语境中空间问题的凸显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方式的确立与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借助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改进,空间扩张和渗透愈益剧烈和广泛,整个地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连为一体了,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意味着空间障碍在不断地被克服,地球上的人类生活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凭借弹性生产,资本流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它基本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地流向任何地方,

<sup>①</sup> [英]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7页。

这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流通的全球网络,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在这个全球体系中,人类的经济交往与联系日益密切,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交流、学习与反思,这都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

然而,资本在塑造同质化的全球空间时,也塑造了一个等级化的全球空间体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不同地理空间利润率的巨大差异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在全球范围内不停地流动。不过,与资本在社会各部门之间流动造成各部门利润率趋向于平均化这个结果不一样,资本的全球交往实践活动塑造出一个等级化的空间秩序。换句话说,全球性的空间生产活动造就出一个被各种政治结构分隔的、由一体化的生产结构组成的巨大的不平衡空间网络体系。在这一不平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中,产生了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现存的世界体系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地区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外围地区则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日益依附于中心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则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迫之上的。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到全球性市场经济中的,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空间结构关系。

在以知识资本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时代,<sup>①</sup>后工业文明造就了新的全球

① 任平在《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一文中,对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差异作出了详细说明。他认为,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不同。旧全球化时代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而新全球化则是以新科技革命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其二,两者的结构构成内涵不同。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级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新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结构则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两极格局。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来主导全球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新全球化时代,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格局并存,两极之间保持着很大张力。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全球化时代,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在新全球化时代,主要借重于互联网、话语生产以及文化传播等虚拟手段。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旧全球主义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来规范全球化结构;新全球主义则主张多元、强调差异。

空间生产布局,发达资本主义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加强着全球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关系,凭借知识、信息、人才、技术、文化等各种非物质手段对落后国家进行控制和掠夺,导致了诸多空间问题和空间矛盾的产生。西方发达国家积几百年工业文明的发展成果,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逐步实现了从实体生产向虚拟生产的过渡。由此,在工业化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之后出现了资本知识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塑造了当今全球空间生产布展的基本格局。借助于知识霸权,发达资本主义开始重构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布局。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不断将工业产业、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造成资本本土的“产业空洞化”,也即哈维所说的“去工业化”;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城市逐步脱离地方民族工业生产体系,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上的一个结点,一座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孤岛。同时也加速了落后国家的农业地区转变为制造业积聚的城镇。在这一新的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发达国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虚拟化、信息化、生态化特征逐渐彰显,而发展中国家中的实体性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则成为必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全球制造业空间布局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破坏性后果,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速推进的城镇化使农地资源迅速消失,转向工业用途,迫使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侵害了城市居民的空间权益,引发了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支配和空间消费的激烈矛盾冲突。其二,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原材料和能源进行掠夺,另一方面把污染环境的工业制造业大量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这些国家环境急剧恶化。

因此,当前的全球化所建立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种更为不公正的秩序,它以新的空间控制手段导致了权力、财富、自由、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公正分配。全球空间结构的对立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对抗。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所推动的空间进一步展开必然导致空间矛盾进一步激化,空间竞争持久化,人类社会的内部冲突将更加激烈和混乱。可见,全球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呈现充满风险的空间结构,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对抗正在全球空间展示着多样性格局。全球化时代,当人们的生存方式越来越依赖

于当代空间的生产方式的时候,空间问题不得不引起理论家们的关注与研究。哈维正是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揭示资本积累与全球地理空间扩张与重组之间的内在关联来解读全球化,从而阐释了自己的全球化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和解放政治理论。

### 三、西方社会城市危机的出现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一场城市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sup>①</sup>

第一,大城市中心区的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40—5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作为社会经济繁荣的表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地区普遍经历了扩张和蔓延,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人口的外迁,带来了公路建设与新区住房建设的大量需求,为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市场,再度带来了房地产业的兴旺。但与此同时,由于主要消费者离开了市中心,工业和服务业也随之迁出城市中心区,结果就使得大城市中心区的雇佣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减少,零售商业、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减少,服务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吸引发达国家大量资金的流入,随着发达国家大量资本的外流,更加剧了本土失业率的上升。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发达国家许多曾一度繁荣的大城市,带来了城市中心区的衰落,对大城市中心区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挽救城市中心区,国家不得不通过财政投资或补贴的方式对城市中心区加以改造,使其成为金融、信息、管理中心。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被赶走,而有些富人又重新被吸引回来居住。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城市发展规划始终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而不顾穷人的利益。

第二,城市重构与城市财政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的发展日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影响。为开拓新增值的空间,工业资本大量从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的城市化地区,使城市发展的重心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新兴工业城市。工业资本的逃离,不仅使

<sup>①</sup> 参见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老工业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工厂厂房和其他固定资本贬值,城市税收相应减少,不少城市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一片萧条。许多城市为了争取资本的投资不得不向跨国公司屈服。因此,全球化时代,城市不再是资本集聚与集中化生产的某个地方,而是全球空间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和控制中心。如果一个城市无法在全球空间体系中取得有意义的地位,没有能够在全世界劳动的空间分工中发挥对国际资本有价值的功能,那么资本就会抛弃它,城市就会陷入危机。

第三,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不断。作为城市社会危机的具体表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骚乱不断,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在欧美城市中,各种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团体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维护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竞争和冲突,各种罢工和抗议,各种邻里组织的反抗活动等层出不穷。这一切使得城市里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备受人们的关注。

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的出现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城市空间利用上,资本家从追求利润出发,在选择生产空间时总是追求便宜的原材料供应、便利的货运、便捷的市场联系、低廉的地租和劳动力市场,因此希望将生产所在地与工人居住地相结合。而工人则从自身的生活需求出发,要求便利的生活消费市场,舒适幽静的居住环境,远离环境污染的生产区,以及为了自身再教育和后代教育的目的要求接近科学教育中心,等等。这一切需求与资本家生产空间的要求相冲突。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政府势必会根据资本家的要求不断地为其创造有利于资本增值的生产空间,进行建设开发,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间。在具体的城市规划中,政府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将工人生活区与生产区域合并。但劳资矛盾的冲突激化引起劳动者的集体不满和反抗,使得政府不得不考虑大多数劳动者的需求,将工人分散成为住在郊区的中高收入阶层和住在城市政府房产中的低收入阶层,以此分化劳动者,隐藏矛盾。城市规划和城市的空间形态就这样随着劳资冲突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城市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空间体现,在城市空间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剥削空间以谋



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由城市空间利用引发的矛盾使工人为争取生活、居住等生存条件和成本而进行斗争,因而,工人为解决住房、学校、医疗保健、交通、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斗争成为了城市社会运动的核心内容。

面对西方城市社会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冲突和危机,一些学者开始纷纷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试图对城市问题作出新的理论回答,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sup>①</sup> 作为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哈维正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的本质及所产生的城市问题的根源。哈维比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更直接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城市分析,对此,哈维曾经指出:“我在《资本的界限》中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一个解释城市化的基本理论,那就是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性结构整合进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中的一个积极因素。……这是关键性的理论创新,使我不再单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历史地理学,而是打开思路,用理论总结城市进程,把它作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的一个积极部分。”<sup>②</sup> 由于哈维把资本积累看做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动因,因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而城市地区的兴衰和发展变化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结果,并由此带来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通过对空间生产、空间资本的形成与积累、空间资源的冲突和社会运动等方面的考察,哈维批判性地研究了城市空间问题。

## 第二节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空间问题在社会理论领域一直处于缺位的状

- 
- ①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要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入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UK&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p.4.

态。在想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空间仅仅被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过程中自然的、既定的处所,正如福柯所说:“空间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sup>①</sup>对社会生活历史情境的过分强调掩盖或扼杀了社会理论的空间想象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和艺术领域,人类都经历了空间体验的剧烈变化,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过去的空间观念和认知习惯。研究者将目光从时间与历史、社会关系转移到人文生活的空间性和政治性上,从而使社会理论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空间转向,即以空间思维来审视社会,肯定和强调空间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说,“空间转向”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理论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它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社会学、城市建筑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真正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巴黎。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尔、福柯等法国学者为代表,强调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人们从对时间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上来。在法国学者对空间理论研究的影响和启发下,哈维意识到“空间”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视角,他将地理学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建构了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以此为基础,他具体分析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关系、时空压缩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空间政治,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空间批判理论。哈维的分析路径突出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之地理维度缺失的状况,激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和解释力。

### 一、社会理论空间维度缺失的原因

在19世纪的社会理论中,关于空间的论述基本是片断式的、零散的。虽然,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为我们留下了若干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断,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的空间转向埋下了伏笔。但社会理论仍被时间所牢牢掌握,关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表述依然是抽象模糊的,尚未

<sup>①</sup>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Harvest Press, 1980, p.70.

形成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为什么空间维度在社会理论的架构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呢？究其根源，我们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历史决定论在传统社会理论中的霸权地位。

通过回顾社会理论的发展史，我们来看历史决定论是如何逐步树立起在社会理论中的霸权地位的。在19世纪中叶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时代，历史性与空间性基本保持平衡。贯穿于法国社会主义、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诸种观点里的批判思想都体现了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这种平衡成为解放意识的源泉。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具体地理及其空间和地域的结构进行挑战，是发生在这一时期里的各种激进学说和社会运动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这种明显的空间研究开始退隐于力量更强大的有关时间和历史的革命主体性的欧洲中心论主张的背后。因此，19世纪下半叶，历史决定论在社会理论中逐渐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地被湮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依据，孔德和新康德主义思想相互结合，重塑了社会哲学，促发了各种新社会科学的形成，这些社会科学的主旨都是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第三次现代化以及接踵而来的福特主义时代，历史对地理的理论主宰状况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历史决定论继续蔓延于现代社会理论。可以说，在过去几百年间，时间和历史一直占据着传统社会理论的宠儿地位，使社会理论被笼罩于一种时间性的万能叙事，一种历史的想象中，从而淹没了空间思维，这是空间贬值的根源。历史决定论长期以来处于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其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体验与想象被扼杀了。所以说，历史决定论十分成功地对空间问题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使得社会理论具有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地理学的想象力也被蒸发了，美国空间理论学者苏贾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下空间性的失语。

此外，学科分工所导致的理论狭隘性是社会理论中空间被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直以来，社会理论家们认为空间的变迁应该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而地理学家在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时，仅仅把空间看做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既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条件，而从不去思考空间和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由于地理学主要采取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地理问

题,因而无法揭示出空间的社会性,从而无法引起社会理论家对空间的关注和重视。吉登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sup>①</sup>更有甚者,福柯指出,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乃至社会理论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而空间遭到贬值。但这一局面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得以扭转,学科整合成为新的潮流。在这股学科融合的潮流推动下,社会学和地理学相互接近,社会理论逐步引入以前不曾重视的地理学维度,并为地理学概念知识预留了一席之地,同时地理学亦试图通过吸收社会理论的新进展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 二、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理论和时代背景

空间问题的兴起和突出,从理论上与法国哲学中重视空间的传统有关,从现实上看则与近代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的城市化有关,更与当代信息化和全球化下空间问题变得凸显密不可分。

### 1. 法国哲学对空间问题的重视

率先扛起空间转向大旗的是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也是肇始于法国左派,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理论背景的。根据美国学者苏贾的研究,<sup>②</sup>法国学界不同于英美和德国传统,而具有一个对空间性敏感的传统。从 18 世纪的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到 20 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情景主义、编年史学派都有很多关于空间、地理和城市的描述。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相比,法国的空间论传统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连续性,这促使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空间化传统。与英国、德国、美国相比,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相对较晚,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有力地继承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断提出极富吸引力的本土政治主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因此,法国马克思主义建基于对政治社会理论的继承,这种理论从圣西门、傅立叶和蒲鲁东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都强调空间政治学和区域性地方自治主义。这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513 页。

② 参见[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1—72 页。

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策略就是从扩张性的资本主义角度出发,来批判空间生产对社会的控制。可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伊始,就较之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明确的空间论观点和理论阐述。

同时,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反空间论偏见的影响较小,而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中,此种偏见早已根深蒂固。这种反空间论思潮主要根源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牢固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否定和批判了作为历史精神载体的国家这一空间形式概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者们利用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来排挤黑格尔的各种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种做法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植入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空间化倾向。然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恰巧与黑格尔主要学说的重新崛起同时发生,因此并没有受到上述理论影响,并未消除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关注和重视。

正是由于空间在法国知识传统中异乎寻常的中心地位,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法国批判思想一直持续着对空间话语的保留,从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经过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两大支流,直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种论辩。从对法国哲学传统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是有其法国哲学的理论背景的,是与这种空间传统密不可分的,法国哲学传统对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具有重要影响。

## 2.“空间时代”的崛起

随着我们走向 20 世纪的终端,现代社会理论的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福柯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预言实现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支撑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各种条件已发生了变化。虽然对劳动时间的剥削仍然是绝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但这只在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里发生。这些限制缘起于工作日时间的缩短、最低限度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协议以及工人阶级组织和城市社会运动所取得的其他成就。资本主义不得被迫转移重点,将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剩余价值的榨取上,其手段是通过技术革新、资本有机组成的改变、国家所发挥的愈益普遍

的作用,以及将资本渗透到全球不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体制的诸种变化使空间的意义和作用凸显出来,在这种特定现实背景下,社会理论对此的回应表现为开始倾向于一种强烈的空间意识。

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的出现也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资本主义城市的扩展导致大都市区的出现,城市中产阶级和高收入工人郊区化过程的加快,带动了产业、就业和零售商业向郊区的转移,引起了城市中心的严重衰退。为了挽救城市中心区的颓势,各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金融、信息、管理部门和机构进驻中心城区。但这一措施虽然带来了城市表面的繁荣,却没有使穷人获利,导致城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不断,矛盾丛生。总而言之,城市作为资本积累最为集中和空间表现的地方,突出反映了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以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城市的迅速扩展和城市危机的加剧,促进了城市理论的发展,也使社会理论家们更多地关注城市问题,城市中的空间生产、空间矛盾和空间斗争成为他们共同研究的主题。

我们之所以说 20 世纪是空间的纪元,是因为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在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远少于由信息化和全球化钩织的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1972 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紧密联系。”<sup>①</sup>人们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深刻的时空转变,空间的重要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以凸显。因此,“空间时代”的来临有力推动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 三、社会理论空间转向中的哈维

在哲学反思、学科整合和时空转型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社会理论逐渐摆脱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开始发生转向。20 世纪 70—80 年代,学者们一致呼吁对社会理论进行广泛的空间化,其态度之明确前所未有的,这给对空间熟视无睹的古老传统带来了挑战与颠覆。在这股空间化思潮中,空间研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 页。

究呈现出多层面、多向度的不同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和苏贾等。其中,哈维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独特的地理学想象占据着社会空间理论的重要位置。

哈维的空间理论虽然也是以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等作为基本的研究主题,但与其他社会空间理论相比,又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刻把握了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注重从全球化的视野来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哈维在吸取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对全球空间的分析,并集中于探讨全球空间生产。哈维着重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生产进行了批判,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何在全球化空间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修复。同时,哈维指出,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得生产、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的分布重新塑造了空间的格局,对人类生存空间造成了压迫与损害。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阶级斗争的分散和碎片化都使政治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哈维提出建构以差异性和多样化为核心的空间政治理论,以此来包容包括生态、性别、种族以及各种群体和社会集团的不同政治诉求,从而设计新的全球秩序和重新安排个人生活。

第二,强调从资本积累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卡斯特尔(Castells)强调马克思主义更重视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规律,<sup>①</sup>提出理解城市必须研究“集体消费”。而哈维则认为理解城市进程的焦点不是集体消费,而是马克思最关心的基本问题——资本积累。哈维城市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是资本家受利益驱使的产物”。<sup>②</sup>资本主义城市化是在资本积累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资本积累对城市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进程实际上意味着建立一种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以城市建筑环境和资源系统为资本积累服务。哈维

<sup>①</sup> Castells, 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p.12.

<sup>②</sup>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9页。



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指出,资本通过对城市建筑环境的投资来解决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但在资本逐利的目的下,要求不断创造有效率的、合理的空间运动结构,这意味着不断破坏既存的空间设施,由此城市空间被频繁地恶性改造。因此,资本主义城市化和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城市空间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相互作用的场合。哈维通过将城市化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机制联系起来考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实质的认识。

第三,揭示出后现代主义使空间的意义更加凸显。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推动了人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哈维强调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其核心在于时空体验。而时空体验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以及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时空压缩是哈维对后现代状况及其当代社会发展进行高度概括的结果。“时空压缩”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致时间和空间的品质都发生了改变,时空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后现代时期,时空压缩的体验愈益强烈,使我们觉得已经废除了空间和时间,感觉空间已经不重要了。其实不然,哈维认为,时空压缩的体验越是强烈,表明空间的意义越大。因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sup>①</sup>因此,哈维强调空间重组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核心议题。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有全部原理体系中最具有说服力的,因此他大量引用和阐释马克思经典理论观点,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始终坚持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诸种问题。在把自身的理论逻辑严格地限制于马克思传统的同时,哈维力图激活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0页。



生命力和解释力,他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地理空间视角的引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

正是由于哈维开阔的理论视野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使他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更能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中包含的剥削和压迫,给予了我们从非正义的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和可能性。

### 第三节 哈维空间理论建构的思想来源

空间问题的凸显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社会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从哈维空间理论的思想渊源上看,他从空间维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来自马克思;他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学说深受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的影响。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研究成为哈维空间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哈维正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批判性地继承了理论先驱者们的空间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从而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

#### 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中,虽然没有对空间问题进行系统和详细的研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本中仍蕴含着丰富的空间理论资源。基于本文的研究重点,这里我们主要探讨马克思关于资本运行过程中的时空规划思想和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理论。

##### (一) 资本积累的时空规划

##### 1. 剩余价值生产的时空规划

剩余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剩余价值的获得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剩余价值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必要劳动时间短,剩余劳动时间长,那么剩余价值的量就会多。这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对资本增值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马克

思又将剩余价值的生产区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延长劳动时间就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如果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势必会引起劳动者的反抗。因此,剩余价值主要是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实现的。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分析中,集中探讨了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这一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模式沿革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安排和规划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因为当空间规划比较合理时,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相应缩短。例如在讨论到协作时,马克思认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sup>①</sup>这种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规划,众多的工人在同一空间内生产同一种商品,不但有利于分工的发展,而且可以减少工作过程中由于距离而消耗的时间,劳动生产率自然得到提高。并且,“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sup>②</sup>这种空间规划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体现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又体现了空间上的协调性。可以说,工人劳动在空间上的协调与合作,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以上是马克思针对某一具体生产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微观分析,而从整个资本循环运动的宏观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了转化为资本从而扩大再生产,而资本生产周期的缩短是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实现最大增值的基本途径。因此,资本总是不断更新人口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配置和布局,通过空间重组来缩短时间。人口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推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使农村服从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人口大大增加起来”，“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sup>①</sup> 城市化的发展，使人口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某一空间，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节省了交换和消费所耗费的时间，从而加速了资本积累的周转。由此可知，马克思已经预见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空间或空间规划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 2. 资本流通过程的时空规划

剩余价值要在生产中创造出来，还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实现，流通过程是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将阻碍资本增值的因素阐发为一个等式：“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sup>②</sup>因此，资本要实现增值既要扩大资本流通空间又要缩短资本流通时间。货币的出现突破了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的地域空间的限制，使交换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由于货币所释放的这种空间能量，使得资本的流通范围大大扩张，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空间也得到扩大。

同时，资本的流通时间由于与资本的周转速度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很好地规划来尽可能减少资本流通所占用的时间。在时间上，要尽量使资本的流通时间降到最低。“流通时间本身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sup>③</sup>在空间上，资本要尽力去消除空间上的障碍，提高商品的运输能力。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过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间。”<sup>①</sup>马克思认为,运输成本的减少和运输时间的降低对于资本周转和资本增值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这种地理上空间障碍的消除必须通过通讯和交通技术手段缩短行程时间来克服。资本不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推进,目的就是为了加速资本流通及资本周转速度,以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背景下,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观点与马克思“资本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sup>②</sup>所谓“时空压缩”是指,一方面,伴随着灵活积累模式,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周转速度不断加快,使人们感受到时间的压缩;另一方面,商品、劳动力和服务通过空间而实现的迅速流动使空间障碍几近消失,使人们产生了“空间压缩”之感。时间维度的粉碎导致“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空间障碍的崩溃则是出现了地球村。可见,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和马克思“资本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同样是对资本积累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时空特征的说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展开对空间的系统研究,但他关于资本和空间的分析应该说是资本积累和城市空间规划的最初理论渊源,哈维正是沿着马克思的这条路径一直走下去,进一步深化了对空间问题的研究。

## (二)世界历史及其地理空间

资本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打破地域和民族限制,越出国界向全球化空间方向扩展,因此从时空角度来讲,资本积累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积累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历史地理空间的问题。这既是解决过度积累危机和矛盾所必需的,又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尤其是当今全球化的发展,更能体现出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较早就预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0页。

到了资本全球化这一发展趋势。

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来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资本空间生产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世界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交往的结果,尤其是资本不断开拓世界市场的结果。“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①</sup>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使人们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趋于消灭。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世界历史”理论是当代全球化理论的早期形态。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揭示了资本是如何通过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扩张和规划完成资本积累,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尽管当今时代的全球化过程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非马克思的时代所能比拟的,但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在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拓展。所以说,马克思当年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今的全球化仍然具有解释力。“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全球化’的概念,甚至‘全球化’的术语也很少提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理解和说明,实际上就是全球化基本理论的重要解释,当然,不是对全球化所有问题的具体解答。”<sup>②</sup>

最后,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sup>③</sup>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一样,共产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世界性的革命。可以说,马克思认识到,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为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造成了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断言,这一切的未来趋势必然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因此,马克思把地理学和革命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

应该说,哈维的空间理论深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影响,哈维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外扩张的基本论述。马克思虽然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因及发展趋势,但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具体的地理状况及其导致的革命形势并未作出具体而系统的分析。而哈维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地理空间思想,从地理空间角度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批评性的重构。通过对哈维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是如何利用空间规划来达到资本增值和积累的目的,同时也会使我们对马克思理论中的空间思想持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 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资本主义进行全球空间扩张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过程。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体现为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导致的中心与外围的不平衡结构,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不平衡发展。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殖民达到高潮,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殖民地的争夺斗争也加剧,这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现象。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出现集中反映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针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各自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帝国主义理论。

### （一）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如何看待帝国主义问题是第二国际的重大论题之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依据经济决定论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并以此为据设计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时,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及其政治后果。卢森堡则较为深刻地把握了帝国主义问题的实质。她不仅从资本积累角度正确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实质,而且揭示了对全部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卢森堡在分析帝国主义现象时,重点考察了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她从分析剩余价值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入手,提出了“资本积累不能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实现”的论断,从而阐明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资本积累在生产领域的矛盾即劳资矛盾已经淡化,劳资矛盾也开始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时期,突出的矛盾体现在流通领域中,即价值如何实现以及原材料、劳动力供应的问题。因此,卢森堡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市场问题给予极大地关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她首先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开始讨论资本主义积累问题。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中提出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图式有一个预先假定的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纯粹的、封闭的。在这一框架里,马克思主要讨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而剩余价值实现的逻辑则始终是被悬置而处于考察范围以外的。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能否持续的关键性问题,不解决好这一问题,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无法说明和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因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作为资本积累源泉的剩余价值都不可能在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得到实现。一方面,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性消费是有限的。资本家只能消费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也只能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得一部分,其数量最多相当于社会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推动资本家进行生产性消费的动力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资本家的生产总是为了某种明确的需求而进行,不可能为了生产而生产。所以,资本家必



然会在纯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市场。卢森堡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非资本主义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部分生产资料的供应来源和劳动力的后备源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sup>①</sup>正是通过对剩余价值如何实现的提问，卢森堡发现了资本主义封闭体系的缺口，发现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动态关系。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需求之间的必然联系，使得资本主义同其他经济形态相比，具有天然的侵略性和扩展性。“资本如果没有全地球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是成不成的。为得要使积累运动顺利进展，必须要地球上一切地带的自然财富及劳动力。绝大部分的资源 and 劳动力，事实上还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范围内——这是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因此，资本就必须热烈要求统治这些领土和社会组织。”<sup>②</sup>按照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逻辑，帝国主义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资本积累，追求更高利润，争夺对非资本主义领域的控制而出现的。因此，“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sup>③</sup>帝国主义借助殖民政策、国家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这一资本积累是在牺牲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和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挤掉，从而实现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卢森堡揭露出，帝国主义的核心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人口和自然的赤裸裸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带发展的不平衡。“虽然资本主义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sup>④</sup>

① [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76 页。

② [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88—289 页。

③ [德]卢森堡，[苏]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9 页。

④ [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33 页。



资本积累的全球扩张使落后国家不仅成为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帝国主义行径对欠发达国家的侵害、掠夺是造成其真正落后的原因。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本性要求不断向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国家不断扩张,可供资本扩张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将越来越少,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也将越来越恶化。这种态势势必引起这些地方国家和人民的反抗,导致一连串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战争、革命。毫无疑问,当资本主义封闭系统外部可掠夺资源消耗殆尽后,这个过程的最结局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吞噬和崩溃。卢森堡从历史地理发展的不平衡出发,从经济上论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然而,这一理论被布哈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曲解为“资本主义自行崩溃论”。事实上,卢森堡从来不认为资本主义灭亡是单纯经济的原因,她关于资本积累的实现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论断不仅仅是要说明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或缺性,而是旨在强调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侵略和剥夺的实质。

历史推进到一个世纪以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帝国主义论仍然是哈维展开帝国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首先,哈维肯定了卢森堡对帝国主义实质的分析。“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贸易为保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提供了唯一系统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形态或地域不愿意与之进行贸易,那么就必须通过暴力和武力迫使它们这么做。在她看来,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所在。”<sup>①</sup>帝国主义(一种特定的全球空间生产和利用的方式)是资本主义长久生存的重要手段。但是,哈维认为,以卢森堡帝国主义论为理论依据,19世纪后半叶众多殖民国家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广大市场采取了残酷的压制政策来阻止非资本主义区域发展资本主义,这一做法完全是弄巧成拙,不仅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倒导致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无法解决。其次,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补充发展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实际是一种消费不足理论。也就是说,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资本家和工人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这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不可解决的,并会采取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不过,在采取这种极端的形式之前,该矛盾仍然可以借助某些途径而得到暂时的缓解或转移。卢森堡强调了其中的一种,即通过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的空间上的转移来缓解这一矛盾,但在细节上她论述不多。此外,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时间上的转移得到缓解,这一点卢森堡基本没有论及。因而,哈维对资本主义进行时间和空间转移的详尽研究和分析就是为了弥补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不足。最后,哈维认为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定必须永远能够获得自身外部的东西的观点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资本为了进行积累,确实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但他并不赞同卢森堡将资本积累看做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的系统。他认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掠夺行为在当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力。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之中,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而且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正如列宁、希法亭和卢森堡等人在 20 世纪初所认为的那样,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积累的重要手段,剥夺性积累的新的机制已经开启,哈维由此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sup>①</sup>。

## (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既不像霍布森和希法亭那样从分配与流通出发,也不像卢森堡和考茨基那样从资本积累出发,而是从生产领域、从生产内部条件出发来研究帝国主义。他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列宁在 1916 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在该文中,列宁通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并把对帝国主义表面现象的理解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见解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的重要论断:“帝国

<sup>①</sup> 剥夺性积累是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以极低的价格释放一系列资产,过度积累的资本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

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sup>①</sup>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改变其不断占有空间、扩大空间的本性,反而借助武力使资本空间扩张的规模和范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资本输出作为帝国主义的形态之一,强化了中心—边缘交换的不平等性,使巨额财富流入了宗主国,而殖民地的贫困程度则不断加剧。帝国主义的这种新剥削形式使得少数发达国家在资本积累的全球空间结构中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而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不断被排挤到外围和边缘地带,造成世界体系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内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体系的后起者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获得更多的殖民地,不得不诉诸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体系内部进行空间争夺的一次战争。列宁用“不平衡发展理论”来解释帝国主义战争。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发展速度的不平衡造成资本实力的不平衡,而资本实力的不平衡又导致了殖民地占领格局的不平衡,由此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托洛茨基对列宁的“不平衡理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不平衡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降低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后来者居上,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不仅没有加剧各国之间的实力,反而导致了各国实力的均衡化,因此不平衡论无法用来解释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了列强绝对实力的均衡化,而没有看到其与各自殖民地份额相匹配的相对实力的不平衡,因此,即便是列强实力均衡化了,但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实力的均衡化才导致了殖民地占领格局的不平衡,因而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列宁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作为理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哈维尤其看重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观点,这给哈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他说:“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方面必须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相应的阶级斗争的不平衡发展的共同结果所致。资本为了逃避在特定地方与时间发生的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阶级斗争,它必须变得具有流动性,否则,它必须耗费一部分超额利润来收买国内劳动阶级以提高其物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地理扩张必然发生。”<sup>①</sup>

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把握还体现在其对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深刻认识上。列宁主要从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积累机制和统治方式等方面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达到了极大的分离,资本和生产过剩使得货币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而向银行集中,从而加强了银行的力量。大银行和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融合,形成了全新的金融资本,在此基础上又促进了金融寡头的形成。列宁指出,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投机收入、利息和股息、级差地租、财政转移等积累机制,金融资本迅速膨胀起来,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金融寡头不仅直接掠夺大众,也统治着中小资本。通过控制运输条件、切断销路和信贷、施行价格垄断、收购股票等等手段,金融资本实现了对中小企业的制服和压迫。而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资本同样依靠向落后国家输出借贷资本来进行殖民和掠夺。“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上的差异。”<sup>②</sup>因此,在列宁看来,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全球,金融资本逐渐取代工业资本,成为帝国主义在全球空间剥削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应该说,列宁对金融资本实质的洞察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特征。列宁关于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运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哈维对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的认识和把握。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随着资本的高度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而愈演愈烈。哈维清醒地看到,1980年正式开始的金融化浪潮使得金融体系成为再分配活动的核心。金融资本通过信贷和股票操纵对资产的投机性掠夺是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手段。哈维进一步指出,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sup>①</sup>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63.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页。

银行等国际机构)实际上是通过施行金融对落后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从而实现资本空间生产和全球资本积累。因此,哈维揭示了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的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虚拟资本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金融期货及指数化金融产品空前繁荣。我们甚至看不到它们与实体资本对应的部分,股票衍生出股票期权、期货合约或股票指数期权期货合约等,与同一套实物资本相对应的可能是几套甚至几十套虚拟资本,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一个虚拟信用资本时代。哈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信用扩张和虚拟资本的激增使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显著增强了,全球金融资本体系充满着风险和危机。简言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哈维所揭示的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是对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 三、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并未走上富裕富强之路。因此,为解释和改变这种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经济上来理解世界不平等便逐步成为一个理论趋势。1969年希腊学者A.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sup>①</sup>出版标志着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其后埃及学者阿明深化了这一主题,德国学者弗兰克有关“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的思想,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的依附性理论,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帝国主义研究,这种研究不仅重新凸显了卢森堡的理论问题,而且直接加强了从空间角度研究不平衡发展的需要。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落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及实现发展的可能途径问题。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想是依附论产生的前提,而列宁、卢森堡

<sup>①</sup> 伊曼纽尔在该书中详细探讨了“不平等交换”。他认为在生产中,工资是自变量,商品价格是因变量,工资水平决定商品价格。国际贸易看起来是等价交换,实际上是不平等交换,因为工资的不平等导致交换的不平等。

等人的帝国主义论则直接对依附论产生了影响。对于何谓“依附”，学界普遍接受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定义：“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另一国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制约；当某些主导国能够使其他国家的发展只不过是其扩张的反映时，在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sup>①</sup>依附论的观点十分庞杂，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分歧差异也很大，但绝大多数依附论者都认同一个基本的观点，即认为外围地区的不发达与依附的形成是由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简言之，是由帝国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依附论者大多反对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阻碍落后国家自主发展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作综合分析，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来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政策。

弗兰克是依附理论家中“激进派”的主要代表，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他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描述成“宗主”与“卫星”的关系，作为“宗主的”发达国家剥削着作为“卫星”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这种“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造成了外围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因此，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落后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卫星”与“宗主”的关系越密切，“卫星”的经济就越不发达，在弗兰克看来，不发达国家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与发达国家“脱钩”，以摆脱外部的剥削与掠夺。<sup>②</sup>因此，弗兰克认为，依附的积累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关系的积累，这种积累与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呈反向运动。不发达国家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必须打碎依附的链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

相对于弗兰克而言，阿明的理论更为系统。他将不发达问题置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外

①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② 参见[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见[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围国家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的性质。他从分析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积累规律出发,揭示了中心资本主义(扩张机制)和外围资本主义(依附机制)是如何运行的。与“中心——边缘”两极格局相适应,资本积累也分为中心积累型和外围积累型。中心资本主义积累既可以通过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平等交换,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外围积累型是贫困和不发达的积累,它按照中心的需求而被动地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结果是不平等、贫困和畸形的发展。因此,阿明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sup>①</sup>

由于弗兰克和阿明等只注重从外部因素来寻找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这一理论缺陷,激进主义依附论遭到了众多质疑和批评。多斯桑托斯就认为,这种只从外部寻求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建构新的依附理论。在他看来,对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流通领域,而在于生产领域。如果拉美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不发生质的变化,就永远无法改变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而拉美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变革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和落后的国内经济结构。多斯桑托斯的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开始关注不发达的内部原因,说明依附论对不发达成因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在依附论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他在批判地继承依附论的核心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化理论。世界体系论沿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思路,把资本主义历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进一步将考察的视野从狭义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两极空间框架拓展到全球化的全球空间理论视野。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它本质上是由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等价交换”

<sup>①</sup>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恬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08页。



和“资本积累”是驱动这一体系运行和扩张的动力。“‘世界经济体系’是巨大的由各种政治结构分割的一体化生产的不平等的链条。其基本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等地加以分配,以支持那些在市场体系中能够获得各种暂时垄断的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sup>①</sup>第二,现代世界体系“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沃勒斯坦在依附论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插入“半边缘区”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半边缘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多于经济原因。这是因为,虽然“中心——边缘”的两极化结构也能实现剩余价值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转移,但会激化绝大多数受剥削者对极少数攫取高额利润国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导致世界体系的不稳定。而半边缘区的存在则保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平稳发展,一言以蔽之,半边缘区是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它的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以及边缘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劳动分工的方式是在地区间存在不平等交换,而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却是以这种不平等交换的继续为基础的。”<sup>②</sup>也就是说,在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中拥有双重优势的极少数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国家以及处于体系“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半边缘”既受“中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在这个动态结构中,通过层层剥削,使剩余价值积累到了中心地区。世界体系论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和特征,相比较依附论而言更进一步。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同时它从全球视野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从而克服了依附论局限于拉美经验的地域性。

综合来看,不管是依附论还是世界体系论都把握了由西方垄断资本主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主题,从世界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经济的宏观视角出发,将各民族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经济纳入同一世界经济之内,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本积累的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为全球化的启动与加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素,而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全球化的效应,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说,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是全球化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将研究视角从时间纵向维度转向空间横向维度,将研究重点放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空间关系上,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转化具有明显的空间意识,为哈维理解全球化空间,形成其全球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学者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哈维同样也将理论关注点聚焦于全球化,他通过引入地理维度对全球化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探讨。哈维把全球化看做是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空间扩张和灵活积累体制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过程,由此产生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资源、能源市场的空间剥夺,资本全球积累的不平衡性使国际劳动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格局更加深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卢森堡、列宁到多斯桑托斯、沃勒斯坦等人,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思考以及相关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的各种概念和理论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分析的主要语境。他们突破封闭的民族或国家经济空间的局限,而将视野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具备一种全球化的理论视野。正是在这种研究视野的启示下,哈维深刻体会到当今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世界发展呈现出日益显著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即他所强调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列宁的新帝国主义论及其后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哈维对帝国主义以及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的研究。哈维把不平衡发展既作为解释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的前提,又将其视为后果,力图将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思考,以此来分析当代更大规模上的资本扩张,逐步形成了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积累—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空间乌托邦为中轴的马克思主义言说。

#### 四、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列斐伏尔是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转向,即从其早期的异化批判转向后来的日常生活批判;从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又转向了社会空间理论研究。列斐伏尔围绕空间生产的知识,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实践的角度建构他的空间批判理论。这一理论创建工作最早开始于《城市的革命》一书。在该书中,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城市化”统治“工业化”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则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幸存的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幸存下来而没有灭亡,就在于对空间的占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sup>①</sup>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就直接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超越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界限,变为“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从而形成了对空间生产的系统认识。《空间的生产》出版后引发了巨大的理论效应,直接促进了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空间转向。正是在这一理论转向的背景下,哈维以列斐伏尔开创的空间理论为观照,通过研究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将空间生产理论具体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生产问题的理解。

##### (一) 空间生产理论

什么是空间?这是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这一命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提起空间,人们在通常意义上习惯将其理解为生产场所、活动地点等,并认为它是独立存在恒定不变的。列斐伏尔批评这种自笛卡尔以来的空间认识模式,认为它完全脱离了社会空间实践,而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在这一认识模式下,社会空间是被社会所生产的这一事实常常是被遮蔽的。因此,列斐伏尔强调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空间,在他的视域中,“(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sup>②</sup>这一论断包含着四层含义。

① He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8, p.21.

② He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 p.26.

第一,“(物质性的)自然空间正在消失。”<sup>①</sup>换言之,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已经逐渐在人类的视线中消失了。虽然自然仍然对人类的野蛮征服进行着顽强不息地抵抗,但任何空间都不可避免地被人類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侵入,已然沦陷为生产力的原料基地。因此,空间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过程而保有一种自主的地位。事实上,它不是自然性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包含并掩盖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第二,“每个社会——因此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sup>②</sup>如果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生产模式,都在自然空间基础上构造一个社会空间,这意味着也必定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空间及其空间生产形式。列斐伏尔着重对资本主义空间形式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他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空间的功能特性:第一,空间是生产资料。构成空间的那些交换网络、原料及能源之流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所有的空间都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第二,空间是消费对象。资本主义为控制大众而制造了消费文化,创造了很多休闲空间,像公园和海滨这样的场所都是被消费的地方。第三,空间是政治工具。空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严格的层级管理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地位,而绝非单纯的中介性的物质容器和框架。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才得以残存和发展。可见,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的空间的生产本身已经凌驾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之上,当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生产空间来同质化地控制日常生活,因此,资本主义空间是一种支配性的、压迫性的、控制性与权威性的抽象空间。列斐伏尔的理论目标正是要批判地分析被资本主义所压榨的空间。

① He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 p.30.

② He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 p.31.

第三,“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空间基本上支持物质生产的外部环境,而列斐伏尔强调,在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已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它已经进入了生产领域,也就是说,空间自身直接与生产相关,空间是生产的对象。以往我们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实际上是列斐伏尔关于空间问题思考的最核心的判断。从空间生产的这个角度出发,列斐伏尔将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都市建造、规划和设计,因为这是最为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划都倾向于空间规划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与城市的日常生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

第四,“既然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生产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就必定伴随着一个新空间的产生。”<sup>①</sup>列斐伏尔强调,由于空间的性质是由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变化必定带来空间性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抽象空间是资本的逻辑塑造的,因此这种空间具有同质化和可复制性的特点,因而否定了那些源于自然和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族群的差异。久而久之,这种长期被压抑的空间内在的多样性,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引发广泛的反抗,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空间虽然还不明晰,但可以推论出是一个差异的空间。当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试图同质化地控制每个人及每一件事物和日常生活时,差异化的空间却在强化差异而使人从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列斐伏尔强调,阶级斗争是从对立性的矛盾空间走向差异性的社会主义空间的空间革命途径。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同质化空间在全球的蔓延,只有阶级行动才能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和系统。<sup>②</sup>

列斐伏尔不仅从生产的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基本内涵,而且建立了一套关于空间的分析话语,即空间三重性辩证法。这种“三重性的辩证法不等

① He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 p. 46.

② 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

于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或层次,而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同时并存的三个面向维度”。<sup>①</sup> 具体是指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它包含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场所和空间特性。空间的实践是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涉及到空间组织和使用方式,以及空间的创造性和习惯性使用。空间实践是可以用观察和实验等经验手段来直接把握。列斐伏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隐匿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现实与城市现实和那些提供出来用于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闲的场所联系在一起的道路与网络之中,因此,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来界定。

第二,空间的表象化(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这与生产关系紧密相连,又与和这些关系影响的“秩序”紧密联系。它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想象,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技术论者、社会工程师和具有科学才能的艺术家的空间,这些社会的精英阶层经常把空间的表象作为达到与维持其统治的手段。因此,表象化的空间是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空间。

第三,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al spaces)。这是一种与图像和符号相联系的想象的空间,是居住于其中的“居民”与“使用者”的空间,也是某些仅仅描述这种空间的艺术家的、作家的与哲学家的空间。再现性空间透露出“空间的真理”,也就是说,它们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体验,而不是本质上的那种被创造出来以便于统治的抽象真理。不过,在当代世界里,列斐伏尔悲观地认为,再现性空间和空间实践一样,均受到空间的表象的专制统治。<sup>②</sup>

列斐伏尔把以上空间分析的三个维度概括为感知、设计与想象,即可感知的实践性空间、作为空间的表象化的设计空间与再现性空间的想象空间。可以看出,列斐伏尔不仅强调了社会空间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联系,而且体现了社会空间和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空间实践”就是空间性的生产,是人类各种物质实践活动和行为本身,同时包

<sup>①</sup>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

<sup>②</sup> 参见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括这种活动和行为的结果,它是“空间的表象化”和“再现性空间”的物质实践前提;“空间的表象化”是被构想出来的空间,由一套社会关系和知识来承载,是构成知识权力并占统治地位的空间,是压制“再现性空间”的空间;作为一种反抗统治秩序的“再现性空间”是与社会生活隐秘区域相联系的空间。虽然它被“空间的表象化”所统治和压制,但是因为自身包含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所以,是我们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概念,是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全面异化的过程中,注意到当代社会的空间变化,尤其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空间生产”概念及其内涵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并被看做是索亚、卡斯特和哈维等人的直接理论先驱。列斐伏尔从强调空间的生产及其空间辩证法的内容,到资本主义空间和社会主义空间,最后提出空间革命,体现了他对于空间问题的系统性阐述及研究。并且列斐伏尔的研究为后来研究空间和社会这个主题开拓了一条道路,使得后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空间理论的影响。哈维的空间研究,直接受到列斐伏尔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空间和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和城市的发展及空间对于社会解放意义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启发。

## (二) 哈维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斐伏尔在晚年以“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颠覆了整个近代以来的空间观念,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这一著名论断。哈维承袭了这一立场,也认为空间不是中立的,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哈维指出,虽然列斐伏尔正确地看到了空间的控制是当代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但它如何同控制时间相结合,以及如何同金钱与社会力量的其他形式相结合,要作进一步的阐述。对此,哈维的基本论点是:“在一般的金钱经济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联结系列。”<sup>①</sup>这里,哈维主要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页。

是将空间和时间结合在一起来分析,以突出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改变了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具体表现为加速资本周转时间,减少空间障碍,开创世界市场,等等。因此,哈维认为,空间与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哈维始终强调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离,并且在研究和分析现实问题时,都把时空结合在一起,而列斐伏尔则将重点更多地是放在对空间本身的分析上。我们认为,空间与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重思空间与时间的关系,要害之处在于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思考,而绝不能把其中的一方面归结为另一方面。

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过多关注及其强调,是否预示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或替代?<sup>①</sup> 对此,哈维与卡斯特一度指责列斐伏尔是一位“空间独立论者”,屈从于一种空间拜物教。而他们二人则很明确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城市空间地理问题研究中的更基础的地位。<sup>②</sup> 哈维认为列斐伏尔把空间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有用“空间批判”来取代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批判”的嫌疑。哈维要求从资本关系立场出发对资本的空间布局进行批判,也就是从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机制及其矛盾出发来阐述自己的空间生产思想。哈维以资本积累为中心,从历史地理角度阐释了空间生产过程及其产生的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受利益驱使,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必然产生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如何解决过度积累带来的资本和劳动盈余问题?哈维指出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而这部分投资的

① 刘怀玉认为,列斐伏尔的本意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要把辩证法空间化。他是针对结构主义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共时性方法,针对技术官僚社会所导致的知识领域的过分专业化与碎片化,而重新提出一种以空间化行动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想象。这就是把现代社会各种具有自足性自律性外观的经济政治文化子体系加以辩证整合。因此,列斐伏尔通过重新激活马克思社会生产概念的“空间性实践”内涵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意义。(参见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1993, p.374.



回收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收益,这无形中延缓了资本周转时间。可见,“时间修复”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二是消除空间障碍,开拓新空间,以保证资本畅通无阻运行。为降低空间运动成本,不断通过科技创新修建铁路、公路和飞机等交通设施,还有邮政和网络的日益创新来达到减少运行成本的目的,这使得资本主义历史变成了一件非常地理化的事情。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不断开辟积累的新空间,不得不在保存原有建筑环境中投资的资本价值和破坏这些建筑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因此,“空间修复”不断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而且资本的地理扩张也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在空间生产占主导方式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仍然无法解决。至此,哈维为我们展现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资本积累如何以矛盾的方式塑造了当代空间构型。

总的来看,列斐伏尔和哈维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展开关于空间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其共同目的都是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活力。没有列斐伏尔对空间思想的开创性贡献,也就没有哈维丰富的空间思想,前者是后者研究的基础。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理论背景不同,使得两者的空间理论主旨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列斐伏尔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城市成为各种矛盾聚集的地方。列斐伏尔看到了都市的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因此转向研究都市空间问题,进而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我们说列斐伏尔晚年放弃了日常生活批判,毋宁说他只是改变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视野,其理论主题仍然是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的理论比较抽象,较少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社会生活,在这方面不及哈维。哈维身处当代全球化和后工业氛围中,这使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能够越出地理范围的限制而更加关注资本主义所开拓的全球化空间。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但他并没有沿着列斐伏尔较为抽象的空间理论走下去,而是立足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由资本主义开拓的全球化空间,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批判入手,分析当代空间构型的生产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具体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



重要以及它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可以说,哈维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从地理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面对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开拓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

## 第二章 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随着资本主义步入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迅猛,空间、地理、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空间生产成为重要的社会实践,资本的发展逻辑以一种空间化形态而存在着。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在空间领域的拓展和殖民不断延续着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和危机。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全球化、城市化这些重大而现实的空间化问题?这是一个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题。哈维试图通过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哈维认为,造成历史唯物主义面临危机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地理和空间的维度,从而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作出充分说明和解释。由此,哈维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危机入手,通过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力,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蕴,从而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 第一节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缘由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要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内含着时间和空间视域、历史和地理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完整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其理论发展中逐渐丧失了空间维度,从而在解

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面临挑战和危机。因此,恢复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是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机械化的解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湮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科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确实直接表达了一种对历史维度的强调。因此,在20世纪上半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研究具有时间的偏好,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中,重点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对空间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时性分析,也代表着共时性分析,它潜在地内涵着空间的维度。下面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空间思想进行一个梳理和回顾,并从中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是如何被湮没的。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对空间的思考是直接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中来揭示空间问题的。正如哈维所说:“仔细检视他的著作就能够发现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积累是发生在一定地理学背景下并且会创造出某种特殊的地理结构。”<sup>①</sup>在《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中,存在着对资本在空间生产中扩张自己的历史运动的多维度考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来加速资本积累。马克思将“资本”界定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资本只有在不断运动并不断扩大自身规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价值增值。资本积累的这一内在要求决定了“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

<sup>①</sup>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7.

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①</sup>这种地理空间障碍的消除必须通过交通和通讯技术手段缩短行程时间来克服,因此,马克思说:“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sup>②</sup>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和扩大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对打破地理空间障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创新和投资可以帮助资本主义消除既有的空间障碍,以节省运输成本、减少运输时间,从而加速资本流通及资本周转速度,进而扩大资本积累。哈维认为,马克思不仅强调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意义,而且极有远见地指出了空间障碍的消除是一个正在形成而非已经完成的过程。“‘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深深地嵌入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的转型,这些转型刻画了资产阶级时代(从收费公路到铁路、公路、空中旅行,直至赛伯空间)的历史地理特征。”<sup>③</sup>他进一步发挥了时间的加速和空间障碍的减少对维持和发展资产阶级权力的重要意义,并以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揭示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生产的关系。

第二,工业城市既是资本造就的产物,又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场所。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大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崛起,工业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空间化表达。这是因为,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驱使它越来越需要在空间上集聚各种生产要素以形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力量,城市正是这种空间聚集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不仅聚集了大工业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也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此,它为资本积累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空间场所,“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

③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愈多……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sup>①</sup>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不仅仅是容纳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容器,它本身的空间聚合力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城市空间在集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集聚了普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大工业城市中到处充满着贫富对立和阶级冲突,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划分所引发的阶级冲突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考察曼彻斯特,发现在曼彻斯特城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居住区是严格区分开来的,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适宜、交通便利的居住空间都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工人居住区则环绕在商业区的外围。这种体现资本逻辑的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具有普遍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抗。进入后工业社会,虽然城市已不具备近代工业城市的一些特点,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城市之间关系实质的分析依然具有当代效力。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对城市本质的分析之上的,将城市看做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集中的场所,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也就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互相交织,矛盾作用的结果。

第三,资本不断扩张的内在属性开拓了世界市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sup>②</sup>换言之,由大工业的普遍竞争所孕育的现代资本,其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要求通过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生产和销售市场。可以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于是“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③</sup>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必然会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强力阻挠,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是,西方国家就诉诸武力,打开一个个封闭的国门,以暴力掠夺、强行占有的方式与经济落后的民族展开交往,建立殖民统治。资本的殖民活动在冲击落后国家和民族的血缘地缘联系、消解人身依附和从属关系的同时,又“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①</sup>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在空间领域的拓展和殖民的论述蕴含着地理空间的视角,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不仅直接涉及城市、空间问题,而且揭示出资本与空间的内在联系:空间直接参与到资本的运行过程中,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它既是资本流通的重要条件,又在实现资本积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地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但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具有空间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含着空间视域的。在马克思之后,这种资本研究的空间视角并没有因为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被完全抛弃。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殖民达到高潮,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殖民地的争夺和重新分配斗争加剧,产生了帝国主义现象。帝国主义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重视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她从分析剩余价值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入手,说明了资本要实现积累和保证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纯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市场。因此,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非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存在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卢森堡第一次从资本积累角度明确揭示了空间扩张对于资本主义生存的意义所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使得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侵略性和扩展性,这就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卢森堡进一步揭露出,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带发展的不平衡。列宁也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作为理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占有空间、扩大空间的本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进一步得到强化,资本输出作为帝国主义的形态之一,强化了中心—边缘交换的不平等性,使少数发达国家在资本积累的全球空间结构中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而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不断被排挤到外围和边缘地带,造成世界体系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苏联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通过对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经济体系等级结构的研究,也得出了空间性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重要特点的结论。

列宁、卢森堡、布哈林虽然都继承了马克思空间分析的研究路径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继承和发展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流。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内含的空间视域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被长久地忽视和压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解读湮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占据领导地位,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站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把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直接运用于哲学研究中,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割裂历史进程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联系,把历史规律看做是可以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自发实现的,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凭借其在工人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权,积极传播和宣扬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由于过分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而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庸俗化,将历史理解成一个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朝向既定目标的必然过程。以历史的客观规律替代了历史过程,以“客观规律的最后结果”替代了“作为过程的时间”,历史必然性被物化为历史目的。这种脱离了具体时间地点的直线论和历史目的论把资本主义视为静止封闭的结构,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危机的历史特征,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也有高度灵活自我调节潜能和无限扩张的空间特性。经济决定论者固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和批判的直接结论,“既缺少社会整体空间结构观念,墨守实体主义和本质要素还原论思维窠臼;也缺乏实践的复杂的社会空间辩证法意识,而拘泥于机械封闭的空间观,无法理解社会现实是由多重异质空间

冲突交融而成的具体总体。”<sup>①</sup>由于缺乏具体总体性的视野,经济决定论自然就缺失了空间视角。总之,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斩断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联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是实体而不是关系,是静止而不是运动,是结论而不是方法,因而他们必然会无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它的内在结构,不可能真正揭示出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不是将资本视为物质性实体,而是看做一种在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历史性关系。因此,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无法理解马克思概括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运动之“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特点,也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是一种空间分析,从而湮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缺失了空间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抽象空洞的,因为它只重视对资本逻辑历史生成的宏观把握,而不会对历史生成过程中每一个当下的资本主义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进行微观具体地剖析。正是为了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缺陷,恢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发展中被极大忽视了的的空间维度,哈维提出了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任務。

##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哈维强调,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视角,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不仅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哈维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马克思时代主要以物的生产走向了空间生产,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实践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当前资产阶级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就是要寻找积累的空间,“空间”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种新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通过海外殖民活动、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对外投资、产业转移等途径来开拓国外的新空间,实现资本的横向空间转移。同时,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积累模式加速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扫

<sup>①</sup> 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清了资本进行空间扩张的障碍,使资本的活动空间真正具有了全球化的意义。可以说,资本主义借助空间生产屡屡经历危机而依然幸存,并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面对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强调空间维度以此来丰富自身的理论内容。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状况的变化。首先,当代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过程在全球空间的分散和分裂在地理上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其次,弹性生产方式下,传统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种变化直接侵入到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不再是超越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而是朝着更加混乱的家族间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最后,各个国家内部出现了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也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与矛盾。以上诸种原因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碎片的、分散的无产阶级,从而难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因此,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地理重组使得当前的阶级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要复杂困难得多,如果不引入空间(地理)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将陷入无法解释当前阶级斗争状况的危机。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状况的变化。哈维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灵活积累模式使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科学上的突破、民主的解放等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灾难性的破坏,使人们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正是在现代化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各种反主流文化和反现代主义运动纷纷涌现出来,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困惑。强调分裂、普遍怀疑、短暂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这一理论反思的结果,并开始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

面对资本主义日益全球化、城市化、空间化的新现实,缺乏空间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法对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有力地批判的。为挽救历史唯物主义,释放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潜能,哈维突出强调空间视角,采用了一个动态的、理论上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

## 第二节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非仅仅要求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分析的视角,而是试图将其建构为一种批判和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他说:“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自然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这样的计划并非没有困难。但是,我想,对于‘理论应该怎样解释’和‘一种“元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将达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sup>①</sup>

### 一、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 (一)重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

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缺失的最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误解和偏差。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把空间、地方和环境(自然)等主题整合进自身理论之中。因此,在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哈维首先做的就是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并将其作为理论建构的方法论,这构成了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哈维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中,有些是坚持辩证法的,有些是敌视辩证法的(如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而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存在着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分歧和争论。哈维批评了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缺陷。他指出,尽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和《反杜林论》中反复强调自然和社会世界本质上是辩证的,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传统作出的是一种机械地理解,只是把黑格尔有关辩证法的特殊逻辑和精神观念强加到自然和社会世界之上。因此,这种辩证法具有一种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是与目的论和决定论教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以及苏东教科书体系强化和大力提倡了这种辩证法,使得历史唯物主义陷入了教条主义的危机,辩证法成为了理解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简单的认识论。在哈维看来,自恩格斯、第二国际、前苏联以来的辩证法传统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失去了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效力。为了避免和克服这种辩证法传统给历史唯物主义带来的理论局限性,重新恢复马克思辩证法具体的总体的视野,哈维试图用“总体性”来重新定位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

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强调“总体性”开始于卢卡奇。卢卡奇是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提出总体性辩证法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是其现存结论,而是其辩证方法,即“总体性辩证法”,这种方法是强调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分析和认识对象。总体性辩证法要求“把社会生活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sup>①</sup> 总体性辩证法打碎了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权威,也恢复了唯物史观的革命本质。强调以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同样也是哈维对马克思辩证法实质的理解。不过,哈维并不是直接受益于卢卡奇,他主要是受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奥尔曼的内在关系学说的影响,从“过程”和“关系”两方面对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思想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同时,哈维提醒我们也不要忘记,聚焦于过程和关系的辩证法首先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种正在出现的趋势,它建立在辩证的和关系思维方式之上,产生了可以被称为‘新唯心主义’的东西,它认为,思想和话语是塑造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变迁之历史地理的根本原因。”<sup>②</sup>

①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页。

②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哈维坚决反对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思想和话语,主张在语言、权力、信仰、制度、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等要素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中来理解物质实践和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说,哈维是在将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理解为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着重从两方面来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一是提出了过程辩证法和内在关系学说,二是设计了社会过程认知图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哈维是如何具体建构的。

## (二) 过程辩证法

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在其代表性著作《过程与实在》中详细阐述了其“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怀特海过程哲学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坚持“过程本体论”,即“试图把世界描述为那些个体的实际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自我造就能力”。<sup>①</sup>这就是说,怀特海认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不是某种静态的实体,而是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的有机体。由于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因而整个世界就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可见,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试图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从过程的视角提出一种解释现实世界构造的新的理论范式,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这与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论及的过程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怀特海过程哲学所提出的“流变”、“生成”原则深刻影响了哈维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强调从“过程”角度强化马克思辩证法总体性思想的优越性是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所一贯坚持的。怀特海认为,不管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哈维对此十分赞同,正是由于过程性是物和本体的本真状态,因此辩证思维对过程、流(flow)、波动(flux)和关系的理解必须优先于对要素、物、结构和有组织的系统的分析。这实际上是强调要在过程中来理解要素、物之间的关系,借助于过程和在过程中形成的事物间的内在关系,物和结构化系统才得以构造。哈维指出,马克思强调事物是永恒变化发展的也是源于把事物放在过程中来理解。总之,“辩证法不是物而是过程,此外,它是这种过程,在其中,心和物

<sup>①</sup> [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之间、思想和行动之间、意识和物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笛卡尔式的二元分裂都不再有立足点。”<sup>①</sup>

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着把辩证法本体论化和经验论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只把辩证法看做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对辩证法的研究就是运用大量科学材料论证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种理解模式使马克思辩证法变成了一种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的抽象教条,完全阉割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特征与革命意义,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哈维对马克思辩证法实质的解读正是克服了这种抽象直观理解的缺陷,不是脱离现实实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事物的辩证本质,而是在生成事物的历史过程中来审视人类生活矛盾运动的现实规律。我们认为,哈维把握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特征,强调了历史生成性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是以证明历史为旨趣,而是以历史性展开的矛盾机制为依据来考察特定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和条件。相比较以往对辩证法的解读模式,过程辩证法的优势就在于迫使我们总是去追问自己所遭遇的每一个物和事件是由何种过程构造的,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正是基于过程的辩证思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由资本循环过程所规定和限制的社会系统。产生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物质空间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理所当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以过程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就自然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

哈维进一步强调,“内在关系”是过程辩证法的根本原理。莱布尼茨是内部关系思维的先驱,他在建立“单子论”这一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提出了有关内部关系的特殊观点。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是基于对近代唯物主义物质观自身缺陷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连续性的规律”是宇宙间的一条基本规律,是不可否认的。同时又认为万物既然是复合的,那就必须由一些真正不可分的“单位”构成,因而“不可分的点”也是不能否认的。

<sup>①</sup> [英] 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构成万物的最本源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者仅就物质的广延性、就事物的量的方面着眼,是永远不可能克服这个矛盾的。因为,凡是具有量的东西总是无限可分而不是单纯的,因而真正的实体就应该是一种只具有一定的质而不具有广延性之类量的规定性的东西,可见,他的“单子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原子论。因为“单子”不具有广延性,就不可能是物质性的东西,而只能是精神性的东西,莱布尼茨的“单子”就是一种精神性的实体。由于单子是具有“知觉”的精神实体,莱布尼茨就认为每一个单子凭它的知觉能力都能反映整个宇宙,就像一面镜子能反映整个世界一样。这样,“单子”就把一切存在都内在化了,也可以说,全宇宙就在每一个单子之中。简单来说,莱布尼茨的立场就是:“一切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这种相互联系和适应,由此及彼,直至其他一切,使每一单纯实体具有表达其他事物的联系,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而永久的镜子。”<sup>①</sup>哈维指出,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可以推论:由于我是一个具有精神性的单子,并且把万物都内在化了,那我在理解宇宙时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注视内在自我,“我”成为了万物的尺度,对自己内在状况的深入反思是获得全部宇宙知识所必需的。哈维把这称为“莱布尼茨奇想”,这将导致人们退回到孤立的自我,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哈维认为,莱布尼茨的内部关系学说一方面强调世界是连续性的,内部关系把所有现实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内部关系固定僵化到单子这一实体之中,认为“单子”把一切内部关系都内在化为自身了,所以通过“单子”就能理解世界全部。这实际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为调和这一矛盾,莱布尼茨又提出了前定和谐学说。所谓“前定和谐”是指:上帝在创造每一单子时,就已全部预见到了一切单子的整个发展情况,因此预先就已安排好使每个单子都各自独立地变化发展,而又自然地能和其余一切单子的变化发展过程和谐一致,这样也就不会因每个单子自身的发展而破坏整体的连续性了。这样,莱布尼茨就把“单子”规定为没有窗户的封闭实体,是通过上帝的预先安排来反映宇宙的。

应该说,莱布尼茨克服和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机械的物质观,深刻认

<sup>①</sup> 陈乐民编:《莱布尼茨读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识到任何事物都处在内在关系之中,但他又把这种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具体的、现实的内在关系抽象化为某种精神实体(上帝)的预先安排,这就为内在关系思想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棘手的难题,即如果万物皆为流,那我们如何在根本上谈论任何特殊或者个体呢?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尔曼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奥尔曼在批判性地吸收和继承莱布尼茨内在关系学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在他看来,内在关系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据和支柱,内在关系辩证法的基本信念是: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事物与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作用形成了内在关系。这表明,任何事物本身就是一种关系,而现实就是由这种关系构成的一个关系整体。哈维认为,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实际上是坚持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则,强调在具体的社会现实过程中来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现实的社会过程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人类实践活动所造就的,由于引入了“实践”概念,我们就能认识到事物是如何构造、维持并融入过程之中的,以及全部实体是如何彼此相关地被定义的,莱布尼茨留给我们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哈维认为,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将其吸收整合进自己的过程辩证法中,不仅强调世界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而且更加注重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入手来理解现实世界。

哈维指出,如果按照莱布尼茨内部关系学说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就会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马克思认为,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是资本循环过程的独立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把其他条件内在化了,然而,“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sup>①</sup>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生产环节是根本的。对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因为生产是唯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一有重大意义的范畴,所有其他环节都在那里被内在化了,所以我们只有使生产环节革命化才能改变整个世界。哈维尖锐地批评道:“这完全是借历史唯物主义之名把有关内部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做法。”<sup>①</sup>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具有莱布尼茨主义的特征,实质上是把“生产”看成封闭的环节,而不是在持续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之流中的开放环节。受奥尔曼内在关系辩证法的启发,哈维不是采取单子论的视角,把内部关系观点置于单子实体世界中,而是在过程中来研究内部关系。正是为了把内在化过程理解成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我们就必须把消费、交换和分配看成具有自身重要性的环节。虽然马克思有力地证明了,生产环节在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和社会主义如何可能实现上比其他环节更为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证明忽视其他环节是正当的。“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体都是这样。”<sup>②</sup>我们可以说,哈维所强调的过程辩证法坚持在政治经济再生产全部过程之中来理解不同要素的持续变化和内部化,从而有效抵制了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错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危害。

### (三) 社会过程认知图式

哈维看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莱布尼茨的内在关系学说又有了复兴的趋势,“单子把一切都内在化了”演变为“话语、文本把一切都内在化了”。人们对话语、文本的作用和意义过分强调,德里达提出的正确的辩证主张——“文本之外无物”被错误地转换成“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文本得到理解”,认为只要对话语和文本进行解读和解构,就能够认识整个世界。这实际上是把思想和话语当做是推动社会历史变迁的决定性力量。针对这种试图将话语孤立在社会过程的其他环节之外来探讨的错误做法,哈维设计了一张“社会过程辩证认知图”来再现社会过程之流,阐明社会过程各环

①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节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

哈维设计的社会过程认知图式由六个环节构成：话语、权力、信仰/价值/欲望、制度、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流入、贯穿并包含着所有这些环节，并且每个个体的行为都同时包含所有这些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被建构为其他环节在社会和物质生活之流中的内部关系。就话语环节而言，话语既表达了人类思想、幻想和欲望，也在制度上依据于、在物质上受制于、在经验上植根于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表现形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话语确实把在其他环节上发生的一切都内在化了。但是，哈维强调，因此而使话语凌驾于其他环节之上也是不恰当的、误导的，甚至是危险的。认为对“话语”这一个环节的研究就足够理解社会过程的总体性，这种想法只看到了话语环节所获得的表面上自主的对社会生活的规训权力，以至于忘记了正是过程构成并支持着话语环节，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单子唯心主义陷阱和“莱布尼茨奇想”的错误。哈维指出，应当运用过程辩证法的内在关系观点来理解“话语环节把一切环节都内在化了”的真实含义：“话语环节是权力的形式，它是信仰和欲望构型的模式，它自身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关联的模式，一种物质实践，一种根本的经验环节。无论话语如何抽象以及看起来如何超验，但它们绝非纯粹的、孤立或隔绝于社会生活的其他环节。它们也绝非隔绝和独立于那些设计话语的人。”<sup>①</sup>可以说，正是由于哈维从社会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话语环节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从而防止了对话语环节与其他环节的内在关系进行唯心主义理解的错误倾向。

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解上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在过程中理解内在关系”的精髓。哈维说：“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实践中，马克思探寻政治经济权力的替代形式时，他运用了社会行动的全部环节。在分析工作和政治学中，他都自由地在各个环节之间穿梭。”<sup>②</sup>虽然，马克思相信，对于全部人类知识以及对在世界中“存在”之意义的理解来说，物质实践环节具有优先地位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质

①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②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实践是唯一的变迁杠杆，“它们是这样一种环节，所有其他的作用和力量（包括物质实践内部的作用和力量）都必须聚集在其上，以便变迁成为（经验和物质的）现实而不会仍然是一种想象和虚构。”<sup>①</sup>在哈维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理解为由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实践所复制，而且也由意识形态（话语）、制度（不仅包括国家机器，而且包括学习、法律和宗教制度）这些霸权力量所复制。因此，科学的社会理论必须聚焦于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破坏性逻辑，同时理解上述政治经济权力的生产机制。哈维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正是以这种方法论为指导，着重探讨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产生的总体性后果，从而揭示出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的内在矛盾。

## 二、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路径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主旨是将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状况，以补充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哈维建构这一理论的路径可以简要概括为：首先以过程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提出自己的空间观，即“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然后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说明资本积累过程是产生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现象和问题的根源，并从中揭示出当代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之间的矛盾关系；最后在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空间批判中探寻全球化时代的解放政治道路，建构人类理想的社会空间模式，最终完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 （一）确立空间观的基本原则——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从空间角度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首要的就需阐明他对“空间”的基本认识。人们最早对于空间的理解只是将其看做自己身体占据的某个场所或自己所处其中活动和生活的某个区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的生产场所、活动地点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关于空间的认知开始从感性的认知阶段进入到理性的认知阶段。但在整个近代认识论那里,空间也还是作为一切存在和发生的场所来认识的。可见,人类关于空间的传统认识模式是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的,实际上空间的社会性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文化更为重要。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人们聚于一个特定的场所(例如会场、餐厅等)中的时候,处于较高地位的人总要占据宽敞、核心的位置,而地位低的人则要退居偏僻、局促的位置,这明显表明社会关系投射在空间关系中。第一个明确提出重视空间的社会意涵的是列斐伏尔,哈维继承和发展了其空间观,批评以往的空间观没有认识到空间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完全忽视了空间的社会性,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出空间的本质。

在哈维看来,“空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关键词,它的作用是个复合词,而且有多重的决定因素,所以,它的任何特定意义都无法孤立于其他意义来理解。哈维归纳出历史上三种理解空间的不同方式:<sup>①</sup>第一,绝对空间,这是牛顿和笛卡尔对空间的认知。绝对空间是预先存在且固定的结构,可以从事标准化的测量和计算。就几何学而论,它是欧几里得式的空间,因此是各种地图绘制与工程操作的空间。就社会面而言,这是私有财产和其他有边界的疆域(国家、行政单元、城市规划与城市网络)的空间。第二,相对空间观念,这种空间观念的形成与爱因斯坦以及非欧几何学有关。爱因斯坦指出,一切形式的空间测量都取决于观察者的立足点和参考框架,因此就会产生相对空间。例如我们可以凭借以成本、时间、运输模式来衡量的距离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相对区位地图,打破由有边界的领域所界定的绝对区位。第三,空间的关系性概念常常与莱布尼茨联系起来,明确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关系性的空间观念认为,在界定空间与时间的过程之外,没有空间或时间这样的东西存在。过程并非发生于空间之中,而是界定了自身的空间框架,于是,空间的概念镶嵌于或内在于过程。因此,我们不可能把空间和时间分割开来,必须聚焦于时空的关系性,而非孤立的空間。时空的关系性观念暗含了内在关系的观念:外部的影响通过时间内在

<sup>①</sup> 参见[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王志弘译,台湾群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18页。

化于特殊的过程之中。在某个空间点上的事物无法仅仅诉诸那个点上存在的东西来理解,它取决于围绕着它周围发生着的一切其他事物。

空间到底是绝对的、相对的还是关系的?在哈维看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答案是三者皆是:“空间本身既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或是关系性的,它可以视情境而定,成为其中一种,或同时是全部。空间之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与空间有关的人类实践而解决的。换言之,有关空间本质的哲学问题没有哲学上的答案,答案在于人类实践。因此,‘空间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代之以‘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和使用不同的空间概念?’”<sup>①</sup>可见,哈维强调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的、客观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换句话说,空间的客观化不能从思想、观念和信仰世界而要从社会再生产物质过程来理解,是社会过程才规定了空间的客观化。因此,哈维要求从社会过程来理解空间形式,“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是哈维空间观的核心立场。

空间形式不是空洞的框架,而是社会过程的展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空间形式不是被看做无生命的对象,而是被看做包含社会过程的事物,同样,社会过程也是空间的。如何最好地描述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个问题本身是由实践来回答的而不是事实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问题。”<sup>②</sup>哈维空间观的实质是要求将空间放在社会过程中进行考量,揭示出空间被社会过程所塑造的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过程的。这突出反映了过程辩证法在空间问题上的应用。过程辩证法认为,脱离于过程而孤立地研究事物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决定了哈维不是单纯地分析空间形式本身,而更多地是分析造成空间形式的社会过程。具体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构型,哈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将要研究的社会再生产物质过程定位在资本积累过程上,坚定地 从资本积累过程出发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产生的动力机制,把一种独特的时空构型(资本主义的城市)与生产方式的运动(资本积累)联系起来考察,把一种独特的时空体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某种权力机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3, p.14.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3, p.11.

制(资本积累的扩张)联系起来分析。哈维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地理空间布展放到资本积累过程中来认识和理解,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又使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分析和批判,从而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的产生根源和本质。可以说,哈维是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这一理论路径来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

## (二)揭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扩张

以人类生活空间的规模为标准,我们可以将社会空间依次划分为日常生活空间、城市化空间、国家空间和全球化空间。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化空间和全球化空间。

由于包含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的资本积累进程主要集中发生在城市这一空间中,城市化空间自然成为哈维进行空间研究的重要对象。哈维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城市中,“空间”呈现出两个典型的特征:第一,空间不再仅仅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纯粹的容器和场所,而是同其他商品一样被有意图和有目的地生产出来的,从而主动地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商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空间商品化的结果是建造了各种固定与不可移动的运输设施(公路、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工厂和其他生产与消费手段的物质设施。这些空间结构总是处于不断地破坏与重建中,从而造就了资本主义城市不平衡发展的地理景观。为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特征和本质,哈维深入研究了支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的资本积累过程。

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哈维发现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是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因。哈维认为,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投入资本,扩大生产,最终导致了资本的过度积累。为缓解过度积累危机,为过剩资本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和渠道,资本转向投资于固定资本。由于固定资本规模大,周期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生产力、劳动力和资本,从而通过时间上的延迟使过度积累的资本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未来的用途上去,因此投资固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主要手段。在不断吸收过度积累资本的推动力下,大量资本投向固定资本项目,从而建

造了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住房、学校、公园等城市物质基础设施。这些人工建造环境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间生产。但是,由于城市建筑环境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很难在短时期内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出去,这些本来是为了克服空间障碍而建立的空间设施却很快成为限制和束缚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为了新的资本积累需求,资本主义不得不破坏既存的空间设施而建立新的城市建筑环境。至此,哈维就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结构总是处于不断地破坏与重建中。

对于全球化这一当代最典型的空间形式,哈维同样是从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入手来说明全球化是如何产生、形成和不断扩大深化的。上文中我们已经论述了城市空间生产可以有效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但仅仅依靠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是无法完全消化过剩资本的,于是,资本开始寻求向资本主义体系外部开拓积累的新空间。同样出于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不断向外进行地理扩张的,全球化随之发生了。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拓展的过程也是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空间都被纳入到了资本积累逻辑中,最终形成了全球空间生产。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状况一样,全球性的空间生产活动为降低空间障碍和空间成本而不断进行地理重组,造就出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

由此,哈维得出结论: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发生必定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全球资本空间扩张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必然产物,它们既是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有效手段又是其重要结果。

### (三) 探索消灭空间剥削和压迫的解放道路

通过研究资本积累过程和空间生产的关系,哈维揭示出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从“物的生产”向“空间的生产”的变迁,但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不可能发生改变,仍然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并未消除,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哈维告诉我们,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就是空间生产及其所塑造的地理环境,这种新的空间剥削和压迫形式在城市

化空间和全球化空间中都明显地反映出来。

首先在城市化空间中,空间生产在克服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加速资本周转,实现资本快速积累与扩张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因为城市空间构型既是按照资本增值需要而产生的,也是劳动者的消费手段和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积累的要求对这些空间进行不断地摧毁和重建,而不考虑对劳动者生存空间的剥夺和破坏,这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和劳动者生存之间的冲突。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其次,在全球化空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将资本主义扩张至全球,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吸收过剩资本,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占有和控制落后国家的优势空间资源,对这些地理空间中的自然资源、能源和原材料进行掠夺。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的空间生产和地理扩张势必引起落后国家的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因此,全球空间生产使全球空间结构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对抗,全球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和支配空间以获取利润的要求与落后国家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空间需要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当今世界围绕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支配和空间消费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争夺空间已成为当代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其实质仍然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因此,要消灭空间剥削和压迫,从空间生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只能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资本的逻辑。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阶级斗争策略问题,哈维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凭借空间生产进行空间规划和地理重组,使处于不同时空环境中的劳动者拥有相异的身份和追求不同的利益,因此,应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上的斗争目标,强调不同规模上围绕空间规划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组织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连接各种地理规模上的政治行动,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从而把社会主义事业从乏味的同质性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和人类的解放。

总的来看,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与马克思、恩格



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和批判，这对应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然后从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一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在哈维所处的时代，这一矛盾则表现为空间生产的全球化与空间资源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最后，它们都将理论落脚点指向了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要根除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除阶级剥削和压迫，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持同样立场，认为要根除资产阶级对空间资源的私人占有，消灭空间剥削和压迫，“跨越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在于劳动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社会过程的全部环节。”<sup>①</sup>当然，哈维也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地理重组对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力。因此，围绕空间规划的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哈维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基于空间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而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理论成果。

### 第三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挑战，哈维试图通过弥补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空间角度的缺失，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成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及其内在矛盾的有力理论工具。可以说，哈维的理论努力确实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实质，从而有效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他所建构的历史—地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理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对哈维的整个理论发展的影响来看,其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是哈维整个理论的根基,也是哈维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论。

###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时,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总结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却并没有印证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当代资本主义非但没有走向衰败,反而经过自身的不断调整而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如何解释资本主义何以历经危机仍绵延不绝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基本难题。我们认为,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庸俗化和教条化解释堵塞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真含义的道路,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封闭的结论而不是开放的方法,从而无法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给我们提出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错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和探讨。许多理论家开始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空间视角的缺失有内在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列宁、卢森堡等人提出了资本积累与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地理布展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表现形式。再比如由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总体性辩证法实际上也暗含着空间批判视野,也就是说,把资本主义当成一种总体性空间来批判。真正把空间问题作为一个显性主题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当属列斐伏尔。他声称,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才能有效分析和批判全新的资本主义现实。哈维从地理学的视角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思路,他所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具体回答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存在的难题,从而回应了当代资本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

哈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内含空间维度的,但受传统空间观影

响的历史目的论教条湮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中,对“空间”的阐释只是简单援引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观点,将空间看做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物质容器。由此空间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成为纯粹自然的存在。因此,在历史目的论那里,历史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生产过程和具体的时空条件成为了抽象空洞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自然就不会去关注社会历史的具体过程,也不会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的意义。虽然哈维没有直接批判历史目的论,但他试图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理论努力却恰恰击中了其要害。

由于哈维克服了传统空间观的局限性,确立了“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空间观,这就将历史生成过程与空间有机联系起来,要求将空间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予以理解。具体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哈维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论证了空间生产对资本积累的重大意义以及它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当代资本主义正是凭借全球空间生产才暂时克服了自身固有的界限和矛盾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至此,对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难以回答的问题,哈维就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未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告诫我们,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压迫消失了,更不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客观规律失效了。因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是通过开辟吸收过剩资本的空间来维护和稳定资本主义体系的,但全球空间毕竟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盲目无限的地理空间扩张最终将招致没有可供吸收过剩资本的空间的结局。因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同样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它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同样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也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空间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空间生产中,一方是资产阶级占有和剥削空间以获取利润最大化,另一方则是无产阶级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维护,两方之间的对立明显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因此,哈维指出,虽然马克思所描绘的赤裸裸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似乎不存在了,但它却是通过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地理重组而以另外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当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远没有消失。为此,哈维坚定地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总之,哈维在引入空间维度来回答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难题时,既维护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又为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提供了独特的空间视角。应该说,哈维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较之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更能适应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需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 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虽然哈维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sup>①</sup>的想法是在其《资本的城市化》(1985年)一书中,但在其早期的地理学论文中,哈维就指出,全部的地理学必然都是历史地理学,并因此强调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时空变迁来理解当代地理。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始终贯穿于哈维的整个理论探索过程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既是推动哈维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方法论,又为其理论确立了基本的价值目标。

作为地理学家的哈维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批判的人文地理学,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道路。在哈维早期研究中,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实证化背景下,他基于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地理学科学方法论,并在西方地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后不久,20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争论促使哈维开始反思实证主义地理学。哈维认为,“严格的科学绝不中立于人类事务,试图将自身置于历史之外最多带来严格的和善意的伪科学,实证主义便是最好的例子。”<sup>②</sup>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地理学成为了一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xi.

<sup>②</sup>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p. 255.

种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只是对自然、地理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进行纯粹客观地研究。这种摒弃了地理环境与人类实践、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之间联系的地理学是不可能提供解释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状况的真正知识的。于是,哈维开始潜心阅读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1973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逆转其早期的实证主义倾向而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反对科学的价值中立,承认理论本身包含着价值。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地理学内含的价值问题呢?哈维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归结为过程辩证法就为我们作出了回答。在哈维看来,传统地理学把空间视为脱离人的社会活动的纯粹空间,而没有认识到地理空间深深地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它本身就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对空间本质的错误认识使实证主义地理学不可能去探讨自身的价值问题。可以说,传统地理学的失误,是与事实和价值二分这个近代哲学的一贯主题相关的。哈维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过程辩证法,以“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一方法论原则来研究地理问题,这就使哈维以过程视角消解了地理现象之永恒性外观,并揭示出隐藏在其背后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在长期的地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哈维始终寻求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地理学知识的元理论地位,从而更好地发挥地理学知识作为政治规划的功能。所以一般认为,哈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发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sup>①</sup>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推动哈维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不仅起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而且还为其地理学研究确立了基本的价值立场和价值目标。哈维在1984年提出的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纲领中,强调“建立一种应用的人民地理学,不把它归之于狭隘的和有势力的特殊利益,而是建立在其概念上的广泛的民主性之上。地理学是一种政治事业,这种事业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sup>②</sup>可见,哈维的地理学是站在人民大众的政治立

①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1页。

②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0.

场上,包含着替代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诉求。

哈维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和固定的理解实体”。<sup>①</sup>也就是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方法,而不是僵化的结论。因此,哈维在寻求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时,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一种解释的结果,而是进行解释的框架。所谓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过程辩证法为指导,从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产过程入手寻找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状况形成的根源,揭示内含于地理环境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矛盾,最终重新界定社会解放的路径。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空间批判。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行批判。从“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一方法论原则出发,哈维将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视为资本积累过程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资本为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总是有加速周转时间,消除空间障碍的冲动,这直接推动了交通和通讯业的革新和发展。而交通和通讯系统必须通过固定空间的生产,即建造公路、运河、铁路、机场等物质基础设施才能运转,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独特的地理景观。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为过剩资本寻找新的获利空间,必须不断进行空间的生产,开辟资本积累的新空间。因此,“空间生产”赋予了“空间”以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使“空间”不再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容器和场所,而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承载,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借助于空间生产,资本主义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规模,使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稳定持续地运转。哈维对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之间关系的探讨,揭开了空间生产的神秘面纱,揭示了空间生产的本质,即仍然是以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得以延续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城市为主延伸到区域——国家——全球的空间生产体系。

以空间生产批判理论为基础,哈维在研究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阶级矛盾时,将其产生根源归结为城市空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41页。

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在哈维看来,城市中各种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环境的扩建和改造都是空间生产的对象,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地理景观都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因此,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然而,城市空间生产又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城市中的建筑环境原本是为了吸收过剩资本而建造的,但由于资本不断开辟积累新空间的需要使它很快又会成为限制和束缚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城市总是处于不断地破坏和重建中。同时,城市空间生产使大多数优质空间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对象,从而剥夺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城市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因此,哈维指出,只要以扩大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城市空间生产还存在,资本主义城市危机就不可能化解。

对于全球化这一更大规模的地理空间,哈维同样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前所述,资本主义通过生产空间来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空间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它必然会跨出本国的国界之外,在全球开拓新的资本积累空间。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向外的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开启了全球空间生产,使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都能在全球化空间中不断得到调整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空间生产完全是为资本积累的需要而服务的,资本主义通过新的空间控制手段剥削和压迫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使其成为全球空间生产链条中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因此,哈维指出,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平衡地理发展不断加剧的过程,全球空间结构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矛盾和对抗。通过对全球空间生产的批判,哈维揭示出了全球化的本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空间剥削和压迫,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实质上仍然是阶级矛盾的表现,因而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通过阶级斗争才可能真正解决。

可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丰富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拓宽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维度,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

## 第三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 资本积累理论

哈维是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并进一步探寻对其进行替代的道路。因此,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主要探讨的是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必然关系。按照哈维的理论逻辑,受资本积累动力机制的驱使,资本主义生产出了大量空间(人工建造环境)来为资本的快速周转提供便利,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无一不体现着资本积累的逻辑。由于资本积累问题的重要性,从1973年以来,哈维就从“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一方法论出发,坚持不懈地研究资本积累过程,逐步形成了地理学唯物主义框架下的资本积累理论。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将空间和地理要素整合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从而阐明了空间生产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由此批判了由资本积累所造成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状况。

### 第一节 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框架

#### 一、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来源——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积累理论进行空间重构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积累理论的空间向度长期被忽视了。这有部分是马克思的过错,因为他关



于该课题的著述总是零星的且常常是粗略的。但是,仔细检视他的著作就能够发现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积累是发生在一定地理学背景下并且会创造出某种特殊的地理结构。”<sup>①</sup>在哈维看来,这种独特的地理结构是资本积累动力的必然结果。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并试图对其中蕴含的空间思想进行丰富和发展。

### (一) 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与空间问题

在哈维的理论视域中,空间问题是与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论述。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增长理论是将资本积累置于核心位置,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的发动机,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动力。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不过,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并非源自资本家固有的贪婪,相反,它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众所周知,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取超额利润必须以不断扩大的资本供应为先决条件来进行技术创新和扩大生产规模。所以,马克思说:“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sup>②</sup>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自发性与无秩序性导致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倾向”。<sup>③</sup>资本家不断扩大市场上的商品数量与总价值,同时又力图藉由压低工资来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这就限制了大众的购买力。这种过度生产引发了现实的危机:市场上有大量的商品却找不到购买者。当然,这种过度生产只是相对性的,它只关心由支付能力所支撑的需求,而与人类需要没有任何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相对于全人类需要和需求的绝对过度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度生产由于对劳动力进行最大化的剥削,没有考虑市场的实际界限与需求的支付能力,因而导致了对剩余资本的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而这些都是资本过度积累

①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7.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2页。



问题的表现形式。因此,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可以得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发生必定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周期性出现的长期失业、低就业、资本过剩、缺乏投资机会、利润率下降、市场中有效需求的减少等危机都可以追溯到资本过度积累的基本趋势。

哈维依据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判断,进一步从空间视角发挥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在分析如何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过程中论证了资本的空间生产的作用和意义。哈维指出,危机的克服需要提供以下条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的降低,剩余资本被吸引到新的高利润生产部门,产品有效需求的扩张,等等。为创造资本进一步积累所需的这些条件,哈维提出四条途径:<sup>①</sup>第一,把资本渗透到新的活动范围:沿着资本主义路线重新组织既有的活动形式,或者在生产系统里扩张市场交换点以及使分工多样化;第二,创造新的社会需求与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产品线,将消费组织成合理消费,从而适应资本积累过程;第三,由于渐增的人口是资本积累能够持续进行的基础,因此要促进和鼓励人口以某种跟长期资本积累一致的速率进行扩张;第四,在地理上扩展到新区,增加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并且朝着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而扩张。哈维总结说,通过以上某条途径或它们的某种组合,资本主义可以创造出资本积累的新空间。前三条途径实际上可以视为特定空间结构内社会活动、市场及人口的内部调整(intensification),最后一条途径是向外部的地理扩张。哈维认为,当特定空间结构内部的调整变得越困难,空间扩展对维持资本积累而言就越重要。总的看来,哈维试图从空间维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过度积累理论,而得出了两个结论:一个是资本积累在固定的空间结构内部的调整,哈维把这称为资本积累的“时间修复”,另一个是当这种内部调整失灵时,资本寻求外部空间转移,哈维把这称之为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在资本寻求时空修复的过程中,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生产的矛盾明显地呈现出来。

<sup>①</sup> See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2.

##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与空间结构生产

马克思说：“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正像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sup>①</sup>因而资本就有强烈的动机把流通时间降低到最小值，以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就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很好的规划来尽可能减少资本流通所占用的时间。在时间上，要尽量使资本的流通时间降到最低。在空间上，资本要尽力去消除空间上的障碍，提高商品的运输能力。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过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②</sup>这就是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重要思想。哈维指出，马克思虽然注意到了时间的加速和空间障碍的消除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但他并没有展开详细讨论和分析，有必要对之加以丰富和发展。

哈维认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积累既依赖于通信和运输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它的发展。通信和运输系统的成本、速度和能力直接与资本积累有关。在资本积累动力的推动下，通信和交通技术不断革新，一方面降低了运输成本、减少了运输时间；另一方面开发了大量的远距离市场，这都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新的空间。因此，通信和交通运输中的投资和创新对资本整体来讲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投资于交通运输系统的交换价值被用来为资本的空间运动创建了有效和理性的空间结构形式。这种空间结构形式具体表现为公路、铁路、运河、机场、港口与码头等固定与不可移动的交通运输设施。在这里，哈维向我们阐明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积累动力如何造就了空间结构的生产。哈维还进一步分析了交通和运输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地理上的变化。一是加剧了地理集中。交通和运输手段的改良总是趋向于已经存在的市场的方向。也就是说，朝向生产和人口集中的大型中心，朝向贸易中心，朝向大型的进出口港等。这些特别大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交通设施所促成的资本加速周转又导致生产中心和市场更快速的集中。二是促进了地理扩张。交通和通讯设施的不断变革在地理上扩大了更多远距离市场,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场所与更广大市场之间的相对距离,因而导致了一些旧的生产中心的倒闭,以及新的生产中心的崛起。这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扩大了地理空间范围。

哈维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集中论述空间矛盾问题,但“马克思的理论肇始于资本积累的动力学,并试图从这种分析里导引出关于地理结构的某些必要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地理景观也被视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而非和谐均衡的表现”。<sup>①</sup> 哈维从资本积累的空间视角得出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生产之间存在着矛盾的结论。在哈维看来,资本为了扩大积累而不断推动交通技术革命以克服空间障碍,这使得既存交通运输空间结构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而被不断破坏和重建。这就是资本主义独特的空间结构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哈维指出,这一矛盾还有一个纬度,即服务于资本主义而建造的人造环境本来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这一普遍趋势的,但最终却导致了利润率下降。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手段上的改善意味着“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增加了”,<sup>②</sup>因此,必定会提高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但是,空间结构自身的矛盾却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使之无法达到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当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空间矛盾无法解决时,资本主义必定会向外部转移,寻求新的空间。为从内部空间结构分析转向外部空间转移的分析,哈维开始考察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

### (三) 对外贸易与开辟资本积累的新空间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哈维认为,马克思是从两个相当不同的立场上来考察的:第一,视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属性;第二,视之为一种将进化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关联起来的历史现象,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中介社会形式(如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等)。在第一个立场

<sup>①</sup>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8.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上,马克思承认对外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作用。对外贸易可以令不变资本要素和必需品更廉价,因而可以占取更高的剩余价值以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但由于这会提升积累率,长期来看只不过加速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哈维认为,由于马克思是在一个纯粹封闭的状态下考察资本主义的,这决定了他总是在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里,抽离了对外贸易问题。因此,对外贸易问题在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上不起关键作用,位居《资本论》中主要论点的边缘。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大多数有关对外贸易的评论基本上是站在第二个立场上来展开的。对外贸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服务于资本积累,既是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也是市场扩张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sup>①</sup>哈维在“对外贸易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新的空间”这一意义上对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我们知道,哈维的整个资本积累理论都是着眼于流通领域的。虽然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都是产生于生产过程,但是,价值的创造取决于通过流通而实现的能力。如果价值无法在流通领域中实现,就意味否定了生产中潜在地创造出来的价值。因此,如果流通领域不扩张,积累就会停止。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项先决条件,乃是持续扩大的流通领域的生产。所以,“就像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更多剩余劳动的倾向,它也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sup>②</sup>资本主义依靠对外贸易不断开拓着世界市场。在对外贸易中,资本家不仅实现了剩余价值,而且还获取了超额利润。一方面以高出商品价值的价格向外贩卖商品,另一方面又以低廉的价格获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一切都牵涉到非资本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关系。

哈维认为,在流通领域里,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互动造就了强大的相互依赖。价值在资本主义系统里的流通,变得依赖于来自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②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64.

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和货币的持续贡献,就此而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位于其自身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为条件的。哈维指出,这正是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长篇讨论的主题。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外贸易是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稳定发展的唯一系统方法。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自身体系之内实现它的全部剩余价值,它必须在纯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市场以维持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廉价生产资料的供应来源和劳动力的后备源泉。哈维十分赞同卢森堡的这一观点,通过对外贸易所开辟的资本积累的新空间,只能是以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存在,它们提供尚未开发利用的市场,以便吸收资本主义体系下商品过度生产的恒久趋势。哈维进一步指出,以开辟资本积累新空间为目的的对外贸易造成了非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资本主义通过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低成本商品,以及运输和通讯手段的改良,征服了国外市场,摧毁了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强迫它们转换成为供应原材料的生产基地。这种对外贸易将非资本主义社会从相对自给自足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经济组织,转变成为生产交换价值的专门化的和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单位。

哈维以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为基础,证明了地理扩张作为资本积累之衍生物的必要性。资本积累的动力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扩张,扩张既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关系的强化,也包括这些关系在空间上的地理延伸。积累过程就蕴含了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渗透到全世界生产与交换的所有方面。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新空间,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地理空间上都占主宰地位时,资本积累就再无新空间可言。所以,哈维认为,虽然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注定资本主义唯有通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可能真正解决矛盾。

## 二、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切入点——使用价值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使哈维认识到固定资本问题对于完整理解资本积累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的资本积累理论从分析固定资本入手,重点指向了使用价值。

哈维认为,马克思将商品看做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物质体现,而整个《资本论》主要是围绕“价值”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的,重点研究“价值”在资本主义的展开形态,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哈维看来,虽然马克思较少分析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概念本身,但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决定了他始终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以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三重关系中来探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马克思的关系性思维方式意味着他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作为解释丰富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固定的、可理解的模块(building block)。如果没有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我们便不能解释价值,同样,如果没有充分理解价值,也不能解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马克思从来不孤立地对待这三个概念,他总是关注这三对关系中的一对或另一对。介于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真正需要把握的。”<sup>①</sup>在这里,哈维强调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目的就是为了把使用价值提升到与价值一样重要的位置,为其从使用价值入手进行分析做好铺垫。

哈维指出,以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线性理解仅仅把价值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把使用价值视为自然之物。他批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使用价值也是一种社会的使用价值,“一旦把它放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被现代生产关系所塑形,并且反过来改变生产关系。”<sup>②</sup>如果我们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考虑劳动过程、生产的社会与技术组织、固定资本等就能揭示出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的功能。以固定资本为例,机器这种使用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也体现了交换价值和价值,并且在调节劳动过程、生产结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机器的生产和使用包含着社会关系,不能把它排除在政治经济学考察范围之外。使用价值不仅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还调节着资本主义消费。由于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劳动者对商品的消费,因此,不断生产新的消费需求对资本积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新的使用价值的发现和创造则能为劳动者提供新的消费需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2.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7.

求和需要。因此,我们应当关注使用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创造和调节社会需求和需要的。

哈维还特别强调,对使用价值的理解必须把它放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来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模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资本家能顺利地将产品销售出去实现价值增值,所以这一模型是严格限定在生产领域,而排除了资本流通过程。但在哈维看来,资本流通过程是整个资本积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因为,剩余价值只有在流通领域中才能真正实现。鉴于此,哈维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使用价值(即固定资本)如何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也正是由于哈维关注于流通领域中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才能够在理论上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生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概言之,哈维将使用价值(即固定资本)作为其资本积累理论的切入点,是为了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空间分析的内在需要,因为这种分析的对象首先表现为物(生产资料等)、场所(工厂)等。正是从使用价值出发,哈维重点研究了固定资本等空间构型的生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使用价值作为切入点,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路径。

### 三、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主题——空间生产

哈维以空间视角来研究资本积累过程,力图将空间生产作为资本积累的积极因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中。所谓“空间生产”不是指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建造。在哈维的视域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动因是资本积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资本积累对加速资本流通的要求推动了交通运输系统的空间生产。在哈维看来,资本要实现价值增值,保持资本的持续积累,就必须既扩大资本流通空间,又缩短资本流通时间。为了减少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停滞,资本就有强烈的动机把流通时间降低到最小值。这种地理上空间障碍的消除必须通过通信和运输产业缩短行程时间来克服。可见,商品流通的实现有赖于运输和通信业,它在商品流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信和



运输能力的提高既可以减少流通时间,又可以扩大流通范围,从而有助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在资本积累动力的推动下,运输和通信业发展迅猛,既为资本积累生产了新的空间,同时它自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建立一定的空间结构,这就表现为固定与不可移动的运输设施(如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等)、工厂和其他生产与消费手段形式的生产。

第二,吸收过度积累资本的要求推动了城市建筑环境的空间生产。为了克服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主义必然会为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固定资本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生产力、劳动力和资本,因而成为竞相投资的对象。在不断吸收过度积累资本的推动力下,大量过剩资本投向固定资本项目,从而建造了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住房、学校、公园等城市物质基础设施。城市空间生产为过度积累资本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和机会,城市空间的建构和再建构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因此,哈维认为,空间生产既是资本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也是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必然结果。虽然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的持续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空间生产可以克服资本积累的空间障碍,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空间的开辟,既定的空间构型(固定资本)最终将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资本因此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种物质景观(physical landscape)来表现自身,创造这种地理景观作为使用价值,以促使资本积累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持续提高。固定资本与不可移动资本所构成的地理景观既是过去资本发展的至高荣耀,也是阻碍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牢笼,这是因为这种景观的营造本身就是与摧毁空间障碍,甚至与‘用时间消灭空间’相对立的。”<sup>①</sup>哈维告诉我们,资本积累的必要性意味着克服空间障碍而进行空间生产的必要性,但在资本克服空间障碍的过程中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空间矛盾,为缓解这一矛盾,资本主义总是不断地摧毁旧的而建立起新的空间生产构型,创造性破坏的历史则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下面我们来看哈维是如何论述资本的动态积累以矛盾

<sup>①</sup>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7.



的方式塑造了当代空间生产与空间构型的。

##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过程的观点。通过对资本三级循环中资本积累危机的表现形式、根源、解决途径等的详细探讨,哈维向我们阐明了资本积累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 一、资本初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哈维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剩余价值的创造,既依赖于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工作日),也依赖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重组)。因此,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以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哈维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初级循环。在资本初级循环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了利润率下降和过度积累危机。个体资本家为了积累而积累,不顾市场限制而不断扩大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同时又力图藉由压低工资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从而限制了大众的购买力。这在生产领域产生了种种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利润率下降、资本闲置、劳动力闲置或对劳动力剥削加强等。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资本家迫于竞争、阶级斗争的压力而纷纷采取先进技术和寻求有利位置来为自己获取超额利润。我们看到,单个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使用技术变革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并通过这种手段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反对其他资本家,并在阻止工人阶级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斗争中反对劳动者。技术的革新一方面能减少固定资本和流通中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短工作周期和生产与流通的时间,从而通过不断加速周转时间来克服不断分工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争夺有利地点和位置也是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在哈维看来,好的地理位置由于较低的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良好的配套服

务从而能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进行生产,因此,位置和技术一样在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中都是积极的因素,相对的位置优势也可以转换成超额利润。

哈维认为,超额利润的两个潜在来源之间的关系值得详细考察。通过技术变化寻求超额利润并不能独立于通过位置改变寻求超额利润。从位置上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在多大程度上由于生产资本流动或地租占有被消除,单个资本家就在多大程度上被迫通过技术变化来寻求超额利润。而技术变化明显又为通过位置获取超额利润打开了新的可能。换句话说,生产越是接近某种空间平衡条件,单个资本家通过技术变革打破这种平衡的动力也就越大。因此,从先进技术或有利位置获取超额利润都是暂时的,一旦其他资本家采用相同技术或变换到相同优势的位置时,它就会消失。哈维提醒道,从长远角度看,“必要的技术与空间竞争不断地被偶然性暂时地破坏,并且单个资本家的行为倾向于不断地破坏经济体系的稳定。”<sup>①</sup>一方面,技术变化并不能稳定资本的价值构成和利润率。因为单个资本家之间无政府主义的技术竞赛阻碍了任何技术革新的理性应用,从而威胁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破坏了资本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单个资本家围绕有利地理位置进行激烈竞争,从而不断废弃之前的固定资本投资,不断破坏原有的空间结构,带来了大规模的贬值。可见,单个资本家为抵抗利润率下降规律而追逐超额利润造成的后果是使整个经济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发展,并把整个资产阶级带到了危险的境地。

以上就是哈维提出的第一级危机理论(The first-cut theory of crises)。第一级危机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稳定性根本原因,即单个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单个资本家按照自私自利原则行动时,这些单个资本家行为聚集的整体效应与他们自己个体和集体的利益相违背,这种矛盾破坏了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哈维认为,马克思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危机,但他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应付或延迟这种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了。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工业生产的初级循环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 189.

产生的危机逼近时,资本主义通过时间修复手段来吸收过剩资本,将投资转向次级循环。

## 二、资本次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 (一) 资本积累的时间修复策略

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没有考虑固定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使用与流通,而固定资本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固定资本是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的,由于它的特殊实现方式、周转方式与再生产方式,它以新的资本形式来加速资本积累速度,也是一种阻碍利润率下降的手段。固定资本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生产力、劳动力和资本。所谓“时间修复”就是通过固定资本投资来推迟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哈维把资本流向固定资产与消费投资的形式称为次级循环。

在资本次级循环中,由于时间上的推迟使过度积累的资本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上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因此,固定资本的规模越大,周期越长,效果就越好。在不断吸收过度积累资本的推动力下,大量资本投向固定资本项目,从而建造了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住房、学校、公园等城市物质基础设施。资本投资于城市人造环境使资本在次级循环中获利,但这只是暂时缓解了资本积累的矛盾,从长远角度来看,它并没有根本解决矛盾,过度积累的趋势并没有消除。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流向次级循环,过度积累这一基本矛盾在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中重新生产了。哈维指出,这是由固定资本的本身特征所决定的。固定资本项目作为使用价值发挥作用时,必然要求将包含在其中的交换价值转化为物质财富。锁定在这些物质使用价值中的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固定在固定资本生命周期内对它的完全使用来偿还。但是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固定资本在短期内不可能轻易转化完成,因此它实际上是将生产力固定在某种水平直到其偿还期结束。这就使生产与消费系统不断被局限在某种固定的方式中,不断地束缚于特定的生产线,阻碍了资本的灵活积累。资本家寻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动力决定了他们必然不断追求技术革新,当更新、更便宜和更有效率的固定资本被生产出来并

投入使用时,虽然原有固定资本的投资偿还期并没有结束,但其经济使用期的价值已经完结,凝固在旧的固定资本里的交换价值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大规模贬值。如果拒绝这种贬值就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将最终阻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此,资本家必然会加速对老的投资项目的贬值甚至破坏而追求新的固定资本形式。如果技术革新的速度是稳定的,如果资本主义能够确定未来技术,那么,它有可能有计划地作废固定资本,并根据某些理性计划维持固定资本的流通。但是,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成功控制这种技术变化的,计划废弃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固定资本循环被卷入技术变革、不平衡、危机形成、过度积累和贬值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力量之中。”<sup>①</sup>

资本次级循环中的空间生产不仅包括直接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投资,也包括消费基金项目的投资。哈维指出,某些商品在消费领域中发挥着与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类似的作用。这些商品不是被直接消费,而是服务于消费的工具,包括各种物品,如住房、公园、人行道等,所有这都可以看做是消费基金。消费基金与固定资本的区分不是以它们的直接物质存在形式为标准的,而是以其用途为标准的。作为消费基金的商品与作为固定资本的商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消费基金中物品的物理与经济使用周期是相同的。因为在消费领域中不会发生围绕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竞争主要是围绕如何制造消费需求而展开,因而是与不断变化的奇思妙想、时尚和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欲望相关。因此,作为消费基金的商品的经济价值不会像固定资本那样作废。消费基金有维持资本价值的作用,而不至于使其贬值。但是,消费基金吸收闲置货币资本的能力是受消费者未来收入流通限制的。为了提高消费能力,资本主义就通过信用体系帮助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这样,由于消费者的未来收入是来源于未来劳动,会严重超出未来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消费基金中的过度债务与固定资本中的过度投资一样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以消费投资形式存在的财富在危机过程中也会遭受贬值。

总之,过剩资本转向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是避免资本贬值的时间修复手段。但这种吸收资本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定。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 222.

一是固定资本的实现取决于生产性消费的提高,这又会产生更多需要吸收的资本;二是消费基金的实现取决于未来收入对当下负债的足额支付。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固定资本无法顺利吸收不断增加的过剩资本,那么过度积累的危机会再次出现。哈维认为,正如在初级循环中资本可以投资的空间范围会枯竭一样,在次级循环领域也会由于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而使投资机会很快饱和。城市环境投资中存在的矛盾和资本过度积累的矛盾两者共同引发了次级循环中资本的危机,造成固定资本和消费资金的贬值,这个过程影响到城市建筑环境以及耐用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城市危机就是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

## (二) 信用体系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

对单个资本家而言,将资本从初级循环转向次级循环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投资往往是大规模和长期的,由于过多的资本停留在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中,固定资本的流通对资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凭单个资本家的能力还无法将足够的货币积蓄起来以支付购买价格和应对资金周转。并且,许多固定资本的投资项目都是为了公共用途的。正是由于这些障碍,单个资本家一般不太愿意投资于固定资本,他们往往在初级循环中过度积累而在次级循环中投资不足。因此,要想使资本在初级循环和次级循环之间平衡流动就需要有一个总体条件,即一个功能性资本市场的存在,它能够为固定资本物质基础设施的建造提供金融支持。信用体系在便利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流通方面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哈维说,“当固定资本的规模、数量和耐用性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加时,资本主义必然演化出更加复杂的信用体系来处理固定资本流通所产生的问题。”<sup>①</sup>

在哈维看来,信用体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固定资本流通中,它对于整个资本积累过程来说都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的信用体系是资本流通的中枢神经系统,能够协调资本的全面流通。通过信用体系可以把货币资本再分配到各个公司、部门、地区和国家中去,从而促进各种经济活动的整合、劳动分工的产生和资本周转时间的减少。其次,通过信用体系而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由于不关心具体用途,常常能把整个资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265.

产阶级的集体意志施加于单个资本家。通过协调复杂的经济投资决定,避免单个资本家寻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与积累平衡相违背的错误行为,促进利润率平均化。再次,信用在生产体系和消费领域的恰当分配能够确保生产与消费数量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平衡积累。最后,信用体系能够调节工资、地租、利息、税收和利润的分配份额,这就为建立一套有利于平衡资本积累的分配制度提供了可靠的调节手段。总之,信用体系对资本积累来说是一个强大的武器,能够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与实现之间、当下使用与未来劳动之间、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抗。

信用体系的存在是否完全化解了资本积累的危机呢?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给出了正确的答案。马克思认为,由于信用体系只是在交换中而不是在生产中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因此,从长远利益来看,它倾向于产生更糟糕的结果。第一,信用体系所带来的利润率平均化加剧了而不是缓解了通过技术变化来获得剩余价值的竞争。因为技术变化不断加速,落后于过度积累趋势的生产价格带来了错误的价格信号,这就使商品交易是建立在生产价格而不是在价值的基础上,从而加剧了比例失调与过度积累,恶化了资本积累不稳定的趋势。第二,信用体系造就了金融资本家这一特权集团。金融资本家的职责本应该是合理分配货币资本以促进资本的总积累,但由于受竞争的驱使,单个金融资本家都是在为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行动。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们将货币资本当做自己的私人资本而利用信用体系获利。因此,在损害工业资本的基础上占据了大量的现实积累。通过信用体系而大量集中的资本带给这些寄生阶级以巨大的权力,不仅周期性地剥夺工业资本家,而且以危险的方式干扰了现实的生产过程。第三,阻碍信用体系发挥资本积累调节功能的第三个障碍是货币资本不会考虑资本从哪里来并流向何处。一方面,通过信用体系被集中起来的货币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每个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地位,都充当了储蓄者,社会所有的储蓄被集中在一起。任何阶级的储蓄倾向的变化都能改变金融资本与其他资本、尤其是货币资本之间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去进行任何一种类型的投资,当货币资本投向消费与生产者的债务、股票与股份、商品期权期货和地租等领域时,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防止投机投资的完全失控,继而引起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

依哈维之见,信用体系所形成的虚拟资本对于资本积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固定资本制造的进一步积累的障碍只有通过虚拟资本才能被克服。通过虚拟资本的兴起,信用体系才能够支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顺利转型,并能克服来自社会总资本越来越多的以固定资本形式流通的压力。因此,虚拟资本对资本积累非常必要。但另一方面,虚拟资本在实际商品生产与实现之前就创造了虚拟价值,造成了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土地买卖、商品价格和期货中以及各种纸质财富中的投机热,特别是一些创新的金融产品是在没有任何实际生产的基础上继续流通的。这就在信用体系内埋下了各种危险和危机。在哈维看来,“非正常形式的虚拟资本是罪魁祸首,并在信用体系内部发生了高度扭曲。”<sup>①</sup>不断激增的虚拟资本使整个信用体系变得脆弱而不稳定,引发了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产生了第二级危机。

哈维的第二级危机理论(The second-cut theory of crises)“试图把金融、货币危机与之前分析的破坏生产平衡的力量整合起来”。<sup>②</sup> 具体来说,资本主义为化解第一级危机而采取时间修复策略,试图通过投资于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这样做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过度积累的危机,但又带来了新的危机。由于固定资本不易移动、周转时间长的特征使其成为了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迫使资本主义不断破坏既有的物质基础设施,造成了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项目贬值的危机。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流通依赖于信用体系的建立和虚拟资本的形成,这又引发了流通领域中金融、货币的危机。所以,资本向次级循环的流动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第一级危机,反而引发了双重危机,即固定资本贬值的危机与金融危机。

### 三、资本第三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为解决次级循环中固定资本的贬值危机,资本又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以吸收过剩资本。这样,资本向第三级循环(third circuit)转移,即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 287.

<sup>②</sup>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 325.



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及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相关的社会支出。科学技术研发的投资其目的是利用科学进行生产从而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革新。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投资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资本的立场出发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改善,比如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健康使劳动力的工作能力得到提高。另一部分是通过向意识形态、军队及其他形式的投资来同化、整合或压制劳动力。不过,向第三级循环投资的转变仍然是采取的“时间修复”手段,同样不可能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资本在第三级循环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投资,生产性投资机会同样会出现枯竭,过度积累引发的危机会再次爆发。可见,资本无论是流向次级循环还是第三级循环,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相反,在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中还出现了普遍的过度投资趋势。这种过度投资趋势与资本需求相关,而与人的现实需求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住房、工作场所、工厂和港口设施,以及教育系统的容纳能力都将出现盈余,生产投资的潜能在这些领域中被消耗殆尽,资产将会在次级或三级循环中自动终止贬值,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当“时间修复”策略失灵时,资本主义开始采取“空间修复”策略。

### (一)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策略

“空间修复”(spatial fix)是指“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sup>①</sup>简言之,就是通过地理扩张,为过量资本和劳动力创造新的可供生产的空间。这就要求在地理上不断扩展新的区域,增加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探索剥削劳动力的各种新的可能性。哈维指出,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廉价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这种地理扩张、重组和重构经常会威胁到已经固定在空间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这一矛盾不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新的地域的生产实现有效运转也需要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因而矛盾将会不断重复出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现,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成为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资本主义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制造了一个适合于资本积累的地理图景,不久这一图景又因为其成为了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而被摧毁或改造以适应稍后时期的资本积累。

哈维认为,资本想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内部寻找可供资本修复的空间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域内的工人、政治家和小企业联合会会对那些试图抛弃该地而寻找另一个地方的公司企业施加压力。这种联合体的行动越成功,企业的资本就会越迅速地逃离该地,在全球寻找新的资本投资地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和劳动力输出,将盈余资本和劳动力输送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加快新的地域空间的资本积累。一个接一个新的“空间修复”的不断开启,使剩余资本得到了暂时性吸收,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暂时性地化解了资本过度积累所带来的危害,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哈维指出,资本的空间修复策略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动力,资本要不断地寻找新的积累空间,从而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全球空间就是在资本和贸易的控制和支配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

## (二)资本的空间经济危机

哈维认为,资本对空间的争夺引发了空间危机。空间危机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特定地点的空间结构贬值危机。在空间竞争中,占据有利的空间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但由于“空间修复”策略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空间中的快速流动,这就使得之前还处于优势位置的空间有可能迅速转变为居于劣势位置的空间。这是因为,一方面,相对空间距离会随着交通通讯设施的改善而改变,这就使资本失去了在某地区所具有的位置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为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变动,这就使资本在某地区所具有的占有廉价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流动而消失。这种丧失了竞争优势的空间自然会被资本家所抛弃,而将资本投向能获取更高利润率的空间。资本和劳动力的多样化流动破坏了它们最初所创造的空间结构,某一特定地点的空间结构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贬值的危机。正如哈维所说:“贬值总是在特定地方的。它并不是在国土上均衡地扩散。正是这种空间竞争的本质确保了在某个地方的超额利润是在

其他地方贬值损失的代价基础上获得的。”<sup>①</sup>

第二,区域危机。在某一区域内,本来有可能通过内部调整(诸如将资本渗透到新的活动范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和需要、促进人口以跟长期资本积累一致的速率增长等)避免贬值的危机。但由于“空间修复”要求全球每一个区域都对资本流和劳动力流开放,导致这一区域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其他区域向它输出过剩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压力,这种外部压力使地区面临更加残酷的贬值。在贬值的威胁下,每一个地区都试图通过其他地区来减轻自己的内部问题,当前,贬值的斗争在各地区之间交替进行。区域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并迅速形成了新的独立的地区积累中心,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态势面前相互竞争,结果是有的地区得到了发展,而有的地区则衰落了。

第三,全球性危机。由于全球空间是有限的,资本的地理扩张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每个方面、每个领域和世界一切地方都占主宰地位时,那么就几乎没有空间留给进一步的资本积累了。在面临越来越少的可供修复的空间情况下,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贬值、科学技术危机、国家财政收支危机、劳动力生产的危机都将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生,全球性危机应运而生。哈维的第三级危机理论(The third-cut theory of crises)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在施行“空间修复”策略时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全球被分为很多独立运行且相互联系的区域经济,全球性危机则是各种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竞争所造成的。虽然每个区域资本积累都有所不同,但是,过度积累与贬值的趋势对所有区域都是一样的。因此,“每个地区都周期性地在外部关系上寻求一些转型,这些转型将会减轻自身贬值危机所带来的困难。”<sup>②</sup>这种所谓的外部转型,就是借助于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的流动将危机转嫁到本国之外。危机分散成拥有不同货币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通过贸易战、倾销、利息率战、对资本流和对外贸易的限制、移民政策、殖民征服、对附属国的统治与镇压、经济区中劳动分工的剧烈重组等手段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损耗。哈维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395.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437.

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输出资本贬值危机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家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国际帝国主义竞赛最终将演变为战争。当资本在全球空间扩张中,再无空间可寻的时候,哈维给了我们一个悲观的结论:即最终将通过战争销毁过度积累的资本。因此,在这种结局到来之前,必须积极探询未来社会的替代方案的多种可能性,这正是哈维解放政治理论所要达到的目标。

总的来看,哈维对资本积累内在矛盾和危机的分析思路是:资本在初级循环中出现的第一级危机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产生的。其表现形式是工业资本大量贬值,许多公司企业破产,以及工业用地废弃。资本主义通过时间修复策略推迟资本价值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而吸收了过剩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级危机。但当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时,也会出现普遍的过度投资趋势,资本的进一步流动已不能扩展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导致生产投资潜能的耗尽。在次级循环中,危机表现为固定资本和消费投资项目的贬值。在第三级循环中危机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各种社会开支的危机(健康、教育、军事镇压等),消费资金形式的危机(住房),技术和科学的危机,等等。另外,由于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顺利流通依赖于复杂的金融体系和虚拟资本,社会支出依赖于国家经济管理机构,所以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的危机都被自动注入到金融和国家结构中,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信用危机以及国家财政危机。哈维把这种由资本“时间修复”策略而引发的危机称为第二级危机。为解决第二级危机,资本主义又采取了“空间修复”策略通过空间地理扩张来吸收过剩资本。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当资本向全球地理空间不断开辟新的投资领域时,由于资本在全球的空间布展是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为特征,各区域之间,全球与地方之间都产生了空间矛盾,并最终会引发全球危机,即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这就是哈维所称的第三级危机。可见,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入和扩大,资本过度积累和贬值的危机也进一步深化,并在规模和范围上不断扩大。哈维通过对资本循环和积累过程的研究得出:单个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整个资产阶级追求积累稳定平衡发展的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因为“单个资本家都是单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

上竞相追逐利润,这样产生的结果是与他们整个阶级利益相对立”。<sup>①</sup>正是这一矛盾直接制造了不断过度积累的趋势,不断破坏着资本积累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产生了周期性的危机。

### 第三节 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

通过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针对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最典型特征,哈维将其归纳为“不平衡地理发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是产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根本原因。资本要扩大积累必须打破空间障碍和区域差异,然而这又会导致新的区域差异的产生,这些区域差异又会成为需要被克服的新的空间障碍。“资本主义的地理组织使价值形式中的矛盾内在于本身之中,这就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不平衡发展。”<sup>②</sup>依哈维之见,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地理集聚与分散

资本在地理上的积聚能有效实现资本积累。这是因为,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到某个地理空间,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而且也可以缩短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从而加速资本积累。但是,这种积聚的趋势并不是没有物质和社会的界限的。交通拥挤成本、基础物质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不断僵化、空间的缺少给资本积累带来的不利方面远远超过了规模经济所能抵消掉的影响。同时,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积聚激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争夺空间的矛盾和斗争,为社会不安定提供了滋长的温床。于是,资本主义又越来越趋向于地理空间上的分散。对高利润的期望吸引资本家多方向搜寻开发,将资本分散投资于各个有利可图的空间中。其中,信用货币的流通以及消除空间障碍的趋势推动了全球资本流通

①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9.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417.

的快速分散。资本积累之网布展到全世界,使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卷入了资本流通的过程之中。同时,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也会受到巨大限制。在本土扎根的大量资本、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基础设施、依附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资本流动性的限制,这一切都会将资本局限于原地,阻碍资本投向外部空间。

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和分散的趋势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制造资本在地理空间上集中的力量很容易相互结合,并产生对进一步积累不利的过度集中。制造分散的力量也同样容易失去控制。在技术、交通通讯、货币和信用的安排、社会物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革新会具体影响到现有各方面力量的平衡。正是资本在地理空间上时而积聚,时而分散的不稳定趋势造成了资本主义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对抗。

## 二、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

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平衡地理发展还体现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按照哈维的观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城市空间生产意味着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这种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建筑环境的建立提供了有利于资本生产的丰富劳动力和各种服务消费。因此,城市建筑环境既吸收了盈余资本和劳动力,又发挥了使用价值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增强了资本积累。但同时它又限制和束缚了资本积累过程,充当了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源于整个城市建筑环境基本上都是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使用价值,它要求将包含在其中的交换价值转化为真实的物质财富。包含在这些物质使用价值中的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固定资本生命周期的完全使用才能实现。但是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固定资本偿还周期较长,很难在短期内将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收回并盈利,因此它实际上是将生产力固定在某一水平直到固定资本的偿还周期结束。如果在这些老的固定资本项目偿还期结束前就有新的而且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固定资本出现并投入使用,那么仍然凝固在老的固定资本里面的交换价值就会贬值。这样资本必然想要放弃老的投资项目而流向新的且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固定资本项目,从而获取更

加丰厚的利润。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sup>①</sup>

因此,资本在某个特定时刻按照适合资本积累的要求建立了一种物质景观,而在随后某个时期,通常又在贬值危机中破坏它。哈维把这种资本积累活动形象地描述为:“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嵌入在国土中的固定资本)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因此,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sup>②</sup>资本主义城市就在这种破坏与重建中经历着兴衰发展,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状况,造就了资本主义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

### 三、全球空间的不平等结构体系

资本积累为实现空间修复总是力图在空间结构中获取竞争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从而资本总是被推动着向那些低成本或高利润的空间位置转移。所以,“只要有可能,资本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并且确实利用了很多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空间权力。控制关键的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是一件重要的武器”。<sup>③</sup>在资本争夺空间的过程中,资本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快速流动,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嵌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流动使全球地理空间随着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不断重组,主要表现为资本的空间分隔。也就是说,利润、资本的有机构成、劳动生产力、工资率、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成本、技术和机械化的水平以及劳动力的组织等在地理空间上被分隔开来。

①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5.

②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③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这些由空间分隔造成的差异是通过资本投资和社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和部门方面的不平衡分配、劳动力控制中心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生产资料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等各种形式来维系的。所以,资本积累在全球空间的布局造成了全球地理发展的不平衡。

哈维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不平衡的地理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过程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使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交换体系更加深化,导致了落后国家和民族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风险和危机的对象。因此,资本的全球拓展显然并不是一个利益均沾的历史过程,资本空间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落后民族和国家逐渐被边缘化的历史进程。资本全球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性突出体现为中心区域——边缘区域之间的二元化结构。



## 第四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

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哈维紧紧抓住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结构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空间视角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展开了分析和批判。在这一分析批判过程中,哈维阐发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主题: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全球化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 第一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

哈维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社会过程决定社会空间”这一根本原则出发,深刻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形成机制,即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矛盾作用的结果。哈维在《资本的城市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通过聚焦于城市化,我并不想把它当做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化的特殊分析对象。正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过程。研究城市化就是研究资本主义通过自然和社会景观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而展现自身的过程。研究城市化不是研究一种法律和政治实体或者加工物。城市化研究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及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流动和地缘政治冲突;等等。”<sup>①</sup>可见,哈维是在深入发掘马克思关于资本理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xvi-xvii.

论的基础上,延伸和拓展了资本的空间内涵及其与城市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形成了分析城市化问题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哈维批判了城市空间的资本主义殖民化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城市危机,由此阐明了当前城市阶级斗争围绕空间争夺所发生的新变化。

### 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

哈维将空间和地理要素整合进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从而揭示出了空间生产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但哈维并不满足于列斐伏尔得出的“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生产而存续下来”的结论,他要探求的是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是怎样生产出来的。由于城市的建构和发展是空间生产最典型的形式,因此,哈维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哈维研究城市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哈维看来,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包含多种不同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其物质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物”。<sup>①</sup>城市就是由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住房、学校、办公楼、商店、公园、停车场等混合构成的一种人物质景观,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城市化和城市过程就是各种建筑环境的设计和创建过程。哈维指出,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建筑环境的生产与使用过程,就会发现这些固定资本必然与包括生产、交换、消费的资本积累总过程相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这个建筑环境的生产 and 创建本身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城市空间是为实现资本的循环、积累和利润服务的。哈维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运用资本三级循环过程的观点来解释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哈维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初级循环(primary circuit)。在初级循环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了利润率下降和过度积累危机。个体资本家为了积累而积累,不顾市场限制而不断扩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大生产规模,导致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过剩。为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投资转向次级循环,即资本投资于城市这个建构环境。城市建筑环境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生产力、劳动力和资本,因此为资本初级循环中过度积累的资本提供了投资渠道和机会。正是在不断吸收过度积累资本的推动力下,大量资本投向固定资本项目,从而建造了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住房、学校、公园等城市物质基础设施。各种物质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的扩建和改造,使人口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配置和布局不断更新,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生产周期,而且也缩短了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因此,城市空间生产减少了生产的间接成本以及流通成本而加速了资本周转,从而达到了更多更快的资本积累。可以说,整个城市空间就是由资本利润所驱动和支配的结果,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识地创建出来的。总之,在哈维看来,城市这个人造环境为资本主义系统执行了一种重要功能。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城市提供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丰富劳动力和各种服务消费。所以,“不单单是工厂创造利润,而且铁路运输线与高速公路这些为工厂提供坦途、运输原料与销售产品的空间,也创造了大量利润。”<sup>①</sup>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哈维指出,资本投资于城市人造环境只是暂时缓解了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但它并没有根本解决矛盾,过度积累的趋势并没有消除。这是因为,正如在初级循环中资本可以投资的空间范围会枯竭一样,在次级循环领域也会由于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而使投资机会很快饱和。随着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流向次级循环,过度积累这一基本矛盾在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中重新生产了。城市环境投资中存在的矛盾和资本过度积累的矛盾两者共同引发了次级循环中资本的危机,造成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贬值,这个过程影响到城市建筑环境以及耐用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城市危机就是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为了化解城市危机,必然要求不断开辟积累的新空间。但由于城市建筑环境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很难在短时期内

<sup>①</sup> [美]乔治·瑞泽尔、D.L.古特曼:《现代社会学理论》(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出去,这样资本家本来是为了克服空间障碍而建立了相应的空间基础设施,但它却很快成为限制和束缚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sup>①</sup>资本总是在某个特定时刻按照适合它自己发展的方式建立了一种物质景观,而在随后某个时期,又不得不破坏既存的空间设施而建立新的城市建筑环境。可见,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都是为了使资本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城市就在这种破坏与重建中经历着兴衰发展,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状况,从而造就了资本主义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

## 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和矛盾

哈维认为,城市建构环境依据它们的实际用途分为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和消费中的消费基金。固定资产项目主要是指工厂、高速公路、铁路、办公楼等,这些人造环境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去,但它们只能被用来辅助生产过程而不是作为原材料直接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消费基金项目主要是指住房、公路、公园、人行道等,这些人造环境是消费的物质架构而不是直接投入消费的商品。哈维指出,城市建构环境的双重用途体现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城市建构环境一方面是按照资本增值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的消费手段和他们自身再生产的手段,这就表现为一种冲突结构,这种结构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资本积累和劳动者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从资产阶级立场来说,资本主义为扩大资本积累,必然重视的是人造环境的固定资本用途,因此它创造了庞大的固定物质基础设施,使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当做不动产资本、被当做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投资到空间中去。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追求的是良好的生存条件和便捷的消费手段,因此它看重的是人造环境的消费基金用途。由于城市空间的生产 and 规划是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因而资本家必然会维护人造环境的固定资本用途,而不断破坏人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造环境的消费基金用途,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哈维认为,城市空间生产的这种内在矛盾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阶级矛盾,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为了不断开辟积累的新空间而使资本主义城市处于不断地破坏和重建中。基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如果资本在某一地域中已无利可图时,资本就会抛弃这一地理空间,而去开辟资本积累的新空间。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城市建设中,当城市中心商业区利润趋于饱和时,资本就会放弃对其投资而转向郊区豪华住宅区的建设。伴随着中产阶级的郊区化,工业和许多服务业也随之迁出城市中心区,结果就使得城市中心区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减少,成为低收入阶层聚集区,城市中心区面临衰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城市的兴起以其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吸引了大量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而流向它们。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这些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工厂厂房和其他固定资本贬值,从而陷入了危机。可以说,城市危机的产生是资本开拓积累新空间的必然结果。

第二,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剥夺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城市空间生产使绝大多数优质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所垄断,用于商业目的以实现土地资本的增值。而城市中的劳动者、低收入阶层在空间的占有与控制中往往处于劣势,他们从事着空间生产,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自己的生存空间却在资本的强势逻辑下被不断挤压和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的生产,究其实质是阶级关系的生产,城市物质基础设施的空间一旦被生产出来,就立即投入到强化阶级关系的活动之中。因此,哈维说,“空间……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sup>①</sup>

第三,资本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由于忽视了人的生存与发展,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空间异化。城市空间生产是单纯按照资本的需要进行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置的。这种空间重构中资本增值的能力被片面突出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9页。

和强调,而如何使人获得更好的生存及发展空间这一目的却被忽视和压抑了。由于资本的逻辑侵入并主宰了城市建设、居住生态、能源环境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人们“被掷入现代城市交通漩涡中,孤零零地对抗庞大、快捷而致命的质量与能量凝聚物”。<sup>①</sup>从而对自身的生存产生了困惑与迷茫。城市空间的异化使人们明显感觉到大都市的非人性,丧失了家园感,酿成了个人在时空中的无限孤独。因此,城市空间生产对于资本来说是福音,而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讲却是痛苦与孤独。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问题和危机在以扩大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因此,他说:“一个真正的城市化还没有产生,它需要革命的理论勾画一幅蓝图,来实现从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城市化。而且它需要革命的实践完成这一转换。”<sup>②</sup>

### 三、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阶级斗争

城市建筑环境的生产负载着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矛盾,即它是为了资本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进行的生产。资产阶级必然要按照自己追逐利润的要求“创造一种适合生产和再生产目的的物质景观——大量人工建设的物质资源。然而,这种空间建造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激烈的相互冲突。”<sup>③</sup>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占用空间以获取利润的要求与劳动者消费空间以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城市建筑环境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生存和消费空间的剥夺必然会引发劳动者的反抗,导致围绕城市建筑环境的生产和使用而展开了各种阶级斗争。

哈维认为,伴随着资本城市化,社会关系也被城市化了,这主要是指劳动力的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相分离。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的分离则意味

① [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26.

③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lackwell, 1985, p.3.

着劳动力对其社会生存状况的斗争分裂成两个表面独立的斗争：一个是在工作场所争取工资的斗争；另一个是在居住场所反对商业资本、土地所有权等产生的剥削和占有的斗争。哈维关注的是在资本城市化过程中日益凸显的后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 （一）劳动力争取生活居住地生存条件和成本的斗争

劳动力争取生活居住地生存条件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租金占有者以及建筑商三方之间的对立斗争。土地是劳动力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基本条件。建筑于土地之上的住房、交通、商场、饭店等各种设施既是劳动力生活环境的重要资源，也是资本获利的重要来源。由于私有财产制度将劳动力与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条件的土地相分离，围绕着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劳动力、土地资本及那些通过生产这些商品来寻求利润的建筑商三方展开了斗争。以劳动力为例，由于这些城市建筑设施的成本和质量关系到劳动力的生活标准，因此劳动力在居住场所寻求保护和提高其生活标准时就参与了一系列与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管理和使用有关的社区斗争。例如反对过高租金的斗争、反对城市建筑规划侵占生活场所、破坏生活居住地环境的斗争等。

哈维重点分析了劳动力与租金占有者（地主或房东）之间对住房成本和质量的直接斗争。地主（房东）会运用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尽可能地从房地产中获利，他们会调整策略以最大化地获得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则是寻求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如搬到住房比较便宜的地方或施加影响对租金加以控制）来限制土地占有者并确保一个合理的居住成本和质量。当建筑商进入房地产市场并以更低的成本建造住房时，上述两方的斗争就成为了三方斗争格局。建筑商新生产的住房成本会严重影响到已有住房的价格，进而影响到地主（房东）获取垄断租金。如果劳动力能够运用其政治斗争获得国家对于建筑商的补助，那么就会刺激新修住房成本和租金的下降，从而迫使已有住房的租金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土地占有者采取措施提升土地成本，那么租金就会升高。此外，生活居住成本还与住房周围的交通条件、消遣娱乐设施、公共环境等关系紧密。例如，地主的垄断权力由于交通条件改善而使劳动力可以不必在工作场所周围找房子住，从而使冲突得以一定程度的缓和。因此，住房对于交通的变化极为敏感。通过不断革新的



和廉价的交通工具,劳动力就可以逃脱地理限制,地主因地理优势获取垄断租金的能力也削弱了。总之,劳动力在城市建筑环境的空間资源的分配、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集中表现为反对地主的掠夺和争取生活居住成本持续下降的斗争。

## (二) 资产阶级控制劳动力的新形式

为了缓解城市空間生产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顺利实现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必须围绕着城市建筑环境,对劳动力、租金占有者和建筑商这三方之间所展开的斗争进行干预和平衡。这种干预通常是由政府权力机构进行的。哈维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干预这场斗争的形式。<sup>①</sup>

第一,允许工人阶级拥有住房所有权。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为争取居住条件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时,采取了扩大个人住房私有制,允许劳动力部分占有土地和房子的策略。这种做法有利于资产阶级分裂和控制工人。这是因为:首先,它促进了一部分工人阶级拥护私人财产原则和一种“个人占有”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这就给了资产阶级一个灵活的意识形态杠杆用来反对劳动力对住房公共占有和国有化的要求。其次,资产阶级通过住房信贷而控制了劳动力。大多数劳动者都是通过贷款而购买的住房,要为抵押支付利息,这使金融资本在住房市场上居支配地位。因此,工人表面上拥有了住房这样的较小财产所有权,而实际上则恰好相反:金融资本不仅控制了住房市场中新的投资率和意向,也通过长期债券而控制了劳动力。一个有住房抵押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维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支柱。最后,住房所有权使工人阶级发生了分裂,工人阶级被分化为有房阶级和租房者。一部分工人阶级成为住房所有者,极为关注住房的保值和升值,在反对价值占有的斗争中站在私有财产原则一边,并经常以损害另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占有价值。

第二,降低工人阶级的居住生活成本以保持低工资率。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求保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成本。

<sup>①</sup> 参见蔡禾、张应祥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188页。

如果住房租金过高就会增加劳动力的居住生活成本,使得劳动力产生提高工资的要求,工资一旦提高就会降低资本积累率。正因为如此,资本一般会站在劳动力一边反对地主(房东)对租金的过分占有,而且也试图降低像住房等基本商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家本身出于支付较低工资的考虑也可能会寻求提供廉价的住房,或者支持劳动力对公有制廉价住房的要求或住房补贴。

第三,通过理性消费、集体消费来管理和控制工人阶级。对资本家来说,工人如果不能“正确”和“理性”地使用他们的购买力就会破坏商品流通循环,阻碍资本积累的实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使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增强,由工薪阶层形成的国内市场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管理和控制工人阶级“非理性”消费的潜在要求也在增强。为此,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通过广泛运用劝说技术来确保劳动者的理性消费。道德告诫和慈善事业经常被用来改善劳动者的精神及道德力量,以使他们成为理性消费者。此外,理性消费还可以通过集体化消费得到确保。工人阶级对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的需要通常是通过政治渠道来表达的,政府仲裁这些需求并努力使其与资本积累要求相一致。这些要求有许多是通过商品和服务的集体供给来达到的,这意味着每个人不管喜欢与否都得消费它。可见,资本主义根据资本积累的利益管理消费已经越来越向集体消费的方向发展。通过这种集体化,消费者的选择从无法控制的个体行为转为政府更有控制力的集体行动。哈维特别指出,城市建筑环境在集体消费中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因为包含在城市这个人造环境中的大量资源(街道和人行道、停车场、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等)都是集体性消费商品。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是集体消费的自然形式,资本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很容易将其控制。因此,城市人造环境被资本作为一种有利于维持积累的强制力量而建立。

第四,向工人阶级灌输“工作伦理”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为使劳动者成为服从于生产过程的“物”,资产阶级不仅向工人阶级反复灌输“工作伦理”以及诚实、尊重权威、服从法律和规则、尊重私人财产权和契约协议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力图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工人阶级的价值观。而且,为了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驯良、文明和效率,资产阶级也持续努力

寻求对工人阶级生活空间的改善。不过,哈维认为资本并不像在工作场所那样对工人的生活场所进行直接控制和统治,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工人阶级识别,从而使资本和劳动力在生活场所的直接冲突加重了阶级紧张和冲突。因此,工业资本避免任何直接卷入人造环境的供给或管理。它们通过住房供给的私有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业主阶层以及大量住房零售和批发中介人,而社会服务和公共品的供给与管理则由政府部门来完成。

通过哈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对劳动者、地主(房东)、建筑商三方斗争的干预和调节,表面上是对劳动力生活状况的关注,实质上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资本试图像在工厂中一样在生活场所对劳动力进行驯服,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工人的价值观,使工人的消费有利于资本积累。城市空间生产中出现的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其实质依然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干预和调节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其剥夺劳动者以追求资本增值的手段,它不可能为城市劳动者争取空间权益的斗争提供真正的出路。

总之,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析和批判是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城市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哈维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来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他把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理解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互相交织,矛盾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就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生产的,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一个过程,而这一生产过程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哈维的城市空间批判理论为理解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哈维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及其矛盾进行了开创性分析,弥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空间分析的空白。其二,哈维注重对当代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考察分析,将城市看做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集中的场所,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争夺各种城市资源的斗争场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 第二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批判

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开始摆脱地域性的界限而真正卷入一个复杂的全球机制中,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作为当今最典型时代特征的“全球化”问题,是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我们知道,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以过程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的,哈维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也把全球化视作一个过程,“以过程为基础的视角,聚焦于全球化是如何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的”<sup>①</sup>。在对全球化的形成过程进行理论探讨中,哈维从空间视角研究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并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积累方式及其政治经济实践进行了深刻阐释和批判。

### 一、全球化空间与资本积累

哈维的全球化理论仍然是以其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全球化是如何产生、形成和不断扩大深化的。哈维认为,资本不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这些过剩资本和劳动仅仅依靠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是无法消化的。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主义采取空间修复策略来为资本积累开拓国外的新空间,实现资本的横向空间转移。“资本的伟大本能就是要穿透各种空间障碍,这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动力,资本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地盘,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空间就是在这样的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在资本的流动本能之下崩溃了。”<sup>②</sup>在资本不断向外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全球化随之发生了,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模式固有的本质。在哈维看来,全球化空间是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它与资本无限积累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策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空间策略。

①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② 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如果说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是当前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扩大的动因,那么灵活积累体制就是加速资本全球化的具体实现机制。灵活积累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上分散进行生产,特别是把资本转向第三世界劳动力低廉的地区,小规模生产和追求买方市场。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形成了地理上流动灵活的组织,与这种劳动组织相应的就是大量机构上的、产品方面的和技术上的创新。信息成为商品、金融体系的彻底重组和调整极大强化了全球势力,再加上集装箱化、大型喷气式飞机货物运输和卫星通信,它们使生产和设计指令能及时发送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这一切都加速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着灵活积累模式,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经济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周转速度不断加快,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和货币流通的国际化也使空间障碍几近消失。资本流通时间的消失,空间障碍的消除,使资本的活动空间真正具有了全球化的意义。

哈维认为,资本在全球进行扩张的同时也开启了全球空间生产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巧妙地利用地方性元素的同时正在瓦解和颠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的文化传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空间的生产 and 控制。正是全球空间生产,使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都能在全球化空间中得到不断调整和重组,从而继续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然而,全球性的空间生产活动造就出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在资本积累动力的推动下,不同地理空间利润率的巨大差异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在全球范围内不停地流动。科技和信息革命大大降低了资本、商品、劳动力和信息流动的成本和时间,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从以前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空间的地理界限不断被资本积累所打破,所以哈维说:“‘全球化’术语的兴起所预示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使许多关于‘自然’地理单元——资本主义历史轨迹就发展于其中——的假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sup>①</sup>资本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流动使全球地理空间随着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不断重组,随之带来的结果是地理上的分散和生产体系的分裂、劳动的分工以及工作的专业化。也就是说,利润、

①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资本的有机构成、劳动生产力、工资率、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成本、技术和机械化的水平以及劳动力的组织等在地理空间上被分散开来。全球空间生产使资本顺畅地在全球流动,并在全球空间转移中不断增值,将积累起来的剩余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必然给人类的生存空间带来巨大的危害,造成不平衡地理发展。

第一,资本的全球拓展加剧了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的二元化趋势。地理不平衡发展是与二元化的世界劳动分工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知识、信息、人才、技术、文化等手段不断将工业产业、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造成资本本土的“产业空洞化”,也即哈维所说的当代欧美国家城市中心区出现的“去工业化”;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城市逐步脱离地方民族工业生产体系,成为一座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孤岛。同时也加速了落后国家的农业地区转变为制造业积聚的城镇。全球制造业的二元化格局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基地,但却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破坏性后果,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高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农地资源迅速消失,转向工业用途,迫使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侵害了城市居民的空间权益,引发了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支配和空间消费的激烈矛盾冲突。

第二,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给自然空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动力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将自然看做是创造利润的一个源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造成生态危机。哈维对此也持相同立场,他从空间视角对全球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现状及原因进行了阐明。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运动的广泛兴起,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屈于国内人民的压力,把污染企业或者有毒有害废料处理厂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中。这无疑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掠夺,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逐渐获得了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宜人的环境。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采取“空间修复”策略将生态环境问题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使本国国内的生存空

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他进一步指出,造成人类生存空间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更深层次原因是隐藏在环境问题背后的阶级关系。环境困境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秩序所造成的恶果。正如哈维所说:“我们环境困难的产生是这种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是依附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的结果。”<sup>①</sup>这也是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在生态方面欠下了巨大债务,却总是把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推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哈维所说的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并不是由各个国家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布或是地理位置的优劣所造成的,而是由资本和权力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高度集中所导致的。资本主义通过“时间—空间修复”策略来开拓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非对称性”关系获取竞争优势,加速资本积累。哈维强调,通过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了解才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轨迹中的激烈矛盾。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平衡地理发展不断加剧的过程,当前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必然导致全球空间结构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对抗。在反对全球化,争取公正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的斗争中,哈维认为无产阶级依然是历史演进的首要代理人。他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把目标相异而又多重的斗争形式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

##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的勃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这次全球化运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这种模式既要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又要能够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接受。于是,以宣扬市场、贸易和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全球化互为动力,相互推动,当前的全球化逐渐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借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趁势席卷全球,建立起新的全球秩序。哈维将新自由主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8 页。



义化解释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sup>①</sup>下面我们看哈维是如何从资本积累和阶级力量两个维度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实践后果所作的深刻剖析与批判。

###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遏制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凯恩斯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万能的。一方面由于价格信号在某些场合并不具备伸缩自如、灵活反应的调节能力；另一方面，从总供求角度看，由于不同经济主体在实现其经济利益上具有竞争性或排他性，故市场自发力量并不能经常保证总供求在充分利用资源层面上保持平衡。因此，资本主义的失业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和调节。<sup>②</sup> 凯恩斯主义的推行使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得以确立。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是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消费和国家福利主义为主要特征，它和凯恩斯主义政策一起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长达 20 余年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但到了 1960 年代末，这种资本积累模式在国际和国内经济领域都面临垮台，资本积累的严重危机的信号随处可见，资本主义各国的失业和通胀现象此起彼伏，宣告一次波及全球的“滞涨”危机的到来。

福特主义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的资本积累模式走向崩溃迫使资产阶级寻求新的经济理论来帮助资本主义走出“滞涨”的泥潭，以使资本积累重新活跃起来。这时，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新自由主义就以批判者的身份流行开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反，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提倡自由放任、更多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他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从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 页。

<sup>②</sup> 哈维将凯恩斯政策之下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称为“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意思就是表明市场进程和企业公司活动处于社会和政治约束的网络之中，处于监管的环境之中。

的兴起。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是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国家就是建立起牢固的个人财产权、法治以及令市场和自由贸易得以自由运转的制度,这些制度安排是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因此,在哈维看来,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sup>①</sup> 新自由主义虽然鼓吹个人自由和权利,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唯一目的是为资本积累创造种种便利条件,从而使资本和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在各个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对实现利润来说至关重要。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弹性积累模式取代福特主义积累模式,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新的资本积累模式。

所谓“弹性”指的是劳动市场的弹性和调度投资的弹性,即依靠弹性灵活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市场实现资本积累。因此,它强调资本的快速、自由、灵活流动,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商品、劳务、资本、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一切阻挡资本自由运动的壁垒都要拆除。这种资本积累模式用哈维的话说就是消除资本空间障碍,为资本在全球寻找其增值和扩张的地理空间。哈维认为,为消除资本空间障碍,新自由主义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第一,大力倡导和推动信息革命和交通通讯革命。新自由主义要求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完成市场交易,获取利润,而要使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就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来积累、储存、传递、分析和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求,于是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哈维指出,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不断增加的密度,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时空压缩”之感。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来说,地理跨度越大越好,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范围越广,市场契约越灵活就越有利于实现全球资本积累,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如此热衷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于推动全球化了。第二,打破各种贸易壁垒,促进资本跨国界流动。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为资本积累提供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因此要求国家主权也应自觉自愿地听命于全球市场,努力打破诸如关税、惩罚性税制、计划和环境控制,或其他的地方性障碍等,尽量为资本全球积累开拓市场。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以打破疆域界限,共同努力协商减少壁垒,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全面开放市场。这样,资本就打破了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得以迅速向全球扩张。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资本积累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速度,因此,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模式必然产生加深和扩大全球化的内在需求。自由市场理念的全球推行已经使当今的全球化深深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烙印。

## (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功占据世界历史舞台,是因为它一直声称自己是对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是文明的核心价值,而这一价值不仅受到法西斯主义、权威主义、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受到一切政府干预形式的威胁,因为这些干预以集体判断取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引人注目并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它迎合和满足了1968年那场席卷世界的追求言论自由和个人选择自由的学生运动的社会心理需求。新自由主义也由此在文化价值层面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认同。然而新自由主义宣扬的个人自由真的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吗?哈维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看它向何处去。”<sup>①</sup>这句话意思是说自由的理念是我们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但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保障的是不同意义上的自由。哈维借用波兰尼对自由的划分来说明这一观点。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催生了好的自由,也带来了不好的自由这一恶果。所

<sup>①</sup> 转引自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8, p. 118.

谓好的自由,是指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选择工作自由等,而就不好的自由方面而言,主要有剥削他人的自由、获取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作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自由等。哈维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制度下,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保障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因为只要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就没有人能够对个人的行为加以限制,从而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私有制还鼓励了“资产阶级德性”,这些德性包括个体责任与义务,市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积极性和创业努力的回报,允许契约选择和交易选择的广泛自由。因此,缺乏清晰的私有产权被新自由主义视为阻碍经济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最大制度性障碍之一。可见,私人所有权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反映的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只是个代名词,“自由的理念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sup>①</sup>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只是作为市场和资本积累的附属品存在,而非自由表达的个体,于是在市场的可怕逻辑介入之前,自由王国就已经萎缩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精英权力,而并非它所标榜的追求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

因此,新自由主义有计划的鼓吹个人自由来获得民众基础,实际上是借此掩饰其重建阶级力量的真实企图。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在重新激活全球资本积累方面并不非常奏效,“19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5%左右,甚至在艰难的1970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2.4%。但是,在随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却分别为1.4%和1.1%(自2000年以来,增长率差不多跌倒了1%)。”<sup>②</sup>这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增长方面相当失败。然而,新自由主义却在恢复、重建统治精英的阶级力量方面卓有成效。哈维重点分析了英美两国是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化运动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②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中恢复和重建上层阶级的权力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掌政权后,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措施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第一,彻底的私有化。英国通过出售公共部门的资产、自由化、特许投标等方式使公共设施、公共机构等行业几乎全部私有化。美国则通过转包或凭订单订货的方式使私人大幅度进入以前由政府控制或监管的行业部门。多年艰苦阶级斗争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又重新被恢复到私有领域,私有化政策使财富和收入从大众手里转到统治精英阶级手里,社会贫富差距加剧扩大。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弱工会力量。为减轻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英美两国大幅度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尝试。同时,撒切尔夫人采取了一系列如工会立法、放弃充分就业的承诺以及压制工人罢工等手段,打击和削弱了工会势。第三,减税。政府在财政方面积极推行一系列减税政策,以刺激个人、家庭和企业进行投资和参加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投资,因此减税政策的最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巨富并且其数量不断加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在20世纪末达到了15%;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翻了一倍,从6.5%到13%。放眼全球,1996年时最富裕的358个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45%人口(23亿)的收入之和,世界各地财富和权力都出现了惊人的集中现象。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增加有力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就是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工具。此外,这一证据也表明,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公正原则与恢复或维持精英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这些原则就会被歪曲或抛弃。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带来了阶级力量的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恢复到了先前传统上层阶级手里。哈维认为,与新自由主义化共同进行的,是对上层阶级构成因素的重构,那么资产阶级力量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特权发生了融合。由于股东(所有者)给予行政总裁(管理者)以优先认股权,使得所有权和管理权不再能清晰区分开来,于是,股票市值而非生产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指示灯。其次,为获取股息和利润的货币资本与寻求获利的生产、制造业和商业资本之间的历史沟壑急剧减小。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

之间的冲突逐渐消失,生产制造企业越来越往金融上靠拢产生了联合企业。哈维指出,这些变化趋势的产生根源就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化浪潮。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模式的运行机制是资本的灵活自由流动,这必然会刺激金融和金融服务业的兴起。随着新自由主义推动各种空间障碍的消除,金融活力日益挣脱管理束缚和壁垒得到迅速发展。全球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浪潮不仅生产出高度复杂的全球互连网络,还生产出各种建立在证券化、衍生品和形形色色期货交易基础上的金融市场。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将一切都金融化了,全球交易发生了从生产过程向金融领域的转向。从生产制造上获得的收益不再必然意味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但是向金融服务领域的集中却肯定能提升人均收入,因此,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维持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金融市场通过创新浪潮以及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松绑,提供了获取并聚集财富的方式,成了重建阶级力量的首要手段。正是金融化浪潮打击了根深蒂固的传统阶级力量形式(如英国工业部门中的贵族资产阶级),催生了新生的金融和企业家阶级,根本改变了上层阶级的力量构成。在哈维看来,借新自由主义而获益的阶级力量的核心包括:“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行政总裁以及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周围的金融、法律、计算机、网络、媒体等新兴部门的领导人。”<sup>①</sup>在新自由主义的支持下,金融资本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力量,并拥有足够的力量对工人阶级运动和国家行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哈维进一步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新兴的跨国企业、国际金融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在全球发挥着阶级力量。

### (三)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后果

随着资本全球空间生产的不断扩大深化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主流话语的确立与演变,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新秩序下种种社会现实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愈益突出。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公共目标(所有人的幸福生活)与其实际结果(阶级力量的重建)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过程。随着流动而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建立,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的区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域竞争变得日益重要,新自由主义的总体进程因此借助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机制得到了极大推动。在全球层次日益加速的资本积累对空间的争夺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理论干预下,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可以惊人的发展,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这一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就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而在社会光谱另一端的结果却是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sup>①</sup>哈维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了新自由主义实践带来的后果。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通过“剥夺性积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剥夺性积累”<sup>②</sup>一方面在国内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和国家再分配等手段将财富和收入集中到少数统治精英阶层手中;另一方面在国外还极力主张将剥夺性积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相结合,从而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等都遭到了掠夺和破坏。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剥夺性积累必然使全球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从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手中转到了上层阶级手中,从落后国家流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性。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化和信息革命使全球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成为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不负责任和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使金融企业不关注实体生产领域,只关注如何进行资本投机获利。越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进行投机。当前投机性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首要动力,并创造出大量虚拟财富,制造出经济繁荣的假象。在强迫各国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寡头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② 关于“剥夺性积累”在后文“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中有详细论述。



的金融衍生品,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毫不相干的投机市场。在这一市场上,投机、掠夺、欺骗、偷窃行为肆意横行,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变得日益脆弱。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信息技术的膨胀。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需求使技术性变革远离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入市场导向型金融化所要求的轨道。信息技术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权技术,它更适合用于投机行为和最大化短期市场合同,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信息技术使一些新兴产业(电影、影视、电子游戏、音乐等)获益,它们运用IT作为创新和推销新产品的平台。围绕这些新兴部门的大肆宣传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了,使人们没有关注到基本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已经缺失了。实体经济的萎缩和虚拟经济的扩张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世界经济风险不断加剧。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当前的金融危机往往始于一国而迅速波及世界,1998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的恶果。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就业和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由此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全球破产。

哈维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给人民大众带来了动荡和灾难,但却并未打击上层阶级的阶级力量。相反,在金融崩溃之后,统治精英有望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和巩固。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贬值使国外债权大幅缩水,从而减轻了美国自身的债务,将危机转嫁给其债权国。另一方面,由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目标是确保市场和金融自由化,因此政府和金融集团自然形成了联合体为促进资本积累而合作。在金融资产阶级面临金融危机时,政府就会注入巨资挽救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赦免其债务和犯罪行为,向其输送巨大经济支持。因此,哈维说:“人们不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遭受毁灭性打击而走出金融危机的,而是伴随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更巩固的资产阶级走出这场危机的。”<sup>①</sup>

第三,新自由主义把一切都商品化了。新自由主义假定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作出最优决策,相当于假定了任何事物原则上都可以被作为商品来

<sup>①</sup> David Harvey, *Is This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 The Crisi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lass Power*, <http://www.counterpunch.org>.

对待。哈维着重分析了在新自由主义安排下,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于新自由主义采取的是弹性资本积累体制,为了使劳动力资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资本家更偏爱于短期合同,这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就被建立起来。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撤出并在技术上促使工作结构转变,从而使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变得多余,实现了在工作环境中资本对劳工的主宰。于是,个体化和相对无力的工人面对的是只提供为个体制定的短期合同的劳动力市场。这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人来说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看不见的恩惠,因为短期合同所造成的周期性工作的不稳定,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劳工阶层任由资产阶级摆布,其生存状况日益恶化。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性质导致权威主义盛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民主抱有极大怀疑。他们认为,多数人的治理会对个人自由带来潜在威胁,因此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裁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再者,新自由主义虽然承认个体有自由选择权力,但为了维护其市场和贸易自由的原则,绝不允许个人选择组织起来建立旨在强迫政府干预或消除市场的政治性党派。新自由主义者为了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人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的机构作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所以,面对一系列寻求集体干预的社会运动,新自由主义国家被迫进行干预,由此否认了它理应维系的自由。新自由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国际竞争和全球化来规训各个国家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运动。如果这一武器失败了,那么新自由主义国家必须求助于劝说、宣传,必要时也求助于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可以说,一旦个人的自由选择触及到上层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就会与其宣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变得独裁、压迫和反民主。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最终只能依靠权威主义来维持,为了小部分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自由将受到限制。

第五,新自由主义实践造成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掠夺。哈维指出,在自然资源开采问题上,同样是来自于短期合同的压力,生产者要在合同期内尽可能地攫取一切资源,而不会考虑生态可持续性发展问

题。而在能源利用问题上,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消费主义继续鼓励高度耗费能源的城市向近郊和远郊扩张。由于新自由主义坚持私有化,使得在环境保护方面很难建立起全球协议,因此新自由主义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只能是软弱无力。

可见,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并未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分配正义,反而使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对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恶果,新自由主义拥趸者辩称那些经济上失败的国家应归咎于其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他们宣称某一地区内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鼓励创业冒险与创新,带来竞争力量并刺激经济。而底层阶级条件恶劣,是因为他们出于个人或文化原因而未能提高自己的技能资本(通过努力学习、获得新教工作伦理、服从工作纪律和灵活性等)。简而言之,不管情况多么糟糕,问题多么严重,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力,或因为个人、文化、政治上的缺陷。新自由主义的这套说辞实际上是在文化价值外衣的伪装下对统治精英阶级力量的维护和巩固。当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说明,新自由主义权力制度正依靠暴力、掠夺性积累、帝国主义活动等行径在地理上扩张至全球,而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因此,新自由主义在自身内部繁衍出大规模的对抗性文化。这种对抗性文化反对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谴责和反抗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并没能兑现实现所有人幸福的承诺。哈维对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商品市场和自由资本市场包含了能给全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所有必备因素,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sup>①</sup>

通过追踪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和重建阶级力量的过程,哈维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绝不可能带领人类建立起自由、平等、正义的王国。因此,“比起新自由主义所诉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有待我们去建立。”<sup>①</sup>如何摧毁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实现人类美好未来,哈维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方案:第一,在权利领域与新自由主义霸权进行争夺。新自由主义强制推行一套独特的权利,即个体不可剥夺的私有产权和盈利权,这一权利胜过任何其他不可剥夺的权利。实际上这是为资本积累所需的权利,是稳固和壮大资产阶级力量的权利制度。因此,对这一强制的抵抗就应该是提出与新自由主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相区别的权利,并为争取这一相当不同之权利展开斗争。如果我们将私有权和盈利权等首要权利变成派生权,而把诸如言论自由、受教育权、经济保障权、结社权等权利置于首位,实施推行这些权利就会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严峻的挑战,并将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引起意义重大的革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腹地注入一套截然相反的权利价值体系,从而恢复民主,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正义。第二,复兴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整合各种社会运动。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化的历史表明,不管是遏制还是恢复精英阶级的力量,阶级斗争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虽然“阶级”被新自由主义歪曲为一个虚构范畴,阶级斗争被有效地遮掩起来了,但统治精英重建阶级力量的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开展阶级斗争是反抗新自由主义最致命的武器。由于当前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是动荡不定且不断加深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这种不平衡性通过国家间的竞争而积极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化的传播,因而对于阶级斗争而言,其任务之一就是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转变为一项资产,而不是一项债务,也就是说联合当前各种反全球化和反剥夺性积累的势力来对抗统治阶级精英“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 三、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

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下,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拓展全球资本积累空间的过程中,日益奉行霸权主义政策,这使得“帝国主义”问题重新受到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哈维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式的分析和批判,同时吸收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思想,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

### (一)新帝国主义的内涵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帝国主义的形成。哈维所谓的“新帝国主义”究竟“新”在何处?哈维说,这种“新”主要表现在“对与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概念化”。<sup>①</sup>也就是说,哈维是从资本积累的时空修复机制来探讨和解释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实践所发生的新变化。哈维将其论述的帝国主义称之为“资本帝国主义”,其内涵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的融合”。<sup>②</sup>哈维借用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一书中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两个概念,将“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称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将“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称为“权力的资本逻辑”。所谓“权力的领土逻辑”是指帝国主义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目标;所谓“权力的资本逻辑”则是指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支配和使用资本。“权力的资本逻辑”主要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运行,也即资本家通过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比如生产、贸易、商业、资本、货币、劳动力、技术、信息和文化等方面的转移和流动,来缓解过度积累危机,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不难看出,哈维是把“资本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体现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矛盾统一体,虽然这两种逻辑完全不同且绝不可能相互转换,但它们在实际中却是互相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就是起源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就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sup>③</sup>

① David Harvey, “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7, vol.15 Issue 3, p.58.

②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第一,行为主体的动机和利益不同。资本家把资本投资到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谋求积累更多的资本。政治家对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介入则是为了维持或增强自己国家的力量,达到控制别国的目的。

第二,行为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不同。资本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除了在法律的限制下,他们不必对自己直接的社会圈子之外的人负责。政治家追求的是集体的利益,并受到国家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要对全体国民,或者更经常地是要对一个精英团体、一个阶级、一个家族或其他一些社会团体负责。

第三,行为主体的活动范围不同。资本家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在连续的时间和空间中,不受时空限制,资本家的公司可以任意地建立和解散、变更地址、合并或者是歇业。政治家的活动大多是在一定的领土空间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一个选举周期规定的时间中发挥作用的。进而言之,国家是长期存在的实体,它不能够被迁移,除了地理征服这一异常情况之外,它总是被限定在固定的边界之内。

第四,行为主体受政治决策影响的程度不同。在权力的资本逻辑中,由于资本积累的个体机构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不容易形成明确的政治决策,也很少服从政治决定。在权力的领土逻辑中,虽然往往存在不同意见,容易引起讨论和争论,但最终都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决策。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是在各种利益和观点相互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艰难混乱的政治谈判得以制定和执行的。

哈维指出,虽然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还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由帝国政治的战略所支配,国家和帝国总是围绕资本主义动机而发挥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逻辑却常常是互相制约,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哈维举例说,如果完全从资本积累的直接需求方面来考虑,我们就很难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或对伊拉克的侵入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种军事行动阻碍而不是增加了资本财产。再比如,如果没有意识到美国商业利益的急迫需求是通过贸易扩张和对外投资机会的增加以使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向资本积累开放,就很难理解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对苏联采取的领土遏制策略。

哈维还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这两种逻辑中必定有一种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我们将会看到,有时领土逻辑更受重视,但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sup>①</sup>这也正如英国学者布鲁厄所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制度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都同意必须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来揭示帝国主义。”<sup>②</sup>但这并不是说,资本逻辑在与领土逻辑的关系中始终起支配作用。在现实的帝国主义历史中,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交替起决定作用的,而其总体的特征则是资本逻辑起决定作用。

哈维关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的透彻分析,为我们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方法。针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施加的强制性帝国主义行为,我们不能陷入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分析模式,而应该立足于两种逻辑的辩证关系视角来加以分析和研究。

## (二)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剥夺性积累

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其资本积累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是循着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去探讨当今帝国主义实践的。哈维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主要方式称为“剥夺性积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以“剥夺性积累”为主要手段而进行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剥夺和侵略。

哈维通过对当代资本积累方式和特点的分析,提出用“剥夺性积累”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下的,即“原始的”积累已经发生,现在的积累是在“和平、财产与平等”的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这种假定的缺陷在于它把建立在掠夺、欺诈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视为一个不再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原始阶段”。哈维指出,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

① 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② [英]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陆俊译,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理学之中,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进程中仍是一种重要的、持续起作用的力量。而且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把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称为“原始积累”就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了,所以哈维将“原始积累”改称为“剥夺性积累”。

所谓“剥夺性积累”,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剥夺和侵略来进行资本积累。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这种剥夺本性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使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这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出现。资本主义如何使过剩资本重新找到有利可图的机会呢?哈维说,卢森堡在阐述其资本积累理论时提出“资本主义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定必须永远能够获得‘自身外部’的东西”。<sup>①</sup>也就是说,资本要实现剩余价值和保证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不可能在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性消费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推动资本家进行生产性消费的动力也不存在。因此,资本要完成积累必须在纯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市场。哈维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为了进行积累,资本主义确实需要‘自身外部’的东西。资本主义既可以利用早就存在的外部(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了的领域——比如教育),又可以积极地来创造它们。”<sup>②</sup>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了克服资本过度积累的压力,必然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来寻求解决办法。或者是向外扩张,向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从而创造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生产基地;或者是将公共资产从国家或大众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从而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因此,剥夺性积累既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也是新帝国主义行径的实质所在。那么,哈维视域中的新帝国主义是运用什么样的具体手段来实施剥夺性积累的呢?它不是通过生产而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获取超额利润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手段。

①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②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第一,私有化。剥夺性积累在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上所做的主要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sup>①</sup>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私人资本家可以对其进行投资的市场,从而出现了横扫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通过占用土地和驱逐常住居民,以此制造出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后再将土地投入到资本积累的私有化洪流中。政府允许公共资产(比如水、能源、电信、运输、住房等)的私有化和公司化,从而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赢利空间。因此,哈维将“私有化”形象地比喻为“剥夺性积累的利刃”。

第二,金融化。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展现出其明显的投机性和掠夺性特征。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股票促销、庞氏骗局、通过股市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基金等),使得劳动者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的资产贬值或被剥夺,而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

第三,自由贸易与开放资本市场。这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势力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它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压力,强迫整个世界打开市场。苏联的解体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将以前无法利用的资产大规模地释放到资本积累的洪流中,开辟了资本积累的新区域。

第四,危机管理和操作。危机可能会在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一些贬值的资产,然后利用在其他地方缺乏盈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资产进行盈利性使用。例如通过突然提高利率的方式,使贫穷国家被迫破产或被迫同意结构性的调整。因此,哈维说:“剥夺性积累已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结合了起来。”<sup>②</sup>

第五,国家再分配。民族国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通过各种方式

①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②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寻找再分配以使资产阶级获利。例如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税法改革来增加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收入。

对剥夺性积累的理解还要重点把握两点。

第一,新帝国主义实施剥夺性积累主要是以经济手段为主。19世纪的帝国主义行径主要是采用军事暴力的方式直接占领殖民地。当前的帝国主义则一般不采用直接占有殖民地的形式,而主要是以隐蔽的经济手段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经济手段以外,帝国主义国家不采取其他手段。因为资本在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时,会遭到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因素的阻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时就会采取政治协商、文化渗透甚至是军事暴力等手段来为资本的畅通无阻运行打开通道。可以说,新帝国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是综合运用这些手段的结果。

第二,剥夺性积累是新自由主义实施和推行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是市场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国内,新自由主义通过财产的私有化来为资本积累和剥夺性积累开辟道路和创造条件。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以追求减少资本跨国流动障碍的最小化和为剥夺性积累开辟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为目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剥夺性积累必然使全球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从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手中转到了上层阶级手中,从落后国家流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总之,在哈维看来,当前新帝国主义行径的实质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的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sup>①</sup>在此,剥夺性积累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sup>②</sup>这就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等都遭到了掠夺和破

① 段忠桥:《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坏,势必引起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当前,这些斗争与反抗表现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运动。与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领域内诉诸传统政党和统一的劳工组织的阶级斗争不同,反对剥夺性积累的斗争呈现出目标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后现代特点。尽管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条件,但这些地方的或者是地域性的、全球性的斗争形式往往只是要求获得某个团体或集团的利益,并不关心无产阶级的整体命运,也不可能提出推翻导致现实问题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制度的政治主张,因此哈维认为,仅仅诉诸于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是不可能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的。

总的来看,哈维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为切入点,从空间视角对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展开了深刻反思与审慎批判,其理论具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将全球化理解为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发展的一个生产过程。哈维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视角指出“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历史内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出现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创建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景观。必须认识到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平衡地理发展”不断加剧的过程,这有助于把我们从有关万能的、同质化的全球化过程的压迫性和褊狭性话语中解放出来。

第二,“弹性积累模式”作为时空压缩的强有力工具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因,也是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危机的主要形式。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形成了地理上流动灵活的组织,与这种劳动组织相应的就是当代世界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广泛发生。资本、商品、劳动力和信息流动的成本和时间大大降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从以前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全球化的历史得以被改写。

第三,当前的全球化实际上等同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霸权。哈维明确指出:“全球化无疑是一场主要由美国(还有一些臭名昭著的同盟,如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发动的地缘政治讨伐运动的后果”。<sup>①</sup> 当今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和扩展。受制于美国霸权主义深刻影响下的全球化,全球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首先反映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权益。换言之,资产阶级利益把全球化提上了议事日程,然后通过美国外交、军事和商业政策的代理机构而运行。全球化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字军东征主题。

第四,以剥夺性积累为特征的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宰着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以资金、技术援助为借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资源、能源市场进行“拦路抢劫”,带来了大量的自我毁灭,货币贬值和破产,使这些民族国家主权削弱,更加贫穷落后,国际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由和民主、资本与劳工的矛盾,产生了身份认同及人类生存的危机。而且由于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本性,这种危险将持续下去,因此,哈维将全球化比喻为“无刹车的灾难列车”。

第五,资本主义用全球化术语替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区域的不均衡发展,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弱化了反对全球化政治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时代,“全球化”无比狂妄地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打击社会主义者、福利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强大意识形态工具。哈维认为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性扩张,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用全球化替代那些在政治上更加敏感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概念,使国家和地方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权力失去了影响,全球化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形式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威胁的强有力证明。因此,哈维的策略就是要改变全球化的语言,重组阶级斗争,寻找替代性方案,建立辩证的时空乌托邦。

### 第三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空间的批判

哈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他一方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注重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去寻找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

从“时空压缩”的独特角度来揭示人们体验时空方式的改变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哈维是从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入手来解释当代人体验时空的方式,揭示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特点和内在机制,从而开辟了一条批判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道路。

### 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哈维认为,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先了解现代主义,因此他首先对现代主义的特点展开了考察。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兴起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是现代性在科学、道德、法律和文化艺术领域内的表现。哈维认为,“现代主义就是短暂与流变同永恒与不变的结合。”<sup>①</sup>现代主义在反映现代生活的短暂性、瞬间性和偶然性的同时始终试图表达一切混乱之中的不变和永恒。因此,现代主义非常重视时间,在对时间的认识上,现代主义者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强调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时间代表着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与技术、理性、科学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哈维看来,现代主义唯有通过使时间及其一切流变的特质凝固下来,才可能对永恒发言。比如,对于建筑师来讲,主要任务就是要设计和建造相对持久的空间结构,或者通过一些艺术手法来体现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永久性的效果。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现代性所倡导的科学对自然的支配,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思维方式使人们从神话、宗教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带来了科学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的各种条件之下,“现代主义逐渐丧失了它作为一种相对于反动的、传统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方法的吸引力。它已经成为了企业力量、文化帝国主义的运用工具。”<sup>②</sup>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些灾难性的破坏也同时出现。特别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现状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使人们对“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社会秩序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页。

的理性规划”的信念提出质疑,开始反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片面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的质疑和反叛。”<sup>①</sup>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各种反文化和反现代主义的运动逐渐活跃和流行。具体表现为反抗技术—科层化理性的压迫,反独裁主义、反对偶像崇拜行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这场运动以大学、艺术学院为中心,然后深入大街小巷,并最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叛浪潮。哈维认为,发生于1968年的全球骚乱是现代主义朝着后现代主义转折的文化上的和政治上的预兆。

哈维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中来的,更确切地说,后现代主义充分展现了现代主义中的过渡、短暂和偶然性的一面。但是,与现代主义企图在流变、不稳定的世界中捕捉永恒不变的东西不一样,后现代主义则是接受一个短暂、分裂、不确定的和混乱的世界。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怀疑,对现代主义的元语言、元叙事或元理论进行猛烈批判。哈维为我们勾画出后现代主义的画像:“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sup>②</sup>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建筑方面,把都市发展看成是差别极大的空间与各种混合物的一种“拼贴”,而不是追求以不同活动的功能分区为基础的宏大规划。在小说方面,后现代主义小说转向对各种现实如何共存、冲突和渗透的描述。在哲学方面,哈维认为,复苏了的美国实用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浪潮混合,产生了伯恩斯坦所称的一种反对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遗产的狂热。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已迅速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开来,成为流行文化和思潮。

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即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反抗或是某种分离,当代西方理论家们有很多争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本身并不是一套过时的方案,当前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实践现代性的活动中没有坚持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精神。后

① 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1页。



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抗完全消解了启蒙理性进步的一面,因此他坚决反对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利奥塔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反对现代主义,反对一切有关“总体性”和“元叙事”等现代性的东西。利奥塔认为,那种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所有差异的“元叙事”已经瓦解,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依照不同的游戏制定出不同的规则。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家更多的是关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和决裂,而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看做两种不同形态的东西。

与大多数学者从哲学和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同,哈维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和启发,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这是因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以获利为经济生活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sup>①</sup>换句话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根本的积累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发生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调解方式。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不过是资本逻辑的文化形式,是对资本所造就的时空转变的反应。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者都是资本主义运动过程及资本主义内部内在关系不断变动的反映,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与现代主义完全决裂的崭新的文化样式。西方学者瑞泽尔评价说:“哈维提出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虽然他承认近年来发生了一些急剧的变化,但他也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看到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之间的连续性。”<sup>②</sup>

## 二、灵活积累体制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哈维认为,研究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原因应该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根观点来分析,因而哈维提出,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根本原因。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1页。

②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的考察,哈维发现 20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福特主义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哈维以 1973 年为界,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划分为“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体制”。“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创于 1914 年,以集中化的大规模社会生产和相对固定的资本积累体制为主要特征,哈维称其为一种“刚性”积累模式。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结合,运用集体力量,刺激了有效需求,进而重建了商业和市场信心,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战后的持续繁荣。由此福特主义在全世界扩展开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这时,福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表现为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sup>①</sup>

然而,从 1968 年到 1972 年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福特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哈维认为,福特主义的固有缺陷集中表现为僵化和刻板:大规模生产体系中长期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僵化,消费市场缺乏灵活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分配和劳动合同的刻板,以财政为基础的政府也深受生产僵化的掣肘。对于这种僵化刻板而言,唯一可以采取的灵活回应机制就是货币政策,结果却造成了财政边缘政策和巨大的通货膨胀浪潮,最终破坏了资本积累。应对危机就必须探索新的积累调节机制,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持续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一种更加富有弹性和灵活性的生产体制——灵活积累就在这种情境中产生了。由于这种新的积累模式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来进行小批量生产满足了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规避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僵化和刻板性。灵活积累体制投射到消费领域也引发了相应的转变,它要求企业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学会并善于运用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哈维还从空间生产角度说明了灵活积累对于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重要意义。灵活积累体制以灵活多变、可以迅速收回投资的小规模生产代替了需要长期固定资本投资的生产计划,从而加速了资本周转,是对“时间修复危机”的回应;它在地理上分散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67 页。

进行生产,把资本转向第三世界劳动力低廉的地区以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又是对“空间修复危机”的补救。

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它突出了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这使福特主义之下追求相对稳定的现代主义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对差异、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商品化的追逐已经成为社会的流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兴起与流行正是资本积累模式变迁的必然结果。哈维强调,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体验虽然呈现出多样性,但它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其核心在于时空体验。因此,哈维断言:“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出现,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sup>①</sup>

### 三、后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

#### (一) 时空压缩

哈维用“时空压缩”概念来描述灵活积累体制所导致的新的时空体验方式。他说:“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sup>②</sup>换言之,时间的加速、空间的缩小使人们体悟到“现存就是全部”,世界已经收缩成了一个远程通信的“地球村”。哈维认为,“时空压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加速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带来的信息和交通技术革命为“时空压缩”的体验建立了物质基础;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使得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0页。

资本主义的力量达到了全球化空间的规模,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不断得到加深。后现代主义时期,“时空压缩”大大加速和增强了:一方面,伴随着更复杂、更柔性的灵活积累模式,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周转速度不断加快,使人们感受到时间的压缩;另一方面,商品、劳动力和服务通过空间而实现的迅速流动使空间障碍几近消失,使人们产生了“空间压缩”之感。

时空压缩的体验使我们感觉到已经废除了时间和空间,空间已经不再重要,但哈维特别强调“空间障碍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意义正在减小”,<sup>①</sup>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资本家会更加密切关注在劳动力供给、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地点上的优势,而空间障碍的消除给了资本家以力量去利用空间区别以获得更好的效果。支配空间的优势在阶级斗争中甚至成了更为重要的武器。对资本家而言,空间成了重新限制不驯服的劳动力的手段之一;此外,资本外逃或某些地区的工业化破坏了传统工人阶级社群的力量。对劳动者而言,地理上的流动和分散化有利于反对传统上集中于大批量生产的工厂里的统一权力。因此,由于空间障碍的消除,我们会变得对于全球空间所包含的东西更加敏感得多。进一步来讲,场所的特质在日益增强的空间的抽象之中处于被突出的地位。积极地创造具有空间特质的各种场所,成了地方、城市、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空间竞争方面的重要标志。

## (二)时空压缩的破坏性影响

时空压缩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阶级、文化和日常生活,缩短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周期,产生的最重要后果是强调了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实践活动的易变性与短暂性。这种短暂性的观念主要表现于:在商品生产领域里,它突出了即刻性与一次性物品的价值和优点。一次性物品的抛弃,不仅意味着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等。在消费领域里,它表现为调动大众市场的时尚、加快消费速度和向着服务消费观念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7页。

的转变。由于服务不像物质商品那样受到积累和周转周期的限制,因而对资本家更有意义的是在消费中提供非常短暂的各种服务。在广告和媒介方面,它表现为各种“形象”的生产、消费的快速周转与短暂性。资本主义不再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形象,而这种形象其本质就是高速变换的符号,及其背后组织着的符号系统。广告不再是围绕着告知或宣传建构起来的了,而是日益适合于通过创造各种形象来操纵各种欲望和趣味。这种现象正如鲍德里亚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现在关注的是符号、形象和符号系统的生产,而不是关注商品本身。

后现代时期的“时空压缩”使永恒成为了奢侈品,人们生活在一个由短暂创造出来的形象世界中。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使“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sup>①</sup> 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统治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使得资本主义各种文化形式产生了真正的表达危机:文化的制造者们把一切都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从而掩盖了真正的阶级关系与贫穷。日常生活中在相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把不同的世界聚合到一起的各种虚拟形象的交织,几乎完全隐藏了一切原初的痕迹,掩盖了隐含在生产它们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痕迹。审美实践和文化实践使人们沉醉于追逐差异、个性、多元、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产品,而不再去追问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因此,哈维得出结论,后现代主义时期“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已经改变,对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的信念已经崩溃,美学战胜伦理学成了社会 and 知识关注的主要焦点,形象支配了叙事,短暂性和分裂的地位在永恒真理与统一的政治之上,解释已经从物质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领域转向了思考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sup>②</sup>

### (三) 时空压缩之回应

如何应对时空压缩带来的消极体验?哈维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主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5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0页。

要存在如下四种方式：<sup>①</sup>第一，退缩。撤退到厌倦了享乐的或精疲力竭的沉默之中去，屈从于一切外在压力。哈维指出，后现代主义小说是这种反应的典型表现形式。而解构主义对任何一致性叙事的怀疑和解构也强化了后现代主义的这一回应方式。第二，拒绝应有的复杂性。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以各种修辞学命题展开空洞的口号革命，经常是以肯定各种偏见而告终。第三，努力在政治生活和知识生活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位。由此它抛弃了宏大叙事，培育出了有限行动的可能性。其益处在于强调了社群与地方性、场所与地区抵抗、社会运动、尊重他者及类似的东西，试图创造其他可能的世界形象；弊端在于容易滑入地方观念，流于短视，甚至退回到狭隘的和宗派的政治。第四，超越时空压缩。试图通过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并希望支配它们的语言和意向而支配和控制时空压缩。哈维把鲍德里亚的作品放进了这个范畴，因为鲍德里亚是用自己浮夸的修辞学来复制时空压缩而与其融合。从以上可以看出，哈维对时空压缩的四种回应都不满意。由此，他提出要重新思考对时空压缩的回应。

哈维要求把后现代主义状况放到历史语境中去，看做是由资本积累及其不断追求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和减少周转时间所产生的时空压缩之历史的一部分，从而把后现代的状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解释联系起来，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回应时空压缩状态。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文化体验的时空压缩，是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与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面对时空压缩，哈维认为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不把差异和“他者”当做某种附加于更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如阶级和生产力）之上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当做试图把握社会变化之辩证法时从一开始就应当无所不在的某种东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究（及其对货币和流通之力量的强调）与阶级政治（及其对解放斗争的统一性的强调）的全面框架之内恢复种族、性别、宗教这些方面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不能被估计得过高。第二，重视形象生产和话语生产，把它

<sup>①</sup> 参见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34—435 页。

作为任何象征性秩序的再生产和转变之组成部分来进行分析的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把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结合起来,认真对待存在着社会行动的现实地理学、存在着现实的与隐喻的权力领域和空间,必须根据它们自身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逻辑之内进行理解。”<sup>①</sup>这也就是说,哈维一方面关注和重视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如他者和差异问题、形象生产、话语理论和地理政治学等;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来正确看待后现代主义在当今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讲就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理解时间空间的深刻转变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来评价当前围绕种族、性别、宗教、生态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地方性斗争。

总而言之,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走的文化批判、知识批判路径不同,在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上,哈维试图走一条社会—经济分析与批判的道路。他首先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系列与社会经济政治实践无关的空洞观念。正是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经历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积累的变迁,以及由时空压缩塑造的新的时间与空间形式,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时空的体验,这一系列的社会巨变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的基础。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去中心性、差异性、瞬间变异性、不确定性等确实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所关注和提出的问题都与人类的生存及命运紧密相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哈维对后现代主义仍持批判态度,他批评后现代主义过分强调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和问题,而没有正视现代启蒙理性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成就。而且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批评和指责往往浮于表面现象,没有关注到社会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现实和全球权力的环境,哈维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后现代理论需要面对的是它的思想根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转化”。灵活积累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都要求建构一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后现代主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41页。



义文化也就应然而生。正是由于哈维能够从 20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转变所引发的新时空体验入手来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使得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相比更加深刻,也更能切中要害。

## 第五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 解放政治理论

哈维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展开的空间批判,其理论旨趣并非仅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下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而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趣旨,为我们揭示出资本的破坏性逻辑,从而为哈维从空间视角来整合各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探索与重建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才是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归宿和落脚点。

### 第一节 当前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挑战和困境

#### 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新自由主义趁势席卷全球,逐渐占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内在根本动因是,资本主义面对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所带来的危机而进行的内部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大规模社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已经逐渐耗尽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不但不能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反而导致了严重的“滞涨”危机。为挽救资本主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起了私有化运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反通胀、反赤字政策。在英美等国的极力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新的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特征的新自由

主义,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自由”这一西方传统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正是借助于鼓吹和尊重个人自由,使新自由主义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赞同。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体作为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不仅选择产品,而且包括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一系列文化实践的选择,这样它就在政治和经济上建构起了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以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这种对个性差异、自由的强调,在政治上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有力地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从向依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sup>①</sup>因此,哈维说,西方左翼长期面临的棘手麻烦就是在确立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建立的集体纪律和规则时,如何不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的要求。

第二,新自由主义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过分调节和干预。这就使国家、社会主义话语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日渐衰微,导致当前西方左翼运动中出现了一种理论倾向,即认为由于国家丧失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那么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阶级意识,抱怨和拒绝夺取国家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盛行。

第三,新自由主义宣扬“阶级”是一个虚构范畴,只存在于社会主义者的想象中。这就使西方工人阶级越来越相信“阶级”是一个无意义的范畴,或者至少是早就不适用的范畴。工人阶级的斗争演变为围绕文化民族主义、信仰观念、生态环境等问题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抗议运动,“过去一直存在的阶级斗争分界线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或者至少不再以对抗的方式存在了。”<sup>②</sup>

第四,新自由主义极力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全球化运动带来的一个政治后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本国经济危机转嫁到落后国家和地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②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wsx/003181.htm>。

区,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被吸引到边缘劳动与中心资本的对抗之上,而忽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问题。从而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已经解决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问题的假象,工人阶级似乎已经被资本家以股权或福利形式收买,与资产阶级共同分享着跨国资本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利润。

总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它力图将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最大限度实现增殖的利益要求理论化、制度化、合法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都是对公有制、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攻击与消解。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自由、尊严、幸福的虚假承诺所迷惑,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日益淡薄。

## 二、西方左翼理论中“阶级政治”退化的趋势

“阶级”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斗争”是马克思解放政治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身内部的各种调整缓和了阶级矛盾,渡过了危机,获得了新的发展。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无产阶级”标签饱受非议,西方左派理论家开始对传统“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质疑和重新思考。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革命消除了大部分现存的体力劳动,使那种大规模工厂劳动、人口集中的庞大的无产阶级不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衰落。例如英国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具有四个特征,即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生产者;是社会中的受剥削者;构成社会中的大多数;极为贫穷。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把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特征集于一身,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复存在。<sup>①</sup>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

<sup>①</sup> 参见[英]科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38页。

消费的引导下,产生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出现了非政治化倾向。由于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的逻辑所同化,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未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西方左翼理论家们断言,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不能担当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如果再继续运用传统的阶级政治理论来指导西方社会的革命,势必无法找到出路。因此,在当代西方左派政治和理论氛围中,放弃了对作为进步性变革之工具的无产阶级的信任,同时也放弃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阶级政治退化的趋势日益显著,而身份意识、多元政治则日益强化。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西方新左派把传统的阶级思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种宏大叙事而加以抛弃了,主张以权力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激进的、多中心的文化抗争和民主建构否定劳动对资本的反抗。例如,法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高兹提出“告别无产阶级”的口号,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消亡,因此反对劳工运动的传统领导,提倡一种以新工人阶级<sup>①</sup>为主要力量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反复强调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基调,通过否定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的客观性而取消了阶级斗争。在他们所提出的以大众联盟为基础的“激进和多元民主规划”中,将政治斗争变成了一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行动,变成了不同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竞争普遍话语的努力。可以说,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理论中,已经完成了从阶级(class)到群体(group)的转换。西方左派学者在对革命主体的探寻已经从“阶级”转向了关注各种打破了传统固定政治身份的大众,也就是说,将性别、文化、种族、生态的冲突与阶级冲突等量齐观甚至取而代之。当前西方国家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主要聚焦于性别、种族、生态、性、多元文化主义、社群等,表现为诸如地方自治斗争、社群斗争、女权运动、种族冲突、环境保护运动等。这些运动常常成为传统阶级政治的替代方案,在某些情况

<sup>①</sup> 高兹所谓的“新工人阶级”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所有从生产劳动中被驱逐的人,或由于劳动的工业智能化而成为潜在的被雇佣者,也包括今天社会生产中所有的人,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在工作中的,是永久还是暂时的、是兼职还是全职的。(See 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75.)

下,对传统阶级政治表现出彻头彻尾的敌意。

### 三、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与竞争

哈维认为,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各种地理转型造成了工人阶级在地理空间上的阻隔,这使得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大联合”遇到了强大的阻碍。当代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和分裂在地理上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由于资本在全球空间内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在全球规模上高度流动,结果出现了不可抑止的移民潮。移民运动产生的相当大的种族、人种、宗教和文化差异,给组织工人阶级或建立反抗资本主义的统一政治提出了特殊的难题。再者,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从而在世界人口的空间组织中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全球人口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城市中,并以迄今为止不可思议的规模在空间集中。聚集于大都市中的劳动力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以上诸种原因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碎片的、分散的无产阶级,从而难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尽管这些无产阶级是世界范围的,但由于他们的多重差异性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权力分化成一系列地理上分裂的社群利益或是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这就使得当前的无产阶级斗争实践更加复杂困难。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状况给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新的难题,因此,哈维说:“无产阶级运动在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力、学会如何塑造新的生产地理学和社会关系之前,它的状况将一直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sup>①</sup>

理论上的挑战、实践中的困境使得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及其意识形态日渐衰落的气氛中,哈维仍然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理论立场,坚信无论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发生了任何改变,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工人阶级仍然受到资本逻辑的剥削和压迫,其自身的利益只能通过彻底替代的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得到维护和实现。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调整政治策略和理论结构,以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新的方式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哈维的解放政治理论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构建的。

## 第二节 哈维解放政治理论的核心理念

面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图景,哈维积极地主张解放政治诉求。哈维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是以正义和差异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差异和生态社会主义是其解放政治理论的三个核心理念。

### 一、正义的理念

在人类历史地理进化过程中,所有为了争取解放、自我实现和自由的斗争无不充满着对正义的追求,这种被称为正义的东西究竟具有什么内涵与特征呢?在哈维看来,历史地理的证据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像空间、时间和自然一样,‘正义’是一组社会地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它表现了社会关系和竞争性权力构型与特定时间内调节和安排地方的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sup>①</sup>换句话说,正义理念是社会建构和生产出来的,即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及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并内含于统治阶级的霸权话语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正义是历史的产物,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空环境中,正义的内涵也会随之不同。哈维强调,尽管正义观念会因时空和个人而变化,但它却能为政治行动提供有力的话语动员力量。因此,在谈论替代性社会秩序,即揭示一种可能世界的探求中,正确揭示正义观念的合理政治诉求并使之制度化是建构替代性方案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人类对正义的追求怎样才能反资本主义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呢?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哈维试图将正义作为一个原则而不是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来调节人类关系和集体行为,以便在一个既定的生态、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实现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0页。



政治目标。

哈维认为,在后现代时期,由于后现代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剥夺了我们任何可以用来评判人类行为和关系的正义原则。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普遍主义的信仰既是启蒙计划的首要罪孽,又创造了总体化和同质化的现代主义,因而它反对所有社会正义话语的普遍有效性,将正义视之为权力现象,意味着压迫、忽略、排斥和惩罚。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正义概念解构为特殊政治经济权力的表现,而放弃了任何正义原则。这样,就没有必要在理论上、政治上或社会上来争论正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我们只需根据市场的自发作用就能最好地实现公正的赏罚。因此,市场导向的正义观念(凡是市场的结果都是公正的)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哈维看来,用于反对这种市场正义的话语只能是工人权利话语,它能调动所有阶级斗争辞令来反对对工人权利的剥削。在资本家的权利和工人权利的较量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依据某种普遍的正义原则在各种对抗性要求之间进行仲裁,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应用特殊正义和权利概念的阶级斗争。然而,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正义话语与它的资本主义对等物同样容易受到批判和解构。由于对阶级的关注就会忽视异质性和差异的存在,人们倾向于认为,专门关注阶级会掩盖、排斥、剥夺甚至压迫所有类型的“他者”。(例如种族、性别、年龄、能力、文化、场所、种族划分、宗教、社区、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异质性和差异)。所有这些多重差异性使工人阶级难以单一制度化话语来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粗暴正义。在此,我们遭遇了社会正义话语的困境。对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解社会正义所陷入的僵局,出现了复兴社会正义普通原则的尝试。它们要么试图诉诸于有限但却普遍的原则,要么试图在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所产生的特殊性之间进行协商对话。哈维认为,有四种类型的政治主张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sup>①</sup>

第一,多维度的社会正义概念。大多数的后结构主义往往把他们的激

① 参见[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413页。

进政治学局限于小规模抵抗社区、被边缘化的团体之中。这种局限于个人生活世界的政治学完全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有效抵抗。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当代资本主义革命变革的目标已经在总体上被抛弃了,不再是讨论的主题和政治组织的焦点。他们所期待的目标就是无数的局部化斗争对资本主义总体运行产生某种影响。出于对这种政治学的不满,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致力于拓宽斗争的区域,通过清晰阐明社会正义标准而为福利国家政策、公共事务和政治组织进行斗争。其代表人物艾利斯·杨主张社会正义概念“需要的不是融化差异,而是这样一些机构,它们无压迫地促进团体差异的再生产,并尊重它们”。<sup>①</sup>可见,艾利斯·杨拒绝普遍性概念,主张向他者开放。在此基础上,她没有正面回答正义的概念,而是逆向地提出了非正义的“五副面孔”,即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哈维认为,这样一种多维度的社会正义概念是有益的,它警告我们,与多重压迫作斗争的政治行为是困难的。

第二,特殊主义的正义理论。这种正义理论认为,正义深植于对地方、荣誉、工作和各类事物的独特理解中,这些理解构成了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藐视这些文化成就就是不正义的。在这里,唯一被认可的普遍性形式是无限尊重建立在地方之上的共享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哈维指出,这种理想主义政治论点的难题在于,它不能理解地方和文化是如何建构、维持和瓦解的。由于社会过程和文化实体如何在地方中相互作用这个根本性的辩证问题被回避了,它实际上鼓吹一种使地方的地理结构永远固定化的政治,其结果是压迫性的和不公正的。

第三,规模政治。哈维指出,当代规模政治对本土的强调完全消除了他者,并因此削减而非解放了政治斗争和行动的领域。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一规模来进行思考和采取政治行动。实际上,从一个时空规模到另一个时空规模,或穿越空间、语言、民族国家、法人实体和制度等等的交流是非常不容易的。基于探求如何在不同时空规模中进行交流和对话,哈贝马斯试图以过程为基础来理解正义的规范和价值如何更加普遍化。哈维批评哈贝马斯由于完全不知道时空性和地方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因此没能充

<sup>①</sup> I.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1990, p.47.

分考虑细分的政治空间这个现实。

第四,情境化知识。这种政治主张认为,在异质的差异世界中,全部知识(包括社会正义观念)都是情境的。对“情境性”的庸俗理解往往表现为由于每个人生活经历的特殊性,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发现、解释并理解这个世界。这种相对主义的、非辩证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困境,因为每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同,所以没有人能够有权利或义务代表“他人”说话,更不用说反抗“他者”的压迫。哈维认为,庸俗理解“情境性”的后现代主义派别无法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的统治路线周旋,因此通常把自己边缘化。哈维主张辩证地理解“情境性”,在个人所处的不同情境和多重身份之中,必定存在着需要优先考虑的重大差异和重要身份。就如工人阶级政治一样,虽然它重点突出的是阶级身份和利益,没有明确承认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但它追求的应该是保护而不是压迫和排斥性别和种族的利益。

哈维认为,在一个无限异质和开放的世界中从事正义事业,拒绝在不同情境中统一运用普遍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的应用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公正。虽然,哈维赞同后结构主义对异质和差异的强调,但他主张应该穿越多重异质性,寻找那些为不同差异之间互相理解和结成政治道德联盟提供基础的“相似性”。在哈维看来,这种“相似性”就存在于商品、货币、市场交换、资本积累等之中,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和社群主义通常回避的政治领域。因此,只有重新批判性地探讨正义观念形成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我们才有希望重新建立社会正义的观念,并将之作为进步政治学的奋斗目标,将之作为在各个不同地方建立政治团结的道德规范的关键价值。总而言之,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绝对不能回避普遍性,普遍性不应被草率地拒绝,而应该被重新置入与特殊性、位置性和差异的辩证法中来理解。“进步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一个同样强大的、动态的和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不同规模的普遍和特殊在从受压迫者立场出发定义社会正义的动力上联系起来。”<sup>①</sup>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立某种认识论,它能帮助我们辨别重要他者和非重要他者、差异和情境性之间的差别,它还有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助于在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基础上促进联盟的形成。对哈维来说,这种认识论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有关社会正义的普遍命题进行哲学的、语言学的和逻辑的批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在某些情境中求助于社会正义的公认力量是政治行动的特殊基础。

## 二、差异化的主张

哈维认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塑造成的最典型的后果就是差异和多样化。这种差异不仅仅来自于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生态、政治、社会及文化高度多样化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源自于资本粉碎、分割及制造差异的能力。资产阶级在通过雇用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依靠古老的文化特性、性别关系、种族偏爱和宗教信仰来分化工人。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中植入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的社会划分。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如果仍然把单一目的和抽象的社会主义目标强加在各种反资本主义运动之上,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理论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哈维认为,《共产党宣言》低估了资本的这种力量,所以他要求打破对《宣言》的机械论解读<sup>①</sup>,对《宣言》进行地理学批判性重构,即承认在高度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中阶级斗争会以不同方式展开,承认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考虑到地理事实和地缘政治的多种可能。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在差异中确定共同性,想方设法、不计成败地去集合各种高度分化的地方性运动,使它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对于哈维来说,由于地理学的敏感性,他一开始便注意到了不平衡发展问题。无论是社会生活条件、生态能源环境的差异性,抑或是抵抗运动

<sup>①</sup> 哈维认为,对《共产党宣言》的机械论解读就是指,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人口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抱负和运动的非地方化和非国家化,国家差异和分化会自动消失。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做准备,并加速它的进程;教育工人阶级认清自己处境的真正性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他们的革命潜能从而建立一种替代方案。(参见[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的多样化都表明,当今世界最为复杂和最为突显的政治特征就是不平衡地理发展的长期性和永久的波动性。哈维从空间规模的生产和地理差异的生产这两个理论维度概述了不平衡发展理论。“空间规模的生产”是说明不同空间规模上(全球、洲际、国家、区域、地方或家庭个人)的人类社会生活都是变化着的科技、人类组织的模式和政治斗争的系统产物,而且不同空间规模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和相互作用的。“地理差异的生产”则是说明在同一空间规模上也会由于地理上的差异而造成人类生活方式、生活标准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在哈维看来,“地理差异远远大于纯历史地理的遗产。它们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产、保持、破坏及重构。”<sup>①</sup>哈维详细分析了产生地理差异的社会经济过程。他指出,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主义运用空间修复策略将过剩资本从一个地方(城市、地区和国家)输出以建设另一个地方,在地方建构、维持和瓦解的过程中,新的地方网络诞生(被构造成土地上的固定资本和组织化的社会关系、制度等构型)、新的劳动领土分工、人员和劳动力的集中、新的资源开采行为和市场形成了。它们所产生的地理景观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是有极大差别的。通过不平衡的资本投资、大量涌现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工、不断增长的再生产行为的碎片化,以及空间上有序的社会区分的兴起,“差异”和“他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

哈维强调,正确理解不平衡地理发展概念应该是把不断变化的空间规模和地理差异的生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思考不同空间规模和同一空间规模内部的差异关系和交互作用,而不应该把那种在规模上的差异当做是政治分裂的根本分界线,从而固定在一个唯一规模上(如全球或地方)来思考和行动。实际上,哈维揭示的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在不同层次的生活空间(个体、家庭、社区、城市、民族国家和全球)中和具体生活过程不同侧面、环节(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不同环节)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和多重的差异性,而每个人又是生活在一个嵌在上述复杂性之中的特殊情境之中。因此,既要立足于自己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又要充分兼顾到他人所处的空间来思考解放政治学。由于普遍性概念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状况相冲突,哈维反对抽象谈论普遍性,而推崇差异性和多样化。因为普遍性主张很容易成为镇压和统治其他利益集团的工具,并且这种主张由于过深地嵌入自由主义概念而不可能为了任何解放目标被动员起来。因此,他力图建构的空间政治就是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上的斗争目标,强调不同规模上围绕空间规划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组织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连接各种地理规模上的政治行动,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从而把社会主义事业从那种乏味的同质性中解放出来。正如哈维所说:“在某个适当的制度结构内建构参与这种对话的政治力量,在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运用到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为特征的世界舞台上时,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中介步骤,这大概也就是‘适当地集合各种特殊利益’所包含的全部内容”。<sup>①</sup> 哈维认为,在把各种斗争与不同目标综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全球目标的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巨大贡献,因为它提供了各种理论工具,人们可以借助它们在多种差异中发现政治共同性。

总之,哈维提醒我们,不平衡地理发展在全球的蔓延对探索解放政治学以很大的启示,我们要正确面对不平衡发展的现实历史条件,并自觉将不平衡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建构以差异性和多样化为核心的空间政治。当今社会中,差异和多元化问题的突出表明解放与自我实现的斗争是也多元的,而不是单维度的。这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维度,性别、团体差异、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同样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探求以差异性和多样化为核心的空间政治理论,哈维包容了生态、性别、种族以及各种群体和社会集团的不同政治诉求,并致力于把目标相异而又多重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哈维经常使用身份、差异、他性等后现代话语,但他始终是在具体的物质环境和政治方案中来探讨有关身份、多元文化主义、他性和差异的政治,并没有走向后现代主义,相反,他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 三、生态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当代政治冲突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既体现在民族国家间在自由贸易名义下所进行的政治利益争夺中,也体现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中,更体现在生态学以及其他政治理论有关未来和当代的争论中。哈维认为,我们不能孤立地谈论生态环境问题,因为生态问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社会政治问题。因此,生态视角是社会主义政治不可或缺的维度。哈维由此明确提出,把人类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与把人类从与自然的纯粹工具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二者之间是一致的,“全部社会政治的规划都是生态的规划,反之亦然。”<sup>①</sup>

#### (一)生态社会主义政治

哈维指出,有关社会—生态变迁的历史地理记录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记录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政治和生态计划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方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不分。自启蒙运动以来,“支配自然”的观点使自然生态环境打上了深深的人类活动的烙印,对自然的统治开始归入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货币循环、榨取剩余价值等资本积累要求产生了诸如生态匮乏、人口过剩、可持续性发展等当代流行的环境话语。可以说,任何关于生态系统的改造计划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支配自然”观点的批判所揭示的那样:对作为“他者”的自然的统治和对于“各种他者”的统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回避改造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这个难题,必须“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并为之奋斗,把我们从资本主义通过其非常明确的生态规划而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来。”<sup>②</sup>然而,哈维提醒我们,迈向环境—生态政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一路坦途。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从资本主义手中接过了强大的生产主义伦理和宽泛的工具主义方法来理解自然世界,并且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关系的变革,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同“统治自然”的观点剥离开来特别困难。

① 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②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为了为生态及社会困境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哈维试图通过探求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相通之处,从而为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提供有益的启示。哈维形象地把这一理论工作称之为“概念之间的摩擦起火”,并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异化、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美学。哈维认为,异化、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共同关注的话题。“自我实现”的理想广泛存在于生态学文献中,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自我发展。然而,在通往解放和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财产、阶级关系、雇佣劳动以及市场交换拜物教把我们与“自然”以及他人的感性和直接的联系中分离开来,使我们产生异化。如何恢复与自然的非异化关系就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学家们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计划的一个部分。哈维强调,“从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那种同自然(以及他人)的异化中向‘更高形式’的复归,这一点必须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目标。”<sup>①</sup>这种向“更高形式”的复归,既不是回到一种同自然的直接关系,也不是回到前资本主义或公有制世界,而是探索建立在异化之上的现代社会的解放潜能。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文化和知识的手段来“超越”诸如科学知识、组织效率、技术理性、货币和商品交换等中介,从而实现有意义的工作和娱乐。劳工运动藉此就能够果断地处理同自然、他人和自身异化这些生态运动的问题。

第二,社会关系和生态计划。哈维强调,我们在进行生态改造时,必须考虑生态计划与发起、实现和管理它们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往往倾向于认为,生态计划必然是与非等级的、非中心的、高度民主的和彻底平等的社会关系高度一致的计划。哈维指出,如果采取这种立场,肯定不符合探索我们物种潜能的要求,而且很可能妨碍我们解决大多数人所遭受的生态灾难。他举例论证,如果以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关系来控制核力量就很有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命威胁。相反,只有依靠高度集中的和非民主的权力关系,再加上分等级的命令和控制结构,才可能成功控制核力量,使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人类免遭灾难。因此,生态问题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是社会关系问题,撇开社会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生态计划只可能是空想。当前大量生态运动都是在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寻求解决生态问题,这样所获得的肤浅简单的答案对于进行切实可行的社会和生态改造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第三,技术问题。哈维指出,在把社会关系嵌入到生态计划的过程中(反之亦然),必须认真关注技术问题。被资本利用的技术剥夺了工人的技能和艺术鉴赏力,同时使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自我实现可能会因为技术原因而受到阻碍。再者,某些技术甚至违反了更好地控制自然这一目标,因为它们把高度的环境风险与最小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对于此,要么如当前许多生态学家主张的那样彻底拒绝资本主义强加给人类的技术合成物,要么逐步改造它们使之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因此,如何精选那些最大限度地减轻(而不是加强)对自然代谢关系破坏的技术就是必须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难题的重要部分。

第四,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时下流行的多数激进生态批判都起源于无政府主义,它典型地强调社群、地点、地方、亲近“自然”,特殊性以及非中心性。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关注无产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以及推翻作为世界历史统治制度的资本主义。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都必须正视这种普遍性和地方性的对立。因此,哈维主张一种更具地理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坚持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使之更具生态敏感性。哈维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一般斗争总是由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特殊斗争所组成。这些特殊斗争既包括反对资本主义所从事的特殊类型的社会生态计划,也包括反对作为社会生态计划前提的特殊社会关系的特殊斗争。由于社会生态计划的形式和规模不同,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也会随之变化,社会主义并非必然采取同质性的结构。因此,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都必须尊重文化、地方和生态多样性所创造的生态系统差异,并根据这种地方差异来进行设计和改造。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源自纯粹的生态区域主义、地方和地方性社群主义政治。然而,在这样一种非中心化政治的强烈地方主义之中,将生物区域简单地看成是历史地或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看做由各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规模上运行的相互交叉的过程所塑造的。换句

话说,他们以最不辩证的方式来看待生物区域,将其视为物而不是变化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产物。缺乏辩证思维方式的生态社会主义将会很容易陷入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危险境地。因此,在坚持普遍性和差异性辩证法的前提下,探求社会—生态计划的多样性是生态社会主义思维的核心。

第五,时间和空间规模问题。哈维提醒我们生态社会主义计划还需要重视时间和空间规模问题。人类的实践和生产活动是在不同时空规模中进行的,由于时空规模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计划就必须依据不同规模的生产来进行行动和决策,而不能固定在一个唯一规模上(如全球或地方)来思考和行动。因为等级制的空间系统中经常会由于生态难题而造成这种窘境:在一种规模上产生良好政治意识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在另一种规模上产生良好的效果。比如说,为改善环境质量,欧洲汽车生产进行缩减,但这也许就意味着牛津或都灵工厂的关闭,从而导致大量工人的失业。因此,“人们必须创造出某种政治权力结构以便能够在那些由不同计划给定的不同规模之间进行‘仲裁和翻译’。”<sup>①</sup>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在不同空间规模上调整自身内部互相矛盾的政治学,既要立足于自己又要充分兼顾到他人所处的空间来思考生态社会主义。

总之,哈维强调社会主义者在思考如何开发人的潜能,如何创造出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计划的生态维度都具有敏感性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这些重大问题时,必须具备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

## (二)环境正义

实现环境正义是生态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标之一。由于“全部环境——生态学的争论都是有关社会的争论,并因此复杂地折射出其他领域的各种斗争”。<sup>②</sup>所以,争取环境正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争取社会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正义。哈维首先概括了20世纪晚期有关环境话语的几种主导

①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②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页。

形式。<sup>①</sup>

第一,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这一话语认为环境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当市场失灵产生环境问题时,政府通过制定颁布一些标准来进行事后处理。在这一观点中,私有财产和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权利是不可挑战的。对环境正义的关注严格地服从于对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关注。因此,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为资本积累、经济效益和增长来管理环境。由于这一环境主张没有暗含对资本积累霸权的任何挑战,这一话语被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权力所接受。

第二,生态现代化。与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相比,生态现代化信奉预防比补救更可取。认为社会应该对环境调节和生态控制采取主动的姿态,以保证生态的可持续性。生态现代化把环境问题归因于对自然界的不间断破坏,可持续发展的修辞被附加到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增长经济学的理想之中。在此,生态现代化把自然界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成了替罪羊,因而它并不挑战与环境问题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哈维指出,虽然它确实暗示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严格调控,但它很容易堕落成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权力的另外一种话语代表。例如跨国公司以可持续发展为名,使自己的掠夺合法化以管理全球资源。

第三,“明智利用”和私有财产保护。针对生态现代化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发起了一场“明智利用运动”。这场运动利用了环境激进主义的长期传统,即财产所有者无论如何都具有种种动机来保养和维持生产力的生态条件。哈维认为,这一论调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多数土地开发商和资源开采者是不会详细考虑有关土地使用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更别提生物多样性、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了,因而它不可能处理好环境正义问题,更不用说考虑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了。

第四,环境正义和为穷人辩护。哈维认为,当前的环境正义运动才是真正接触到了环境问题的实质。由于它把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置于环境议程的重要地位,不会顺从于政治经济权力的笼络,这就直接挑战了占统治

<sup>①</sup> 参见[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0—449页。

地位的话语。环境正义运动坚持主张对自然命运的关注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命运,因此把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穷人和边缘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其关注的中心。一方面寻求人的自尊和权利;另一方面致力于环境保护,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环境正义运动把生态与社会正义目标密切地联系起来。环境正义意味着要解决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身份等社会的不平等。正是因为,环境正义运动看穿了在由政治权力、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和文化成就的严重不平等所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权利的平等都是虚幻的形式,因此,它必须既要与危害生态的直接行为作斗争,又要反对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分配关系。

在此,我们直接回到了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之间的联系上,也使我们有必要思考环境正义和城市问题。环境运动对城市存在着长期的敌意,城市通常被认为是制造污染和劫掠地球的制高点,因此,城市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诋毁。在哈维看来,城市实际上是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城市来探讨环境问题,因而主张克服诋毁城市,浪漫化乡村的偏见。在当今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世界中,“城市化行为带来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环境问题,并产生了广泛的环境后果,这些后果在相当不同的空间规模上具有不平衡的社会影响。”<sup>①</sup>也就是说,城市化可能改善了某一地区范围内的环境问题,但却是以将环境危害转移到其他范围为代价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单纯的规模内来彻底解决。哈维举例说,电力促进了城市环境的清洁和健康,但却是以大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氮和硫排放为代价,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加剧了全球变暖和酸沉淀等问题。因此,哈维指出,在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复杂层次(地方的、大城市的、区域的、全球的)中,判断哪一种社会正义理论在社会上是最公正的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哈维指出,我们面临着正义理论的多元性,所有的理论都同样地看似有理,又同样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因此,我们不必在不同的道德判断之间强求一致,也不要指望一种单一的社会正义理论可以适用于不同规模上产生的不同环境问题,应该在差异的环境中运用不同的正义原则。当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5页。

然,环境正义运动也不能仅仅束缚于地方的经验、权力状况和社会关系中,而应该越过空间、越过多重环境和社会状况去创造一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话语。这一话语不能仅仅依赖于道德政治学,它必须处理物质的和制度的问题,包括:如何一般地组织生产和分配,如何对抗全球权力政治的现实,如何不仅仅以分散的、自治的、地方化的社群主义方案而是要以更加复杂的政治学来替代资本主义的霸权。这就需要反抗制造环境和社会不公正的社会过程以及相关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制度构型、话语和信仰制度。因此,把环境正义运动带入一个实际的革命行动的世界,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总的来看,哈维的解放政治理论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坚持政治解放实现的根本在于经济解放。由于哈维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使他在探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道路上,不是单纯地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生态问题,而是要求对抗并改造产生这些问题的物质实践过程。在哈维看来,这一过程就是残酷的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不管是个人还是环境都深深地嵌在资本积累和循环的过程中,因此,既要消灭不正义的政治制度,又要摧毁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经济制度;既要探究环境改造的替代性模式,又要探究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替代性模式。社会主义事业必需直接挑战在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因此“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来称呼它,它在根本上都是一种阶级规划”。<sup>①</sup>

第二,注重运用普遍性和差异性的辩证法。哈维空间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过程辩证法,强调在过程中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由于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规模上运行的过程是具体而复杂的,被过程所塑造的事物必然具有复杂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因此,普遍性和差异性的辩证法思维贯穿于哈维政治理论的分析始终。既批判社会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又承认在特殊情境中求助于社会正义的公认力量是政治行动的特殊基础;既关注地方和地理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0页。

差异的多样性,亦同样关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必然的同质性;既强调差异和“他者”话语的相对独立地位,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的总体框架中恢复种族、性别、宗教等,又强调不能过高估计其重要性。

第三,坚持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视角。哈维认为,社会建构理论的混乱来自于对规模问题的失语,因此,他始终从不同地理空间规模(个体、家庭、社区、城市、民族国家和全球)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经济、政治、环境问题等。同一政治主张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因此不能局限于一个空间规模上来思考和行动,而必须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上的斗争目标,主张在不同空间规模上思考和行动。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探寻

虽然当前没有坚决的、足够统一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及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力量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和挑战。但哈维并没有因为现实的困难而放弃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哈维关于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探讨,虽然目标与早期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新社会运动高度一致,但其实际前提和理论基础却并不一样。可以说,“在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基础上,他的视角更具综合和开阔特征。他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在全球化规模上把身体和政治人确立为当下普遍诉求的基础,以人的(劳动和生活)尊严的普遍权利为中心来设计乌托邦理想。”<sup>①</sup>

#### 一、替代性方案的设想——辩证时空乌托邦理想

“怎样的乌托邦理想是可能的呢?或者说有关正义社会的人类想象力怎样才能反资本主义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呢?”<sup>②</sup>哈维认为,这个问题是马克思解放政治学探索的中心主题。当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受到怀

① 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②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页。



疑,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使资本和商品主宰了人们的社会想象,人们越来越关注于现实,乌托邦理想和运动受到人们的冷遇、忽视甚至嘲笑,乌托邦遭遇了时代的困境,是否应该放弃乌托邦理想?哈维坚定地认为,乌托邦具有社会批判功能,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将来社会的设想,并能够提出一些替代方案,因此乌托邦冲动是不能简单地加以抛弃的,为此,哈维通过对传统乌托邦思想的批判性清理和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明确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

哈维指出,回溯乌托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乌托邦主要体现为一种理想空间的规划,并且这种规划带有永恒性。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乌托邦和城市这个独特的空间就密不可分。哈维列举了以城市模型为代表的空间乌托邦形态,诸如罗伯特·欧文的新哈莫尼、傅立叶的理想城市、爱德华·查姆布莱斯的公路城镇、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梦想等。这种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和绝对化,用空间来压制时间,“所有这些乌托邦形式都可以描述为‘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因为社会过程的暂时性、社会变革的辩证性—真正的历史—被排除了”。<sup>①</sup>多数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积累的力量来完成的,资本逻辑和国家权力的实施使蕴含其中的批判和反抗力量轻易地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维持了所谓的“稳定性和和谐”。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sup>②</sup>因此,在传统乌托邦中,辩证法是被压抑和排斥的,它把空间与时间、历史与地理、社会与生态、同质性与多样性、确定性与偶然性等因素对立起来,不仅在理论上陷入了片面性,政治上也容易陷入集权和专制的陷阱。

与空间形态乌托邦相对立的是社会过程乌托邦,社会过程乌托邦通常以纯时间术语来表达而不受空间的束缚。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由于强调时间,而“习惯于迷失在具有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并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的点(在空间和地方之中)”。<sup>③</sup>作为过程的乌托邦正是自由主义

①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②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③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所支持和看重的。哈维认为,自由市场乌托邦是相信能够通过成熟的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动员个人的欲望、驱动力和创造力,从而有效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然而自由市场并没有带来积极和正面的结果,恰恰相反,当前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认为只要给自由市场繁荣发展的空间就万事大吉了)造成的后果是: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不平衡地理发展状况的加速,所有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和权力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和为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那些情感结构被毁以及大面积的环境问题。为什么如此美好的设想却会产生悲剧后果呢?哈维对此提出了深深的质疑和批判。他认为,答案广泛地存在于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实施及其不断的、长期的对空间形式的破坏和重组中。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它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建造起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而建立新的地理景观以实现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

哈维认为,无论是空间乌托邦还是过程乌托邦在理论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实践上必然落于空想而走向失败。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之所以失败在于“任何过程乌托邦理想的纯度不可避免地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与具体实现它所必须的空间框架和地方结构特性是相互冲突的”,<sup>①</sup>相应的,单纯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之所以失败,在于它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生产它们的时间过程的特性相冲突”。因此,如何把乌托邦从其传统片面形式中拯救出来,构建一种合理形态的乌托邦就是哈维试图完成的理论任务。乌托邦的规划不再是自由主义式的“非此即彼”问题,而是“既又”的问题,哈维主张超越和克服以上两种乌托邦的缺陷,建立一个辩证的时空乌托邦。他认为,未来乌托邦不应是以某种幻想的模式来构建,而应依据现存社会中的时空物质条件来设计。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研究为乌托邦方案如何能够立足于现在和过去提供了线索,从这一研究中就能发掘出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模糊形式。哈维的“任务就是确定一个替代方案,而不是关于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甚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进程。

①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这个任务就是齐心协力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根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sup>①</sup>辩证乌托邦理想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动力,使人们产生一种意愿去超越或推翻那个资本积累、阶级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总体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乌托邦中,人们关于美好未来的想象与现代社会的技术规划以某种灵活的方式结合起来。

## 二、替代性方案的策略

### (一) 解放身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中对“身体”的关注达到了极致,“身体”急剧扩散成一个时髦的论题,成为所有理论讨论的基础。究其根源,哈维认为具有双重的理论起源:一是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的兴起以及社会性别、性、精神分析的意义等问题使“身体”成为讨论的主题。二是来自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人们对先前建立的理解世界的全部范畴失去信心。从而激发了向“身体”的回归,身体成了理解世界的最根本基础。在这两个影响广泛的运动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开始关注“身体”,“身体”成为政治抵抗和解放政治学里的特殊场所。因此,哈维对身体话语的潜在政治意义十分重视,并努力从身体角度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sup>②</sup>因此,身体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基本内容。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存在”,而且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们也不例外。列斐伏尔认为,身体和社会空间联系最为紧密,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福柯则认为,身体是某种政治、经济和权力的锻造物,是在某种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在一个权力无时无刻不在

①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的社会里,身体总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和被奴役、支配的过程中,所以身体的反抗是首要的。而哈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从资本运行的角度来展开对身体的研究。在他看来,要了解身体,解放身体,还得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找出问题的症结。

身体是一种社会构造,因此不能离开建构身体的那些因素来理解它。哈维认为,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劳动过程。不同的劳动过程,不同的社会生产过程作用于身体,人类就被烙上了阶级、种族、性别及形形色色的其他特性。所以,对身体特殊性的理解不能独立于它所嵌入的社会生态过程。也正是通过“劳动过程”哈维建立起了作为最宏观的全球化 and 最微观的身体之间的联系。“全球化实际上是对社会劳动过程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描述,因此,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理解,身体就不能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被理解。”<sup>①</sup>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在进行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身体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规训,所以,哈维把身体视为资本积累的一种策略。“事实上,两个积累过程——人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是不可分割的。”<sup>②</sup>

哈维认为,马克思涉及身体生产理论的观点主要是围绕论述劳动力的生产而展开的。“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值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sup>③</sup>也就是说,劳动者的身体被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所塑造。虽然身体是资本的附属物,是承担某种特定经济角色的被动实体,但哈维试图激活身体所蕴含的反抗力量,他是从分析资本运行过程如何塑造劳动者身体开始谈起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者与劳动力是不同的,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的循环对劳动者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哈维对劳动力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一一进行了探讨。

第一,劳动力的生产性消费过程。在资本主义控制的劳动过程中,劳

①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②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动力商品的生产性消费尤其需要把情感意识和创造性劳动力等动员到特定的生产目标之中。这就需要受过教育的、灵活的劳动者,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又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劳动者进行的教育不可能完全允许劳动者独立自由地思考,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在根本矛盾的方向上推动着劳动者身体的极限(能力和可能性)。哈维指出,虽然这种矛盾可能会在总的劳动力内部内在化,但不一定就意味着它们在每个劳动者的身体内被内在化。实际上,劳动力的“集体身体”被分解成有关技巧、权威、智力和体力功能等许多等级,这使可变资本的范畴在内部具有异质性,并且,这种异质性是不稳定的。集体劳动者内部的异质性及其不稳定性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颠覆和反抗资本逻辑的机会。

第二,交换过程。劳动者与资本家所交换的商品是劳动力,因而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拥有完全的权利,但他们对劳动者个人不拥有合法的权利。马克思反复强调,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劳动的一个根本原则。然而,在资本循环的时空关系中,劳动者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个体控制的一系列力量的支配下,资本频繁地损害、抑制、残害并消灭劳动身体的完整性。于是,“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就是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sup>①</sup>哈维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由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地区性劳动市场摆脱了时空约束,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在不同地方实现了不同的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劳动力交换的高度地域性和地方差异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果,这将成为阶级斗争的特征之一。

第三,消费过程。劳动者不仅作为生产者和交换者存在于可变资本的流通之中,他同样作为消费者和自我的再生产者存在于循环过程之中。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资本主义就会试图指导劳动者的消费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使劳动者身体成为理性消费的场所和执行代理人。这必然会引起劳动者对资本主义消费控制的反抗,要求进行自主的生活方式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选择。

通过对劳动力这一可变资本循环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当代社会中身体的现实状况。资本不断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在劳动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环节上对劳动者身体产生着建设性或破坏性的作用。哈维认为,劳动者应该抵抗资本对身体的压迫,通过改变身体存在状况来改变身体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而对资本进行抵制和反抗的各种可能性也应从劳动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环节中得到解释。总之,哈维所谈论的身体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从资本循环过程来探讨身体的现实状况和反抗的潜能。这与后现代主义政治中,以身体为中心的生活政治完全不同。那种政治是在要求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追求日常生活中个人尊严和个人自主权的实现,是一种个人规划而不是集体规划,实际上是抛弃了解放政治的合法性。哈维的解放政治学所要实现的是变革生产关系,将身体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成为政治行动者,从而恢复作为劳动者的身体的尊严与权利。

## (二)重建地方

哈维认为,现代化、资本积累和空间整合在地方之中及其之间造成了相当大的不安全感,地方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确理解空间、地方和环境之社会的和政治的辩证过程,对我们如何创造替代性未来具有极大的教益。把地方从商品交换和技术理性世界中解放出来,重建地方是社会生态政治学的重要策略。

哈维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地方的构造和重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当某一发展阶段所塑造的地理景观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时,受地方限制的固定性和资本的空间流动性之间的张力便会爆发危机。因此,必须围绕新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基础设施、新的生产和消费中心、新的劳动力聚集,以及改进了的社会基础对地方的地理构型进行重塑。当新的地方创造出来的时候,老的地方不得不贬值、破坏和重新开发。庄严的城市变成了遗产中心,旧的工业中心非工业化了,投机性发达市镇和高尚社区在灰烬中诞生。资本主义巨大的空间重组浪潮产生了地方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减弱了,相反,地方对于资本积累来说变得越来

越重要。哈维举出了四条理由。<sup>①</sup>

第一,自1970年以来,时空关系被彻底重构了,时空压缩状态改变了地方在资本积累的全球样态中的相对位置。曾经处于安全环境中的城市变得脆弱了;居民们被迫去寻找能够得到再造的地方,以便在新的空间关系网络中生存下去。当实际的地方安全普遍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担心和重视地方的一般意义,和自己所处地方的特殊意义。

第二,当交通成本很高、通讯困难的时候,地方由于依赖于垄断可以免于竞争。但是当今交通成本的下降使得生产、商业、营销,特别是金融资本比迄今任何时候都要更迅速地在地理上流动,在这种条件下,地方固有的垄断权力大大地削弱了。这使得资本可以更多地利用地方间在资源质量、数量、成本和便利实施方面的细微差别而获利。

第三,居住于一个地方的人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正在与其他地方竞争高度流动的资本。为了获得或保持资本投资,处于地方中的人们试图把他们的地方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且使其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于是,出售地方、运用各种广告以及形象包装技巧被广泛地应用于地方之间的竞争。

第四,最近20年来,由于吸收过剩资本的有利可图的项目越来越难找,相当大部分剩余资本陷入了投机性的地方建设。出售地方并突出它们的特殊品质(退休养老或旅游的胜地、新生活方式社区等)变得越来越疯狂。

总之,当前的地方建设已经深陷于金钱、商品化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中。以前,地方建设由于垄断保护还可以进行较为自由地多样化选择。现在,则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为了吸引高度流动的资本或从投机开发中快速获利而保护良好的商业环境。实际上,反对这种建设模式的斗争在地方建设的历史地理中比比皆是,例如,争取表现价值而不是表现货币和交换的社区发展,反对非工业化、反对通过高速公路建设而掠夺城市的斗争等。然而,这种抵制并没有阻止通过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地方建设的整体过程。一

<sup>①</sup> 参见[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342页。



方面,当投机资本建设或掠夺一个地方的选择被拒绝时,它会迅速发现其他一个可以投资的地方;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大众与投机行为共谋的情况。共谋的原因通常是压迫与笼络兼而有之。资本主义通过给予大众分散的产权,为地方带来新的就业和经济机会等来笼络民众,使劳工组织常常加入而不是反对地方性增长联盟;亦或是通过加剧地方之间的竞争和政治压制来瓦解抵抗和斗争。那么,应该如何真正将地方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以抵抗和拒绝地方建设的资本主义逻辑呢?

哈维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追问”激发了我们重建地方的决心和信心。海德格尔提出的居和根的本真性正在由于技术、理性主义、大规模生产和大众价值的扩散而遭到破坏,作为居和根的家园的地方也由于纯粹组织化的权力和市场渗透的深度不断被破坏而变得不真实。因此,地方建设应该就是摆脱技术合理化、商品化、资本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控制,从而恢复根基、恢复居的艺术。哈维指出,如果我们重新唤醒了地方的这种信念,将会激发人们的抵抗,这些抵抗将越来越强地聚集于地方的替代性建造上。因此,保护或建立地方感(围绕地方建立起来的集体记忆、共同的宗教信仰、特殊的文化身份标记等)成为重建地方的一项积极因素。于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社群主义政治形式活跃于世界舞台。

在哈维看来,社群主义政治强调的“他性”和地区抵抗确实能够在众多特殊的地方兴旺,这些运动为革命性的“战斗的特殊主义”<sup>①</sup>提供了潜在的基础。即使一个地方的人们的日常实践极少表现出共同性,甚至表现出完全的政治矛盾,但对这个地方的忠诚却具有强大的政治意义。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各种力量就非常不同,但它们全都围绕对巴黎这个地方的共同忠诚而团结起来,并且全都同意解放巴黎是至关重要的目标。这个事实证明了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有效性,它能够通过在精神上以及大地上

① “战斗性的特殊主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来的,是指把各种特殊利益适当地集合起来,即由一个地方积极的团结经验塑造出来的理想最终一般化和普遍化为对全体都有益的运行模式。哈维认为,这种“战斗的特殊主义”确实激励了社会主义事业,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深刻的保守性,因为它们依赖固定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的团结模式,即忠诚。在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化中,对于地方的忠诚是不会轻易实现转化的。难题在于如何定义在不同种类与层次的抽象之间进行交换和翻译的模式。

建造地方而被动员和实施。哈维指出,国际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学的失败恰恰就在于,常常从特殊地方经验的物质世界中抽象出普遍性,从而排除了对环境、背景、集体记忆、社区、神话等基于特殊地方的重视和关注。但是,哈维也强调由于社群主义是基于特殊地方共同体所建立的,往往是狭隘的、排他的,因而很容易倾向于把社群团结和压抑转化为暴力和压迫。当地方越来越具有排他性时,它们也就越来越不能形成一种影响货币和资本积累的集体力量,反过来却很容易被资本力量所控制。因此,在如何动员和团结地方力量这一问题上,哈维既强调集体身份、行为共同体和归属规则的重要性,又反对社群主义政治的狭隘性和排他性,要求地方内部以及地方之间的全部差异都得到体现、协商和容忍,从而把各种特殊利益适当地集合起来。

总的来看,哈维主张“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sup>①</sup>这里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把地方建设从货币、商品、资本和交换中解放出来,改变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建立起来的地方网络,并将之用于进步目标,而不是拒绝或破坏地方。第二,把地方建设从强调声望、权威、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性构造中解放出来。第三,把地方建设从建设想象之地(新的景观和消费主义纪念碑等)中解放出来。只有走出当前地方建设的诸多误区,才能真正解放地方、重建地方。

### 三、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实现途径

面对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我们如何摆脱资本逻辑的空间规划,设计出新的替代方案,哈维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实现道路。

第一,重组人作为物种的自然能力和技能。哈维认为,人类在自身生物进化和建构社会的双重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技能:生存竞争和斗争、适应生态环境、协作、合作和互助、改造环境、安排空间秩序、安排时间秩序。各种技能要素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而组合起来形成不同的社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页。

会构型,而每一生产方式都可以被看做是基本技能中的多种要素的特殊组合。在哈维看来,人类作为社会替代方案的实践主体就如同一个个建筑师,人类乌托邦冲动的核心就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建筑师。作为自己未来和命运的建筑师,我们希望实现什么目标,又能够实现什么目标,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不同时空中重组各个技能要素形成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实现可能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第二,肩负起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在总体性的替代方案中,哈维主张我们既要关注对自然的责任,又要关注对人类的责任,在他者、自然和社会所织造的“生命之网”中思考个体如何行动,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共生共荣。只有在这两个方面都尽到责任,我们才能建构广泛的社会运动。关于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前景,生态学和各种政治运动中都充满了各种竞争的和相互抵触的主张,有多重矛盾需要解决,哈维主张在所有冲突和差异之中实现对话,在多种时空规模间以一种更加动态的、共同进化的方式连接起来。这就需要达成某种广泛的共识,构筑某种共同的基础,哈维指出对话的基础就是:“我们如何在个人和集体层次上设计和履行总体上对自然的责任,尤其是对我们人类的责任。”<sup>①</sup>

第三,建构从事批判的政治个人和集体政治学。作为整体性的替代方案,一方面体现为对从事批判的政治个人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是对个人的活动空间进行另一种想象,想象与当下完全不同的劳动方式、财产制度以及政治安排;另一方面要建构一种集体政治学,哈维将其落实到“社区”的规划。在哈维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决定了实现社会变革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以前的工厂,而是一个个社区。社区变成了当前对全球资本空间规划的激进抵抗场所和政治行动的基础和重要力量。为此,必须把社区的重塑和激进的政治学联系起来。

第四,普遍性权利是全世界无产者打破地方性局限而团结起来的纽带。由于哈维将身体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一个战场,因而他将斗争绑在各种基本权利之上。哈维本人比较偏好于以下普遍权利:(1)生活机会的权利,(2)政治联合和良好治理的权利,(3)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者的权利,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4)人的身体的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5)豁免权/变动权,(6)体面健康的生活环境的权利,(7)集体控制公共资源的权利,(8)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9)空间生产的权利,(10)包含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差异权,(11)我们作为类存在物的权利。上述诸项权利综合了《共产党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某些具体提法,既概括了当前新社会运动的某些要求,又描述了反资本主义运动所必须的某些内容,同时又试图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的类存在概念进行整合。借此,哈维认为“普遍性权利”提供了联合各方的动力,他因此强调“反叛的建筑师”应是这些权利的倡导者,将普遍性权利的实现与否作为评判替代性方案的标准之一。

哈维的空间政治构想试图描述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图景,并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张解放政治诉求,为生存于困境之中的人类带来了希望,他的理论有两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准确捕捉和把握了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特征:不平衡发展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哈维坚持从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出发,在对现时代条件的分析基础上阐发其政治主张。他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迁,资本的全球空间生产深化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二元化结构,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多重差异性被资产阶级权力分化和分裂。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以及社会主义在实践上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哈维意识到差异性、多样化问题在今天理论中的重要性,它实际承载着打开人类可能未来的重任。正是在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哈维试图通过重申乌托邦理想来克服当下左派的缺陷,从地理角度以差异性把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的同质性目标替换下来,从而反对传统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我们看到,哈维的解放政治理论也是以差异、生态、身体、地方等后现代主义流行术语作为主题的,但它与以后现代差异话语为基础的激进政治学是截然不同的。哈维始终坚持深入到后现代话语背后,去探寻建构这些话语的物质实践和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因此,在哈维那里,不管是解放身体,还是重建地方,亦或是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前提条件都是要求从资本积累的逻辑中解放出来,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斗争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哈维认为,“马克思的结论非常简单,并且毋庸置疑地正确:跨越资本主义的唯一

道路在于劳动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社会过程的全部环节。”<sup>①</sup>哈维在维护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依据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嵌于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在不同的环节和情境中会拥有不同的身份和追求不同的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因而要充分尊重这种差异,而不是压制多样化,只允许单一的传统阶级斗争模式。哈维主张,在一种适当的规模之上寻求把各种特殊利益结合起来的争取反对普遍物化和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当前解放政治的现实可行性方案。

第二,拯救乌托邦冲动,以激进的批判意识重建希望和实践的关系。哈维高度肯定乌托邦批判现实和探寻未来的作用,认为在实现社会替代和社会变革中,乌托邦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乌托邦作为带有实践意图的希望空间,不能停留在抽象层面,而必须成为在现实中能起作用的具体希望,这就需要通过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连接未来的希望与现实的政治。从理论逻辑上看,替代方案是任何乌托邦学说必然要探究的话题。当代西方学者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纷纷寻求替代方案,如德里达的结构主义、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克劳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作为反对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同盟的左派理论家,哈维同样也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理论趣旨,但与上述种种替代马克思的做法不同,哈维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立场,并把空间分析的视角引入了时间分析中,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原则和方法,使得他的视角更具综合和开阔特征。哈维不仅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进行理论批判,同时也反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寻找资本主义的多元替代方案。他把具体的劳动权利、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权利与“政治的普遍性和全球主张”结合起来,寻求在时间与空间、社会与生态、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尽管哈维尽力避免使自己的辩证乌托邦构想陷入空想主义和改良主义,但他在用辩证乌托邦作为社会替代方案时在理论上仍存在着缺陷,在

<sup>①</sup>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困难。在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中,如何调和乌托邦中幻想与现实的张力是哈维也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们都无法解决的共同问题,这也正是我们今后要致力于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 第六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

### 第一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論定位

20世纪60—70年代,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多元化(欧洲民主政治的危机、作为反抗政治的学生运动的流产以及女性主义政治、生态政治和第三世界政治的崛起)、文化矛盾(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引发的价值冲突)等时代背景的影响下,西方左翼理论彼此之间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目标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理论流派。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当代西方社会问题而形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从后结构主义思潮出发解释、重建马克思思想而形成的后马克思主义;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而形成的晚期马克思主义。<sup>①</sup>作为西方左派重要旗手的哈维,其学说从属哪一理论流派和谱系呢?

#### 一、哈维与晚期马克思主义

“晚期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核心概念,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逊、德里克、伊格尔顿等。在我国国内学术界,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较早对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潮做了较为详细地分析与探讨。

<sup>①</sup> 参见王雨辰:《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兼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身份认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他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区分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就其理论立场和方法论原则而言,晚期马克思主义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接继承人。因为它仍然是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去分析和批判资本统治下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它面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这一更加复杂多样的语境。虽然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浪潮中发生了诸多新发展和新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历史语境,但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绝不可以将其瓦解。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左派的攻击,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全球性问题、新型压迫和不平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代表着一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因此,是否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如何认识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是判断某一理论是否属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基本标准。毫无疑问,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创建是属于这一理论谱系的。哈维不仅公开声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来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规律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将空间视角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中,从而更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这集中体现在哈维对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结构生产之间内在关系的论述上,由此出发,哈维从空间视角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展开了分析和批判。

第一,从资本逻辑出发分析全球化的本质。面对当代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哈维认为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散,他坚持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全球化是如何产生、形成和不断扩大深化的。哈维认为,资本不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这些过

<sup>①</sup> 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剩资本和劳动仅仅依靠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是无法消化的。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主义采取空间修复策略来为资本积累开拓国外的新空间,实现资本的横向空间转移。在资本不断向外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全球化随之发生了。在哈维看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是当前全球化深化扩大的动因,而灵活积累体制则是加速资本全球化的具体实现机制。灵活积累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上分散进行生产,特别是把资本转向第三世界劳动力低廉的地区,小规模生产和追求买方市场。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形成了地理上流动灵活的组织,与这种劳动组织相应的就是大量机构上的、产品方面的和技术上的创新。灵活积累体制加速了资本周转时间,消除了空间障碍,使资本的活动空间真正具有了全球化意义。

我们看到,由于哈维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因而认识到资本仍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性逻辑,离开它就无法对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坚持从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角度来把握全球化,将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空间生产和全球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从而从空间视角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

第二,揭露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哈维对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但由于它本质上仍然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它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资本积累创造便利条件。新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中宣扬“阶级”是一个无意义的虚构范畴,只存在于社会主义者的想象中。而哈维以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姿态重新强调了阶级分析的重要意义。在哈维看来,还原论(把阶级还原为经济利益)或简化论(把社会斗争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间的斗争)确实妨碍了解放任务的完成,但是,对于揭示隐藏在日常行为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言,阶级范畴的抽象性是至关重要的,借助于“阶级”,才使得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成为可能。当然,哈维也意识到差异和多元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因为在资本积累过程的不同环节和情境中会形成不同身份和各种利益集团,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

因此,哈维主张,要将人们从资本积累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就不能限于单一、抽象的社会主义目标和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而应该在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不同社会集团的具体斗争目标的前提下,致力于把各种目标相异和特殊利益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第三,从资本积累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人们体验时空方式的改变这一视角入手来批判后现代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它非但不是反抗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激进话语,相反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深刻变化的理论投射,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都持否定态度,哈维在这一问题上也持同样立场。哈维注重从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体制的转变去寻找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考察,哈维发现 20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福特主义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为了规避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僵化和刻板性,一种更加弹性和灵活的积累模式产生了。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伴随着这种灵活流动,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周转速度不断加快,使人们感受到时间的压缩;另外,商品、劳动力和服务通过空间而实现的迅速流动使空间障碍几近消失,使人们产生了“空间压缩”之感。“时空压缩”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阶级、文化和日常生活,造成的后果是使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统治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使人们沉醉于追逐差异、个性、多元、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产品,而不再去追问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意义。

从地理学唯物主义出发,哈维揭示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无一不体现着资本积累的逻辑。哈维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时,这些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征兆。”<sup>①</sup>也就是说,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根本的积累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发生改变的只是资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 页。

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调解方式。由此,哈维得出了和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绝不新颖,它的最新观点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的掌握之中。”<sup>①</sup>我们可以说,哈维坚持以资本逻辑分析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尝试不仅开辟了空间这一全新论域,也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因此代表着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

## 二、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和制度实践以及西方左派运动等现实问题直接相关。不过,在面对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新社会运动<sup>②</sup>的兴起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这一政治背景时,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都产生了深深地质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前景丧失了信心,并要求重新进行政治规划。而以哈维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从未抛弃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目标,始终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去探寻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和全人类解放的实现道路。可以说,哈维对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坚持和发展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借用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权力中心主义等来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解构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解构,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当今多元主义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这样,后马克思主义就告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历史进步、生产力、阶级斗争、总体性等),得出了后工业社会中,大写的“解放运动”已经终结,阶级政治已经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0页。

② 新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以生态运动、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同性恋问题等新的反抗形式为代表的运动。

被文化革命和民主政治所取代的结论。为了适应这种时代变化和建立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后马克思主义提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基础进行清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又不仅仅只是解构,它仍然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规划的建构意图与努力。但是,从本质上说,哈维的解放政治学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是分道扬镳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如何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质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经济决定论主张经济是一个自我规范的机制,严格地按照内在的规律运行,而不受任何源于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干预,因此,经济是政治的本质,政治必须由经济来解释,政治的结果必须还原为经济的原因。后马克思主义拒斥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空间完全可以自我独立,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统治的整个结构与生产和剥削并没有本质联系。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哈维虽然也和后马克思主义一样看到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弊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在坚持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的新变化。哈维冲破了后现代主义政治的重重迷障,深入到政治话语背后发现了金钱、货币、商品仍然主导着当前的政治生活,资本积累规律依然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政治权力深陷于资本逻辑之中。因此,哈维的解放政治学不仅不否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相反,所要实现的是变革生产关系,既要消灭不正义的政治制度,又要摧毁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经济制度。他要求实现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需直接挑战在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循环和积累,不管是解放身体,还是重建地方,亦或是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前提条件都是要求从资本积累的逻辑中解放出来。

第二,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有效性是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阶级关系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趋向简单化。相反,现实的情况是工人阶级数量在不断地减少,

并不断地被分化、边缘化,同时,各种新阶层新集团不断涌现,其立场复杂而多样。因此,单纯用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很难解释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因此,他们主张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把政治斗争看成阶级斗争,斗争的主体是单一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否定了斗争形式的多样性,把斗争的多元性还原为阶级斗争。基于此,后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两个层次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一是批判和驳斥阶级还原论,二是废黜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就前一方面而言,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一种阶级还原论,是马克思本质主义的最后阵地。”<sup>①</sup>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阶级还原论”,就是把政治关系归结为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把政治矛盾和斗争都还原为经济矛盾和斗争。对“阶级还原论”的解构就是割裂经济范畴,特别是剥削关系与统治关系之间的本质联系,认为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中反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剥削的斗争对于在其他领域内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政治运动并不必然以物质利益为基础。

就后一方面而言,对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否定是反阶级中心论的必然逻辑结论。后马克思主义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丧失的。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工作场所日益分散化,分工日益精细化以及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趋衰落。无产阶级面对的已不是“阶级意识”的匮乏和缺失的问题,而是作为一种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因而,工人即使存在,但作为普遍主体的大写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在场了。其次,工人阶级无法统一起来。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建立在工人共同的物质利益和阶级立场上,由于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前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解构了,那么工人阶级的统一性自然就失去了其理论基础。从现实情况来

<sup>①</sup>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1, p.76.

看,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工人同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员而断言他们一定会具有相同的阶级立场。从工人阶级内部来看,不同的技术等级使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再比如,生产因素之外的一些社会特征,如人种、性别、民族、宗教、生态立场、文化等也会影响工人阶级统一性的形成。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资产阶级也会根据工人群体的不同抵抗能力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分化、瓦解工人。因此,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今天工人阶级的统一已成为一种虚构和幻想,“我们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积累规律所描述的那种机制上去。”<sup>①</sup>最后,工人阶级并非是世界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基于工人的经济利益,马克思将工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工人阶级注定要去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恰恰是在这个地方,问题出现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被过度诠释了,工人未必有一个统一的“客观利益”,即便工人有所谓一致性的“客观利益”,这一“客观利益”也不能等同于“历史利益”。实际上,“客观利益”涉及的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观问题,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的,他们必然否定和抛弃“客观利益”概念。由于消解了“客观利益”蕴含的必然性,他们因此推导出,工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主义追求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工人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代理人。“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这就是说,基于种种社会运动的自治性的多元主义乃是政治的准则。”<sup>②</sup>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主体是多元的,具有多样性的差异,是不断变化和建构的,工人、妇女、生态主义者等都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应该说,后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提出的质疑并不是信口开河,毫无依据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关注和认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由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过程缩短,大量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而风险社会的到来更是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和

①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82.

②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32.



社会身份的变动性,从而拉大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新社会运动由于不具有明显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恰好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建构新政治主体的情境。这一切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失效,当代政治对抗运动已不再围绕阶级来组织和开展。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哈维也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进行了重新反思与考量。与后马克思主义只关注阶级斗争和政治领域所发生的表面变化不同的是,哈维真正关心的是何以发生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真正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哈维通过将空间(地理)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使他找到了政治斗争多元化、阶级主体碎片化的原因,那就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由于资本在全球空间内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在全球规模上高度流动,造成的后果是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和分裂资产阶级在地理上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正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地理重组使得当前的阶级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要复杂困难得多。可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深刻改变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积累全球化策略的必然结果。当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形式究其实质来说,仍然是为争取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而斗争,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比如,环境保护运动表面上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环境困境的产生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秩序所造成的恶果。正如哈维所说:“我们环境困难的产生是这种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是依附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的结果。”<sup>①</sup>再比如,反全球化运动,哈维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资源、能源市场的剥夺和争夺。在进行“剥夺性积累”的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因此,在哈维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失去解释力,在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斗争中,虽然工人阶级的

①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状况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但工人阶级依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由于哈维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使他既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当后马克思主义者说“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阶级来解放全社会不再是理解或预期社会变革的模式”<sup>①</sup>时,哈维仍然坚信《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基本逻辑和指令是正确的。

第三,如何看待差异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是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区别。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会引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疑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政治,是用暴力彻底摧毁暴力统治的机器。在这种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遍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他们既不愿意与激进政治决绝,又要求以重构的形式将激进精神保留下来,即转换革命场域,改变革命方式。在革命场域的转换上,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政治斗争的关注点从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转移到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在革命方式的改变上,则放弃暴力革命和经济革命,诉诸于多元化的民主政治斗争和民主参与形式。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是以偶然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的。哈维也认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塑造成的最典型的后果就是差异和多样化。如何看待政治领域中差异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是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区别。后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总体性的政治规划,强调政治的碎片化;不承认有普遍性的政治话语,强调政治话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不承认存在普遍性的政治行动主体,强调普遍性的政治行动主体已经消失。”<sup>②</sup>总而言之,认为共同性、统一性是民主政治的障碍。而哈维始终坚持差异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既强调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在高度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在展开,所以应充分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上的斗争目

① [英]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② 付文忠:《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标,强调不同规模上围绕空间规划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从而把社会主义事业从乏味的同质性中解放出来。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在差异中确定共同性,想方设法、不计成败地去集合各种高度分化的地方性运动,使它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在此,我们看到,多元和差异是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基础,而哈维的解放政治学虽然经常使用身份、差异、他性等后现代话语,但他始终是在具体的物质环境和政治方案中来探讨有关身份、多元文化主义、他性和差异的政治,并没有脱离资本和劳动这一核心,因而没有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走向后现代主义政治。

总的来看,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消解“阶级”来确立认同政治与身份政治,强调政治是由话语建构的,由于话语意义的多样性就造成了主体立场的多样性,这就为其激进、自由、多元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是用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用话语建构理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而言,哈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要义,固守解放政治的信念,坚持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和价值理想,认为只要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资本的逻辑就不会改变,并将全球化的条件下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哈维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是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左派反应,它强调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新形式的控制问题,在解放政治意义上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替代。因此,我们可以说,哈维的解放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规划则否定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和共谋的政治立场。

## 第二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論特質

当前,将空间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寻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已成为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論努力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典型代表。在这一理論建构中,哈维从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理解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批判揭露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努力实现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和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他既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又没有盲从后现代理论而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使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质。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把握生产方式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补充和发展,必然也是以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论核心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主要表现为物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产等),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工业时代的物的生产走向了后工业时代的空间的生产。这里并不是说具体的物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后者所取代,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生产形式。资本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殖民需求生产出特定空间,比如城市空间、世界交换体系和国际分工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和结果。资本主义凭借空间生产而不断超越自身界限,显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主导生产形式的转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没有空间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科学地理解和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所发生的新变化的。

最早意识到空间生产重要性的是列斐伏尔。他指出:“生产空间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sup>①</sup>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划倾向于空间的规划,正是这种空间进程,以及它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居于20世纪资本主义增长和生存的战略中心。按照列斐伏尔的认识,资本主义将空间纳入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轨道,不断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随着生产力的空间拓展和更多空间的商品化,资本主

<sup>①</sup>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义既能生产剩余价值,又可实现利润。哈维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来分析空间的生产是如何帮助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这在列斐伏尔那里尚没有具体展开。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需要,哈维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转变进行空间化阐释,他具体探讨了空间生产的产生过程,空间生产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并从历史地理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从而更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

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也就是说,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展开的。哈维首先肯定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揭示了资本运动的规律,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自我增值,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在哈维的视域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动因就是资本积累,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第一,资本为了在流通领域中实现增值和积累,就必须既扩大资本流通空间,又要缩短资本流通时间。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在这里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资本积累动力的推动下,运输和通讯业发展迅猛,既为资本积累生产了新的空间,同时它自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建立一定的空间结构,这就表现为固定与不可移动的运输设施(如公路、运河、港口与码头等)的生产。第二,资本家受利益驱使,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必然产生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危机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盈余,缺乏赢利机会。如何解决过度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哈维指出,固定资本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生产力、劳动力和资本,因而在不断吸收过度积累资本的推动力下,大量过剩资本投向固定资本项目,从而建造了公路、运河、港口、码头、住房、学校、公园等城市物质基础设施。城市空间的生产为过度积累资本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和机会。第三,随着空间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空间生产能力必然达到饱和,资本必然向外寻求新的空间,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全球性空间扩展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通过空间的使用而得以再生产。可见,空间生产既是资本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也是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正是通过空间的生产才使

资本主义历经危机而能幸存下来。我们认为,哈维对资本主义从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生产的原因分析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也就是说,哈维认识到了资本不仅把空间作为扩大积累的中介和手段,而且内在要求渗透并主导空间生产过程,以使生产出来的空间符合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增值的需要。所以说,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仍然是受资本运动规律所控制和支配,屈从于资本的逻辑。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就不可能消除。哈维从地理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空间构型之间的矛盾。

虽然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的持续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空间生产可以克服资本积累的空间障碍,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空间的开辟,既定的空间构型(固定资本)最终将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总是不断地摧毁旧的而建立起新的空间生产构型,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就呈现出不断地破坏和重建的面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性所造成的地理后果,哈维将其称为“不平衡地理发展”。不平衡发展的地理景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本积累和劳动者要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表现。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地理景观是按照资本增值需要而产生的,是作为生产的固定资本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劳动者的消费手段和他们自身再生产的手段。资本主义对这些空间的不断摧毁和重建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和劳动者生存之间的冲突。可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无法解决的空间矛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哈维通过空间地理学视角的引入,深刻说明了资本主义完成自身积累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他坚持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来理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坚持从资本关系来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因此,哈维不是用空间生产的直接理论成果来替代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主张将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中以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直接表现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要求用地理学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他所说的地理或者地理学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我们知道,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科学,在地理学中,空间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建筑环境的建设和组合,这种建设和组合也是物质环境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体现,如工厂、道路系统、市区等;第二,空间单元中社会组织的组合,如社区、城市、地区、国家、世界等。<sup>①</sup>城市内涵着空间的两层含义,既是建筑环境的载体,又是空间单元中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在哈维那里,地理空间概念就是和城市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哈维表示:“我所有地理方面的兴趣一直以欧洲为中心,且集中在都市。”<sup>②</sup>哈维理解的地理是城市性的,是以城市空间为研究背景和基本指向的。所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所实现的空间转向是转向城市空间,转向重视城市社会,城市是其空间思考的起点。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分配、社会流动和整合的主要进程都发生在城市中,城市是最为典型的空生产形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空间特征,揭示现代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联系对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哈维之前,法国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尔斯就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列斐伏尔城市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城市不仅仅是物质建筑环境,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的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城市中心区由于其功能的变化迫使居民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这就妨碍了日常生活关系的有效再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将资本主义关系形式强加给整个日常生活,造成了地理空间组织的类同(如人们的非工作生活空间与工作生活空间被一样商业化)、生活地点的分离(如工作地点和住宅地点分离)等。因此,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扩展和调整中,日益充满私人利

① 参见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5页。

② 吴敏:《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



润和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统治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列斐伏尔认为,围绕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是资本利益与社会需要之间冲突的焦点,所形成的城市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危机。

卡斯特尔斯吸收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试图建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与进程。卡斯特尔斯并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是将阿尔都塞关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应用于城市问题研究。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一种社会结构由三个相关要素或系统组成,即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城市社会结构就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组合和产生的社会实践所组成,城市空间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表达形式。不过卡斯特尔斯指出,只有对这三种系统进行更加具体的说明,才能更好地理解城市问题。因此他将城市系统分解为五个要素:生产、消费、交换、行政和符号。<sup>①</sup>在这五个要素中,卡斯特尔斯最为关注消费问题,他认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迅速发展,集体消费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所谓“集体消费”,主要是指国家用于教育、文化、社会福利、交通、住房和城市化等方面的支出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人口围绕服务设施中心的集中,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城市便成为集体消费的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组织形式。在卡斯特尔斯看来,如何实现集体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形态的基本动因之一,城市内部的各种空间形态正是居民日常消费集体行为趋向的结果。卡斯特尔斯指出,当国家难以承担集体消费的巨大支出时,集体消费的不足就会导致城市社会运动,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就能够带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

哈维深受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尔斯城市空间理论的启发,但与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理解城市空间的意义和卡斯特尔斯从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认识城市的作用不同,哈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从资本积累来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成及功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sup>①</sup> See Castells, Manuel,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 MIT Press, p.238.

资本积累是资本利润的形成过程,这种利润意味着用于积累更大的资本,再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积累是一个扩张过程,会带来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城市自然也会受到资本积累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对城市建筑环境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手段的论述并不多,因此,哈维提出城市空间研究就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城市意味着建立一种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意味着提供有利于资本生产的丰富劳动力和各种服务消费,现代城市空间规划是资本对空间生产过程统治的经典案例。哈维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揭示出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因果关系,而在于“发现资本如何涌入城市建筑环境的建设,怎样形成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内在矛盾”。<sup>①</sup>城市建筑环境作为固定资本的特征决定了它势必无法适应资本高效快速地实现积累的要求。资本积累目标下不断产生的交通技术革命,要求创造更有效率、更合理的空间结构,这意味着破坏所有既存的空间设施。因此,城市空间建造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生存和消费空间的剥夺必然会引发劳动者的反抗,导致围绕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使用而展开了各种阶级斗争。至此,哈维强调和突出了经济利益(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就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生产的,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综观列斐伏尔、卡斯特尔斯和哈维的城市理论,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他们都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将城市看做社会整体结构的产物,反映了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经济和其他力量之间相互矛盾冲突的过程。第二,他们的城市理论不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城市的批判,而且重视理论对政治实践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社会的重建。他们分析城市问题注重于从社会阶级和经济基础出发,将维护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作为社会改革或重建的指导原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内有学者将列斐伏尔、卡斯特尔斯和哈维三人称为“新马

<sup>①</sup> 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sup>①</sup>当然,他们三人的理论兴奋点和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列斐伏尔关注的是城市空间生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卡斯特尔斯强调马克思主义更重视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规律,提出理解城市必须研究“集体消费”;而哈维则认为理解城市空间的焦点不是集体消费,而是马克思最关心的基本问题——资本积累。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三人也不尽相同。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本质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充分反映了其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强调通过人的行动或斗争来改变使人异化、受压迫和奴役的社会条件。卡斯特尔斯则典型地采取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sup>②</sup>的研究方法,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哈维的理论分析同时受到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影响,一方面具有注重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结构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包含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总而言之,与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尔斯相比较而言,哈维对城市空间的分析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城市空间地理问题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体现出一种更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姿态。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空间进行剖析,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

### 三、与苏贾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异同的辨析

美国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同哈维一样也提出了创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苏贾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作一详细比较,以彰显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首先,我们来看两者的共同之处。

第一,出于相同的理论动机。哈维和苏贾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都是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的,只不过苏贾侧重于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而哈维则专注于弥补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不足。在

①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

②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主张认识人的本质属性只能通过认识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而实现。因此,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但更注重揭示决定不同生产方式运作的基本结构。

苏贾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法诠释新的社会状况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历史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参照唯一的历史维度来理解所有社会事件,因而是错误的。苏贾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并不是否认历史维度在理解和创造社会中的巨大价值,而是否认其将历史作为理解社会的唯一切入点。苏贾认为,“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生活和理论的历史语境化的过分强调,以至于淹没和边缘化了地理或者空间的想象。”<sup>①</sup>由于历史决定论长时间占据着社会理论的主导话语地位,导致的后果是时间的历史维度掩盖并贬损了空间的维度。因此,苏贾要求发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所追求的就是在时间的霸权下重新恢复空间的声音,让空间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独立维度。而在哈维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缺乏空间维度。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等空间问题尚没有凸显出来,因而他就不会对地理空间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给予充分关注。正是出于恢复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空间维度这一理论动机,哈维提出了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第二,具有相同的理论目的。虽然哈维和苏贾都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缺失空间维度而丧失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和批判能力,要求用地理学知识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目的并不是要抛弃和替代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为了挽救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角,释放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能力。也就是说,哈维和苏贾都坚信,只要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变,历史唯物主义就永远是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最科学、最有效地理论工具。

第三,空间生产是他们理论建构的共识。在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建构中,哈维和苏贾的路径、方法、内容等都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建构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承认和重视空间生产。由于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从更新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这一目的出发的,这就决定了空间生产在其理论建构中的中心地位。哈维通过探讨

<sup>①</sup> [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页。

资本积累过程中空间生产的产生机制、发挥的作用以及造成的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状况,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批判和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政治思考,从而完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苏贾也充分认识到了空间生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而且随着全球化和大规模的城市重建,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苏贾还特别关注空间生产所造成的新的空间剥削形式。如同资本主义的物的生产一样,空间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其生产的空间中得到充分体现。资本家通过各种空间控制行为(城市房租的榨取、地价的调节等)来剥削工人,这些在工人生活场所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远远大于在工作场所资本对劳动力的直接剥削。因此,苏贾说:“空间的生产,即剥削和统治的区域结构,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通过空间控制的再生产。”<sup>①</sup>

尽管哈维和苏贾的理论构建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同,但他们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哈维主要是从方法论意义上来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苏贾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主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哈维指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 and 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固定的理解实体。”<sup>②</sup>很显然,这种主义不是一种标签,不是现成的结论和封闭的体系,而是方法。这种方法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追求终极的、总体性的真理,而是保持开放的理论姿态,与资本主义动态的历史地理状况始终保持一致。在这一意义上,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而在苏贾那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呼吁对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

① [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0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41页。

一次彻底的改革。”<sup>①</sup>可见,苏贾并不仅仅只是要求方法论上的变革,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就是“空间—时间—社会三位一体的辩证法”。作为本体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必须在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三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阐释。

第二,在对空间的认识上,苏贾具有“空间化本体论”倾向,哈维则坚持空间是社会生产关系和过程的产物。苏贾反对把社会生产过程的空间性仅仅作为社会过程的产物,主张把空间性提升到本体论位置。他在突出生产概念中的空间维度的同时,牺牲了其更根本的历史性内涵,这导致了他实际地采纳了以空间来压抑时间的叙事逻辑。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满足于只是发展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空间理论,而是要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空间化。与此正好相反,哈维则牢牢地站在“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一原则上,始终坚持通过研究资本积累过程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从而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一种坚定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因此,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对社会过程的分析,这一社会过程就是资本积累过程,从资本积累过程出发哈维论证了资本主义空间景观的本质与矛盾。

### 第三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得失

##### (一)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城市化和空间化,如何突破与更新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局限性,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不仅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也需要空间维度的构建。在这方面,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无疑提供了一条推进马

<sup>①</sup> [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8—69页。

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的有益思路和启示。哈维通过开拓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研究的新阵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坚持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基于空间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哈维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向我们揭示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内在关系。他指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同物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样,都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产物,都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而且,空间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更为重要的新手段。哈维由此得出结论:虽然空间生产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仍然是受资本运动规律所控制和支配,屈从于资本的逻辑。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只研究物的生产,更要将对空间生产的分析纳入自己的理论中。可以说,哈维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基本方法,又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内容。

第二,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哈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将空间分析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这使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保持着一种现实的批判态度。哈维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把马克思批判理论从对工人工作场所的关注转向对生活场所的关注,将分析范围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从空间的视角来把握当下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动的现实,分析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几个典型特征:全球空间生产、后现代主义文化、城市问题、生态危机等,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和主题。我们知道,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哈维通过空间批判,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基本矛盾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只不过转化为空间矛盾,即空间生产的全球化与空间资源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第三,秉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趣旨,始终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他对



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压迫的揭示和批判目的就是为了探索和构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解放理想与现实制度。全球化时代,生态、性别、种族、阶级、国家等政治主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各种后现代主义话语、后结构主义话语开始对阶级政治进行攻击和消解。在这一政治氛围中,哈维始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其实质都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哈维在与后现代主义强势政治话语的对话和竞争中,开辟出了一条通往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

第四,坚持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哈维的理论著述中,他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来正确处理时间和空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使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没有因为强调地理维度而湮没历史维度,也没有因为对差异、多元的关注而忽视对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探求。在坚持马克思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哈维将其阐释为一种过程辩证法。在哈维看来,正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不是看做物,而是看做一种过程,看做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才使马克思解开了资本主义之谜。因此,哈维强调对过程和理解优先于对物、要素的理解,只有在过程中来理解要素、物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把握事件的实质。所以我们看到“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一方法论原则始终贯穿于哈维的理论建构中。

总之,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那就是: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弥补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角度的缺失。

## (二)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

虽然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的理论构建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有些具体观点也是值得探讨和商榷的。

第一,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理解比较简单。在哈维的理论研究中,“哈维去除了马克思的复杂的‘历史内容’”,<sup>①</sup>历史概念的所指

<sup>①</sup> Edited by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8.

往往比较简单,就是将历史直接等同于时间。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只具有时间的意义。历史和进步、发展这些概念有联系,更与生产方式的发展相关联。由于缺乏这种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哈维没有把空间问题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分析,只是把空间生产、城市问题以及空间政治等问题看做是当代问题,从而限制了哈维对空间问题反思的深度,也就无法指明当代全球化、城市化、空间化发展的历史出路。

第二,哈维的解放政治学说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困难。从理论上来说,哈维基于对当今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的组成结构、经济条件、政治状况、革命意识方面发生的诸种变化,提出将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组织起来实现彻底的社会解放,但由于这些权力表现为阶级、种族、生态等多种具体目标,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集合各种特殊利益是哈维无法克服的难题。由于很难对它们进行规定,所以与其他重要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哈维也只有倾向于以乌托邦理想来描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给其理论抹上了空想主义的色彩。落实到实践中,尽管哈维视野中的乌托邦不是一种绝对的固定时空构造,而是一种具有现实依据的动态过程,但它并不能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直接产生结果,这仍然是一种理论姿态。虽然哈维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他所强调的人的普遍权利、知识的统一性、“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都是以觉悟和知识而不是以阶级立场来唤起革命的动力。同时,他认为只要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准备去创造并维持一个完善的社会渴望时,辩证乌托邦就能实现,这不免带有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嫌疑。其实哈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地拿来就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案,而只是提出了建构替代性方案的一些理念,哈维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里仅仅是一些对话性观点而不是答案。”<sup>①</sup>

## 二、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现代性在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

<sup>①</sup>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长和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和诸多社会问题。面对生态危机、环境问题、城市冲突、人的生存和价值等等问题,西方理论家纷纷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则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现代性进行彻底否定和消解。在这其中,哈维无疑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对全球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生产的反思和批判是现代性研究空间转向的一条重要理论路径。随着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展现及对其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现代性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现代城市的规划与构建,城市化的大规模迅速发展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sup>①</sup>城市在聚集人、财、物的同时,也聚集了问题,比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文化冲突等,所以说现代性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在城市这个空间中得到集中反映。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何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课题。在这方面,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第一,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为认识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矛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空间问题和空间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城市发展的区域空间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大城市、沿海发达城市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内地许多中小城市发展却相对缓慢甚至是滞后,不少老工业城市还出现了城市衰败景象。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围绕城市空间生产和使用的空间矛盾愈益激化。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进行,房地产业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房地产商与城市居民围绕着城市规划的改变、环境污染、城市拆迁以及争取社区公共资源的矛盾与斗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造成这种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已经给我们提供

<sup>①</sup> 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了很好的理论视角,那就是资本力量作用的结果。就前一方面而言,相比较内地广大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自然成为国内外资本青睐的目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城市圈的出现和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国内外资本共同作用的产物。”<sup>①</sup>就后一空间矛盾来说,我国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府,更多地来自于房地产商的资本投资,资本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以及城市环境的建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空间资源的商品化、资本化日益影响和制约着作为城市空间消费者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按照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观点,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家占有空间以获取利润的要求与劳动者消费空间以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城市建筑环境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和变迁中出现的空间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第二,哈维关于城市正义问题的思考给我们实现城市空间正义以有益的启发。当前中国城市化建设中,城市发展虽然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城市发展的成果却没有惠及到所有居民,公民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了城市阶层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因此,积极化解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的矛盾,合理解决城市空间正义缺失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哈维在把空间和地理学原则应用到城市和区域规划中也是始终贯彻社会正义原则,要求在城市空间生产和城市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实现公民空间权益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哈维主张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体现正义原则,他曾经针对社会空间正义提出过6项主张:“减少劳动力剥削、解放受压抑人群、赋予弱势群体权力、消除霸权主义、合理的社会控制、削减社会工程的负面影响。”<sup>②</sup>这对于我们优化空间生产和分配机制,协调好空间资源关系上的矛盾,促进社会各阶层共享空间资源都具有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

① 张应祥、蔡禾:《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2(16), p.588.

第三,哈维的全球化理论对于我国如何在全球空间生产中谋求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当前中国的城市建设是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的,全球化使我国的空间生产处于全球空间生产体系之中。根据哈维的全球化理论,资本主义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将过剩资本输出到非资本主义领域以开拓资本积累的新空间,这就是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策略,将全球生产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在全球空间生产中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资源、劳动力等;另一方面,不断将工业产业、制造业等大量地转移到落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承接了这一转移后,其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表现为大片的城镇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要在全球空间中谋求自身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强调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现代产业结构,努力改变在全球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的劣势地位。

总之,哈维对现代性的空间反思和批判对中国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借鉴意义。对资本在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正反两方面效应我们要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要承认没有资本的空间化,历史就不能进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就无法完成;又不能一味地肯定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认识到资本的空间化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暂时的产物,我们对空间生产的批判应指向无限的未来。

## 结 语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较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距离,这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结论产生了质疑。因此,从理论上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回答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道路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理论流派的共同理论诉求。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哈维,其理论探索始终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注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哈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后工业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哈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反对传统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位,重新阐释其实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含义的不同理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根本区别。第二国际理论家采取科学实证论的解释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不可动摇的结论和教条。而卢卡奇主张由“回到辩证法”入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第二国际理论家取消了辩证法,就等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和本质,也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批判价值向度。正是在重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阐释为“总体性辩证法”，它具体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总体性”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性，总体优于部分，部分只有在与总体的联系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在运用总体性辩证法理解社会生活时，“只有在把社会生活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sup>①</sup>这也就是说，只有把事实看做是整体社会发展的历史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认识和理解，才可能再现和把握现实。第二，总体性辩证法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由于马克思用“实践”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使自然客体变成了历史客体，单个主体变成了阶级主体。因此，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一种主体实践论哲学，突出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有效反对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式的解读模式，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

与卢卡奇一样，科尔施也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实证科学出发，强调总体性方法的重要意义。他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由于抛弃了辩证法，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总体，而是错误地将它看做是由分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理论。由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理解社会历史时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无法科学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科尔施认为，为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是包括经济批判、哲学批判和意识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以总体性的观点来观照社会历史。

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恢复和发展，其目的在于应对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而在寻找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危机的根源时，哈维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将其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化解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失去了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效力。因此，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从

<sup>①</sup>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页。



理论渊源上来看,哈维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质的理解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卢卡奇,但他与卢卡奇一样试图用“总体性”来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以重新恢复其具体的总体的视野。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哈维对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的理解角度又与卢卡奇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各自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理论旨趣所决定的。作为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卢卡奇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是寻找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探索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通过对西欧社会和俄国的比较分析,卢卡奇认为,能否把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世界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是能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而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的教条化解释完全忽视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卢卡奇将总体性辩证法理解为主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以此强调无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革命意识和主体地位。

哈维所处的全球化和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关系,空间生产成为资产阶级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维护其统治的新的形式和手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恢复并发展空间维度,才能批判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本质,将人从空间物化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长期以来流行的历史目的论湮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历史目的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而演进的,将“历史”错误地理解成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朝向既定目标的过程,而不是理解为活生生的、现实的发展过程,理解为由无数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具体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现实所构成的过程,因而也就不会深入到当下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物化现实。由于历史目的论不懂得辩证法,只强调抽象的客观规律,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将历史唯物主义当做结论而不是方法,因此无法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所提出的挑战,从而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质疑与动摇。出于批判历史目的论和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价值功能的理论需要,哈维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辩证法,并将辩证法的实质阐释为一种过程辩证法,强调在生成事物的具体过程中来理解事物之间的辩证联系,力图从“过程”角度强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体性思想的优越性。由于

哈维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过程辩证法,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流于抽象空洞的批判,而能够深入到当代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具体过程中,分析批判产生于这一过程中的物质空间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哈维强调,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僵化的结论才能解释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之间会出现矛盾和不一致,从而真正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总之,哈维既继承了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总体性辩证法的传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不在于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论,而在于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方法。同时又针对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的社会现实将空间要素引入了辩证法,从而丰富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涵,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向度。

其次,立足于西方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价值立场,探寻适合西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马克思就始终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工具。为实现西方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意识形态诉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强调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到追求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转变,而到了哈维那里,则既追求实现无产阶级总体解放的目标,又充分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个体解放。这种理论旨趣的变化是由理论家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西方工人阶级政党按照俄国革命模式和理论模式所领导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失败,因此,探寻一条适合西方无产阶级走向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是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思,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危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下,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文化秩序以及道德价值观念,这就使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主体意识;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所作出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忽视了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缺乏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发展对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为加强

对工人阶级的主观革命意识的培养,卢卡奇要求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虚幻性,形成成熟统一的“阶级意识”,葛兰西则提出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主张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在革命战略上,他们一般主张在西方工人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

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阿尔都塞同样较为关注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他认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关键是在于能否用科学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工人运动。因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阿尔都塞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解释,又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工具化,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经济因素具有归根结底决定作用基础上的“多元决定论”。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使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奠定文化心理基础。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阿尔都塞对西方社会革命道路的探索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发生了转折。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但也不赞同社会主义,力求探索“第三条道路”。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不再专注于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是探讨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转变同样也应该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寻找。法兰克福学派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科学技术理性的盛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制造和倡导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制造了大量“虚假需求”,控制和支配了个人的需要,使整个社会朝着总体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发展。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使人沉醉于商品消费中,成为无自主需求的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为拯救和捍卫个体的自由、价值和尊严,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展开了批判,力图使个体从异化的生存状态中摆脱出来。在革命方略上,马尔库塞提倡“艺术审美救世主义”,弗洛姆提出了“爱的教育”,以此唤醒个体对自由和解放追求的愿望。在革命主体问题上,他们认为,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所同化,丧失了革命主体地位,由此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说,“他们的革命不是以西方共产党、工人党为领导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而是一种追求个

人个性自由解放的无组织的个人造反运动。”<sup>①</sup>

处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哈维,其理论旨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同样将实现西方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的理论所追求的目标。从理论底蕴上来说,哈维的解放政治理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一致的,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寻求无产阶级的总体解放。当然,由于哈维所处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致使哈维在探索无产阶级总体解放道路上既继承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路径,同时又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工人阶级不仅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袭,政治意识日益淡化。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消解进一步阻碍了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面对西方社会阶级政治呈现退化的趋势,哈维认为,要唤醒工人阶级内心深处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不仅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资本的逻辑中,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包含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指明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哈维指出,当前资本通过全球空间生产既拓展了资本追逐利润的空间,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使全世界工人阶级都深陷资本逻辑中,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只有揭露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本质和内在矛盾,才能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统一起来以打碎资本统治的链条,将自身从资本积累的逻辑中解放出来。

在强调无产阶级总体解放的理论诉求的同时,哈维也对基于各种特殊利益和目的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给予了肯定与重视。哈维认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塑造成的最典型的后果就是差异和多元化。这种差异不仅仅来自于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生态、政治、社会及文化的高度多样化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源自于资本

<sup>①</sup> 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粉碎、分割及制造差异的能力。不同的空间规模,不同的利益需求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虽然并不是以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进行划分的,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所为之斗争的各种社会问题(如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生态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等)从根源上来看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虽然这些社会斗争和运动的目标不是为了寻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但却同样是反资本主义的。因此,要实现当代西方无产阶级的解放,就不能限于单一、抽象的社会主义目标和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而应该在尊重不同空间规模,不同社会集团的具体斗争目标的前提下,致力于把各种目标相异和特殊利益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对抗资产阶级对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分裂和瓦解,从而壮大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总之,哈维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始终将探索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作为自己的理论归宿,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持有相同的价值立场。同时他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方法来认识和把握无产阶级的总体解放与个体解放之间的关系,从分散的、多元化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中找到了共同性,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因此,哈维认为,虽然将个人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不一定是亲社会主义的,但如果能将其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广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这对于实现无产阶级的总体解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哈维,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还是从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空间批判,都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位,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在他们看来,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本质,对不断变化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展开批判,才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也才可能探寻到一条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是以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这一最新的发展形态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空间分析和空间批判,从而为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角。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应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需要我们永远探讨下去的课题。

## 附录一 大卫·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概况

作为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受到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对他的研究涉及时空研究、城市研究、环境研究、文化研究、全球化和霸权、后现代主义研究和社会正义等内容。其中主要有三部代表性著作:John L. Paterson, *David Harvey's Geography*, Totom, New Jersey, 1984. John Paul, III Jones, *David Harvey: Live Theory*, Continuum, 2006.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第一本专著《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主要是对哈维早期思想的考察。通过分析 1961—1981 年间哈维地理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认为他的思想经历了从传统地理学到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并探讨了哲学、方法论和地理学之间的关系。第二本专著《大卫·哈维:活的理论》是一本简介性读物,主要是介绍了哈维的一些著作、重要论文及访谈,并对哈维的核心思想作出了大致的概括和勾画。应当说,国外研究资料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参考的当属第三本专著《大卫·哈维:批判性读物》。在这本书中,共收录了 13 篇英美左派学者研究哈维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涉及地理学、城市主义的本质、全球化与资本积累、时空辩证法、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个主题。综合来看,这些批判性论文主要集中于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哈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诺埃尔·卡斯特瑞(Noel Castree)认为哈维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主要的阵营:正统的、分析的和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哈维是第一阵营

的杰出代表,他的著作以对马克思的惊人的忠诚程度而著称。”<sup>①</sup>而亚历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由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而认为在哈维的著作中很少有正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沿用安德森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安德森把“正统马克思主义”归纳为三个特征:在学术界之外,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植根于工人阶级组织的革命战略。因此,他认为,英美国家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都是学院派,局限于学术界内,哈维也不例外。哈维虽然花费了极大的精力研究《资本论》,专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却对马克思后期著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忽略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实践探索。但柯林尼可斯也承认哈维坚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研究传统,并从新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进行了阐释。就哈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讲,他认为,哈维的理论可归纳为四个特点:第一,哈维的马克思主义是直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著作《资本论》基础上的,其理论成果就是《资本的界限》。第二,哈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维度,要求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第三,哈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既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第四,哈维比较关注政治活动。一方面,他以城市和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提炼出政治理论;另一方面,他比较关注社会运动、社会公正和正义及其表达。这些都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关,但又有所区别。<sup>②</sup>

第二,对于哈维思想转变历程的研究。德里克·格雷格里(Derek Gregory)着重从哈维理论思考对象的转化来考察哈维思想发展的进程。<sup>③</sup>他认为,虽然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和哈维思想的成熟,其理论主题涵盖了多个理论论域(地理学、城市、资本积累、后现代主义、新帝国主义等),但空间转型问题始终是贯穿哈维所有文本的一根主线。因此,哈维的思想发展具有连贯性与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始终关注“空间结构与过程之间的联系”。埃里克·舍帕德(Eric Sheppard)同样认为,虽然哈维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由此区分了“青年哈维”和“成熟哈维”,但

①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4 Issue 4, 2006, p.50.

② See David Harvey and Marxism, Alex Callinicos, University of York, UK.

③ See Troubling Geographies, Derek Grego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哈维的思想主旨从未发生过改变,那就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思考。<sup>①</sup> 特雷弗·巴恩斯(Trevor Barnes)在其文章(“Between Deduction and Dialectics: David Harvey on Knowledge”, Trevor Barn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则集中探讨了哈维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的转变。他借用阿尔都塞的概念,认为从《地理学中的解释》到《社会正义与城市》有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哈维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逻辑实证主义来解决地理学内部的科学方法争论。而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哈维开始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分析城市问题,从“逻辑演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这种断裂也不是绝对的,哈维并没有抛弃实证主义的方法,只是说这种转向代表着哈维在元理论层面上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入了地理学研究。

第三,对哈维空间理论特质的研究及评价。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论文(“Spatial Fires, Temporal Fires, and Spatial-Temporal Fires”,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有两点值得我们参考:一是总结分析了哈维在空间问题上的贡献。他认为,哈维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性的重要性而著名,其核心思想可以用“空间修复”这个词来表达。在此基础上,哈维充分阐述了空间、时间、时空与资本主义发展、地区结构和国家规模之间的关系,得出了资本积累具有时空性的结论,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二是他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上评论了哈维对空间问题的研究。鲍勃·杰索普着重评价了哈维的空间的方法论。他认为,虽然哈维的方法有点像实在论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但是,当哈维力图揭示资本外在经济表象下的资本内在关系时,他实际上更趋向于一种更为宏大的内在关系的本体论。埃里克·舍帕德(Eric Sheppard)则总结了哈维空间问题研究中的四个主题:第一,空间是被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第二,同大多数人文科学的空间理论家不同,哈维总是把空间与时间放在一起研究;第三,在空间研究中强调经验与文化因素;第四,始终以西方哲学来标定自己的哲学主张。

## 二、国内研究概况

最早将哈维思想引入我国的是蔡运龙。他于1990年翻译了哈维在

<sup>①</sup> See David Harvey and Dialectical Space-time, Eric Sheppard, University of Nimesota.

1984年写的一篇文章《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宣言》，发表在《地理译报》1990年第3期上。接着，他在《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评〈地理学中的解释〉》（《地理研究》1990年第9卷第3期）一文中详细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sup>①</sup>其后，顾朝林、刘海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地理科学》19卷第3期，1999年第6期）一文中介绍了哈维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政治经济学分析与空间理论。可见，最初哈维主要是作为地理学家的身份为我国学术界所认识的。哈维在地理学研究中非常注重从城市经验分析入手，这一理论趣旨被我国城市社会学界所关注。围绕着哈维论及的城市化进程、都市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等主题，社会学学者展开了探讨，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与论文。<sup>②</sup>

应该说，2003年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哈维学术思想中核心内容的研究还未真正涉及，仅仅局限于地理学与社会学领域，把哈维的思想看做是这些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随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影响的扩大，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逐渐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哈维的《后现代状况》一书在2003年被翻译为中文后，哈维才逐渐开始以“空间问题”的学术形象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并与列斐伏尔、苏贾并称为“城市空间理论三剑客”。随着哈维一系列重要论著中文版的面世，人们得以对哈维的学术路径、理论逻辑和思想主旨有了一个较为清晰准确的把握。<sup>③</sup>我

- 
- ① David Harvey,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St Martin's Press, 1969, 中译本为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②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4 期; 蔡禾:《都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之比较——人类生态学与都市社会学》, 《学术论坛》2003 年第 3 期; 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 ③ 在中国学术界翻译为中文的哈维的著作有:《希望的空间》, 胡大平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沈小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胡大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新自由主义简史》, 王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资本之谜》, 陈静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学者也对哈维表现出了较大的学术热情, 先后出版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 王志弘译, 台湾群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议》, 王志弘、王玥民译, 台湾群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国学术界对哈维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系统研究。主要有：在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下卷）中专章探讨了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其中着重分析了哈维在空间问题上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阐释了其以不平衡发展地理学为立足点，建立辩证时空乌托邦的理论规划，评价了哈维从空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胡大平在《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中就哈维的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的介绍和系统分析。第一部分，以哈维文献为线索总体上描述了哈维思想发展的历程，梳理了哈维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重要论见。这种系统梳理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也为国内对哈维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部分，将哈维定位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探讨了哈维如何从地理空间视角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审视了哈维独特的社会理论，突出强调了其资本主义批判对当下的政治意义。此外，尤作欣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资本的界限》为主要文本依据，以空间、资本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三个主题为线索揭示了哈维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sup>①</sup>；李秀玲的博士论文则主要是以马克思理论中的空间思想为基础，力图全面系统地阐述并评析哈维的空间思想。<sup>②</sup>

第二，专题性研究，即围绕哈维空间理论的某一领域或方面展开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空间生产理论的考察。李春敏重点考察了哈维对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强调资本的空间生产对全球社会空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sup>③</sup> 庄友刚指出，哈维空间生产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揭示了资本关系与空间生产的密切联系，使得对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指向了对资本关系的批判。<sup>④</sup> 李秀玲则对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和危机进行了具体

① 参见尤作欣：《空间、资本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大卫哈维空间批判理论文本学解读》，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 参见李秀玲：《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大卫·哈维空间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③ 参见李春敏：《资本积累的全球化与空间的生产》，《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

④ 参见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阐释。<sup>①</sup>

(2)对后现代时空理论的阐发。学者们集中对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进行了阐释,指出哈维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转变入手揭示出时空的转变以及人们体验时空方式的改变,这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和流行。<sup>②</sup>董慧则从“作为一种文化转移的后现代、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空间化转变的后现代、作为新一轮时空压缩的后现代和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的后现代”四个方面对哈维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了考察与总结。<sup>③</sup>可以说,学者们关于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贡献基本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个基本结论:哈维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去寻找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基础,从“时空压缩”的独特角度来揭示人们体验时空方式的改变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开辟了一条批判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道路。

(3)对新帝国主义论的研究。段忠桥高度评价了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其代表了当前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通过阐释“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空间定位与霸权”和“剥夺性积累”几个关键概念梳理了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sup>④</sup>田世锭侧重于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其特色就在于用处在辩证关系之中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来解释新帝国主义的实践,剥夺性积累则是当前这种新帝国主义实践的典型特征。<sup>⑤</sup>李秀玲则强调哈维新

① 参见李秀玲、秦龙:《“空间生产”思想:从马克思经列斐伏尔到哈维》,《福建论坛》2011年第5期。

② 参见阎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兼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黄少华:《哈维论后现代社会的时空转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3期;冯建辉:《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浅析》,《唯实》2010年第7期;崔丽华:《时空之间——哈维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索》,《燕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③ 参见董慧:《何种后现代——大卫·哈维对后现代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与建构》,《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董慧:《现代空间维度的后现代想象——大卫·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探究》,《哲学动态》2009年第8期。

④ 参见段忠桥:《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⑤ 参见田世锭:《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探析》,《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

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以剥夺性积累为主要方式而进行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掠夺是一种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方式,而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占领的方式。<sup>①</sup>

(4)对辩证时空乌托邦理想的评析。唐旭昌认为,哈维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建立时空统一的辩证乌托邦,并将其作为新的社会替代方案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超越了以往乌托邦的局限,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哈维用“社区实践”作为社会替代方案的核心时却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因此他的社会替代方案是不现实的。<sup>②</sup> 仰海峰则具体探讨了哈维是如何论述辩证乌托邦思想实现的问题。他认为,哈维的辩证乌托邦强调的是一种总体性的替代观念,这种观念是从社会结构与人类行为技术的关系中产生的。人类行为技术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构型,因此替代是否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总体上重组人类行为技术的要素。<sup>③</sup> 张小红认为,哈维辩证乌托邦思想的特点在于以城市实践为根基,注重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地理空间的差异性,试图建构出整合空间批判和展望未来的理想社会。<sup>④</sup>

第三,拓展研究。汪民安、强乃社等将哈维与其他空间理论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汪民安认为,哈维与福柯式的空间微观政治学不一样的,他和列斐伏尔同样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对空间和时间的改造联系起来。<sup>⑤</sup> 强乃社对空间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对“空间”含义的不同理解进行了梳理: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在卡斯特尔那里,空间是社会诸多因素构成的;在哈维那里,空间变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而在苏贾那里,强调的是从时代精神到空间精神。<sup>⑥</sup> 刘怀玉、陈硕等则重点考察了哈维空间批判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中的地位及意义。

- 
- ① 参见李秀玲:《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思想》,《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 ② 参见唐旭昌:《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
  - ③ 参见仰海峰:《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从马克思到哈维》,《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 ④ 参见张小红:《全球化·身体·辩证的乌托邦——大卫·哈维乌托邦思想初探》,《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 ⑤ 参见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 ⑥ 参见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刘怀玉高度肯定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开创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不仅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反而弥补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角度的缺失。<sup>①</sup> 陈硕指出,哈维从元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两个层面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理论潜能,对于我们恢复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价值功能以诸多启示。<sup>②</sup>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见解

通过考察国内外学者对哈维思想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到:虽然国内对哈维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译介阶段,相比较数量而言,译著较多,专著几乎没有,但对哈维思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学者们通过对哈维空间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介绍和评论,对哈维的身份定位和理论主旨基本形成了共识:哈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致力于从空间视角将地理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相关研究与国外关于哈维思想的讨论对哈维思想中的主题几乎都已经展开了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哈维的某一文本中所论述的问题的单一性研究,总体性把握和宏观审视不够,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意义。国内外对于哈维空间理论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和深入地探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对其空间理论思想的集中概括与表述,而国内学者很少将其作为专题来研究。虽然尤作欣在其博士论文中重点探讨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但他只是在对哈维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将其看做一种方法论,而没有使之上升到元理论的层次,因而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笔者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哈维进行空间研究的方法论,更是其理论基础。可以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框架

① 参见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 参见陈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历史与可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统摄了哈维全部研究的内容和主题。第二,哈维的过程辩证法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哈维在空间问题上之所以能认识到“空间”所内涵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关键就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为过程辩证法,以“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这一方法论为指导来展开空间分析和空间批判,从而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没有像其他空间理论家那样最终走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歧途。因此,笔者认为,过程辩证法是理解哈维空间理论特质的关键切入点,应该成为哈维思想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第三,对空间理论之间的横向比较研究比较薄弱。虽然国内学者在一些论文中对这方面有所关注和涉及,但并没有将哈维与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和苏贾等学者在空间理论上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详细深入地比较研究。第四,缺少对哈维空间政治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比较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主张消解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强调差异、多元的民主政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哈维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虽然哈维以包容性心态接受了后现代政治的流行话语,也强调差异、多元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但他始终是在具体的物质环境和政治方案中来探讨政治,并没有脱离资本和劳动这一核心。因此,将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十分有必要的。

本书正是立足于解决上述问题,力图考察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起因、方法和路径,从而达到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全貌及实质的准确把握,并通过和其他空间理论学者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揭示哈维空间理论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定位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在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位置,并结合中国当代现代化建设,发掘其理论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借鉴意义。



## 附录二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 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特征

晚期马克思主义兴起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最新流派之一,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起步较晚,对它的研究也还未达成共识,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缺乏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特征进行探讨,以深化我国学术界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一、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

国外学术界较早明确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术语的是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阿多诺或辩证法的坚持》一书中,詹姆逊在探讨阿多诺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将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看做是“我们当今需要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所称之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即后现代时期、或曼德尔所称的信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最初被视为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引入晚期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是张一兵教授,按照他的判断,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大致呈现出“后现代马克思主

<sup>①</sup> [美]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态势。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如果以此为界定标准,詹姆逊、德里克、哈维、凯尔纳、伊格尔顿、奈格里和哈特等人可以看做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由于对多元立场的强调,“晚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而只是对理论旨趣或立场、观点相近的一类学者的指认。因此目前给出一个关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和完整的定义域,揭示其理论的共性还较为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划定若干标准把晚期马克思主义同其他西方左派激进话语区别开来,从而规定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论域。具体说:第一,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公开声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与已经公开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开来。第二,相较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新激进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逻辑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使他们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凸显的诸种问题时更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及根源。譬如在探讨生态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而生态中心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则把造成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为技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未能触及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三,与后现代激进政治将后现代思潮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截然相反,晚期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持坚决的批判立场,反对后现代政治对阶级政治的抛弃,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宏大政治信念。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描绘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即晚期马克思主义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去分析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它从分析资本积累和生产方式入手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诸种新问题和变化产生的根源,揭示出后现代主义内在的资本逻辑,从而得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资本仍然是唯一的逻辑”的结论。因此,它强调马克思主

<sup>①</sup> 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固守解放政治信念,主张联合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实现人类总体解放。

## 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确定了其研究对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确定其问题域,确定其基本论域和理论问题。笔者认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 1. 全球化探讨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扩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探讨全球化的产生动因、全球化的内含、本质成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容。詹姆逊、德里克、哈维、凯尔纳、奈格里和哈特等人分别从文化、历史、地理、技术、政治角度展开对全球化的研究。詹姆逊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是在其对后现代研究的基础上而生发出来的。后现代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和差异,全球化过程中文化正是体现出多样性、多元性的特点。伴随着通讯网络遍布全球,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得以相互交流、包容、共存,然而在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表象背后,我们面对的却是更严重的同一性。“现在首要的是愈加强烈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迄今自治的民族市场和生产地带向单一地区的迅速同化,民族性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的消失,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不得不统一而成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张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在此,开始激发我们的全球化思考的是在规模上新的无与伦比的一幅标准化图画,一幅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统一的图画。”<sup>①</sup>为什么全球化中文化呈现出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巨大反差呢?詹姆逊指出,后现代虽然高扬多元和差异,但由于后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后现代性不仅没有颠覆资本逻辑,而且更进一步使文化和经济彼此渗透,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消费文化。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纳入统一的市场之中,以统一的生产模式与标准生产出消费意识形态和产品,在全球拓展资本的力量,不仅在经济上剥削落后国家和

<sup>①</sup> 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民族,而且破坏了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输出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使全球趋于资本的同一性。因此,可以看到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同一性。詹姆逊虽然是从文化层面去考察全球化,但他追的是文化背后的经济动因,目的是给后现代这种意识形态去魅,从而能够揭示出全球化与资本的本质联系。

作为历史学家,德里克强调从历史角度理解全球化,把当前的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sup>①</sup>所谓“资本主义的全球抽象”就是说当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资本主义从地方走向了全球,形成了新的霸权形式,即跨国资本霸权,德里克重点分析了这一新的控制和支配形式。跨国资本依靠跨国公司的灵活扩张将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扩展到更广地域,不断改造、同化、吞并地方性、民族性文化,跨国资本霸权就是以这种灵活、隐蔽的方式实现着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扩张。德里克指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通过重组全球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政治剥削和边缘化形式。在当前,集中表现为跨国工人阶级的不平等和压迫,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地方的边缘化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等。德里克对资本主义“全球抽象”性质的分析极为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全球化的性质,而他对跨国资本霸权所导致的新型压迫关系的指认也十分准确有力。

哈维则侧重于从资本积累的空间生产与地理扩张的角度来解读全球化。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采取空间修复策略来为资本积累开拓国外新的空间以解决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在资本不断向外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全球化随之发生了。“‘全球化’术语的兴起所预示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使许多关于‘自然’地理单元——资本主义历史轨迹就发展于其中——的假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sup>②</sup>在资本积累动力的推动下,不同地理空间利润率的巨大差异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展

①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1.

②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开激烈竞争,空间的地理界线不断被打破,随之带来的结果是地理上的分散和生产体系的分裂,形成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哈维指出,当前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方式进行掠夺和破坏,不断加剧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全球空间结构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激烈矛盾和对抗。

凯尔纳对全球化的分析与其“技术资本主义”理论是一致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是凯尔纳对新技术革命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作出的理论回应,其核心思想是试图把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对全球化的认识上,凯尔纳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将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革命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独立因素,忽视了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而经济决定论则忽视了技术革命给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新变化。因此,全球化应理解为“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其中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sup>①</sup>凯尔纳主张对全球化采取辩证态度,既揭露其资本霸权的一面,关注全球新型剥削和压迫,又要揭示其内涵的抵抗因素,强调全球化促进民主变革和重建社会的积极面。

奈格里和哈特把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视作帝国的全球性统治的确立。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如金钱、技术、劳动力、商品等越来越容易超越国界而在全球流动,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衰落,由此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奈格里和哈特将其命名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sup>②</sup>“帝国”虽然消除了国家、地区的界线,但并没有消除剥削和压迫,因为“帝国”仍然是通过维持、制造、扩大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来巩固资本在全球的支配力量。

① Douglas Kellner, *Globalization,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9/11 and its Aftermath*,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②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全球化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坚持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当前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广度(地理范围意义)上和深度(不断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上的扩散。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资本霸权,将人们的视线由发展中国家的被统治状况转移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以跨国资本这一新形式掩盖了原有的剥削和压迫形式。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全球化基本持批判态度,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论揭露全球化话语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 2. 后现代主义批判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和诘问以及对关于历史进步的宏大普遍叙事的否定,晚期马克思主义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原因。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所以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风格,恰恰相反,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在文化上的反映与集中表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哈维认为,灵活积累体制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来进行小批量生产满足了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规避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僵化和刻板,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它突出了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因而,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兴起与流行正是资本积累模式变迁的必然结果。在政治上,6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五月风暴”失败之后,政治左派将反抗的领域转移到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中,由此促成了后现代话语的产生和进一步蔓延。正如伊格尔顿所强调的:“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sup>①</sup>在哲学社会理论上,60年代法国学界开始流行语言学结构

<sup>①</sup>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主张用语言、社会结构、符码等描绘社会现象,从而消解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概念,拒绝一切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由此盛行。凯尔纳认为,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了后现代话语的诞生。可见,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同时也印证了詹姆逊的著名论断“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持两种不同观点:其一,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sup>①</sup>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其二,否认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后者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sup>②</sup>实际上,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把握取决于其是否承认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詹姆逊认为纵然后现代主义的元素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既相类同又相连续的,但“后现代”已然发挥了与“现代”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的典型特征是对商业文化的抵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导下,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全面深入文化领域,文化生产已经广泛并入商品生产。因此,詹姆逊认定当前时代是一个与先前时代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即后现代社会。伊格尔顿、哈维、凯尔纳等人虽然肯定后现代现象的真实存在,但都断言后现代社会并没有到来。凯尔纳说:“我们所处的当下时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转型时期,它还不允许我们明确地断言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充分发展的后现代性。”<sup>③</sup>哈维也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仍然

①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1页。

②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5页。

③ [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在发生作用,社会的剧烈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现代社会出现的征兆。

第三,后现代时间和空间的新变化。时空体验的不同构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重要界限,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后现代境遇下的时空状况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阐释。詹姆逊认为,历史意识的丧失成为后现代时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形象文化将传统的连续的时间观念组合或拼贴到当下的符号和形象文化产品中,使人们再也无法体验到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感觉,从而肢解了历史意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成为了包容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存在的标志。也就是说,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都被纳入到现时的空间,从而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而空间在形象文化的扩张中不断实现对时间的压制,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因此,詹姆逊指出,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化是时间性的文化,那么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化的文化,充斥于其中的是各种没有历史感的形象碎片。哈维则使用“时空压缩”概念进一步描述了这种新的时空体验方式。所谓“时空压缩”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sup>①</sup>哈维认为,后现代主义时期“时空压缩”大大加速和增强了,灵活积累体制使“时空压缩”呈现出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使永恒成为了奢侈品,人们生活在一个由短暂创造出来的形象世界中,时间和历史感消失了,人们完全沉醉于当下的体验,而不再去追问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问题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新变化所导致的时间空间化以及空间意识对时间意识的压制,这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系列特质。

第四,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所走的文化批判、知识批判路径不同,在对后现代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晚期马克思主义遵循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深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新变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性

<sup>①</sup>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页。

质作出了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揭露了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即后现代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逃离,恰恰相反,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是一种共谋关系。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历了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积累的变迁,以及新的时空体验方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sup>①</sup>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资本逻辑的总体统治之下,因此,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深刻变化的理论投射依赖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即资本市场逻辑,并借助于消费来支撑它的价值标准和取向。反过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支援下,无数个体在对欲望、感性和消费的追逐和满足中消解了主体,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扮演的是削弱政治左派力量的角色。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通过“消除一切差别,混淆一切等级,把一切使用价值的差别统统埋葬在交换价值的抽象平等性之下”,<sup>②</sup>因此,后现代主义表面上是激进的,本质上却是保守的,它非但不是一种真正反抗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激进话语,反而是全球资本运营的逻辑。

### 3. 解放政治学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女权、生态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政治不再关注经济问题,而是要表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对抗,它诉诸于话语政治、审美政治、身份政治、性别政治等微观文化政治斗争,进而遗忘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面对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种种幻象,晚期马克思主义清醒地坚持着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判断出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仍在继续,并且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呈扩大加剧之势。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诉求和解放政治的基本立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1页。

②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0页。

场,将探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政治道路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主题。

第一,革命主体力量的探寻。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阶级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全球无产阶级的形成。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资本在所有方面,尤其是在生产方面(‘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取得了超越民族性,跨过了地区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阶级。”<sup>①</sup>其二,全球无产阶级内部趋于分化。哈维指出,由于当代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和分裂使全球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阶级、种族、性别等各种关系相互交错,这使得种族、性别等差异因素在原来整齐划一的阶级标准中凸显出来。资本全球化所塑造的这种差异和多元化使越来越多的主体都遭受资本霸权体系的剥削和压迫,从而孕育了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多种主体力量。因此,在革命主体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必局限于阶级的中心地位,而主张多样化的主体力量,只要是反抗资本逻辑的力量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主体力量。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德里克强调妇女、弱势民族、少数民族以及被迫处于社会边缘的“第四世界”的土著居民都是不容忽视的革命主体力量。哈特和奈格里则用“大众”来指称革命主体力量,它不仅包括饱受资本奴役的传统工人阶级,而且还容纳了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学生、妇女、黑人、同性恋者等其他一切边缘人。

第二,革命策略的选择。革命主体力量的多元化决定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晚期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政治相结合,建立起全球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盟。由于革命主体包含众多差异和多元要素,不同主体从各自现实利益出发掀起了广泛的土著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是种族、文化、性别等领域的斗争,但生态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从根源上来看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各种群体和个人都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一事实提供了把无数受压迫社会群体团结起来的根本性的共

<sup>①</sup>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同支点。”<sup>①</sup>也就是说,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把各种目标相异和各种特殊利益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对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分裂和瓦解,从而壮大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需要强调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策略上虽然不主张单一、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但始终强调宏观政治和阶级政治的主导地位,强调总体解放目标的不可动摇性。建立联盟政治的目的就是将各种局部的、分散的微观领域的抵抗统一起来,使之服从和服务于实现无产阶级总体解放的目标。

### 三、如何认识和评价晚期马克思主义

晚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后现代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不赞同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判断。基于这种认识,他们重申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重新面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具体而言,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了一套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构架,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理论具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并把它作为理论前提一以贯之。他们严格恪守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范式,把它运用于文化、文学、空间等研究领域,进行了新的时代解读。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就是关于历史总体发展变化的结构理论,他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态势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等理论,将生产方式理解为“历时结构共存”,既重视生产方式的历时演进,同时又重视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模式中各层次之间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时发展的视角,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演进划分为三个依次更替的阶段,即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文化上的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全球形式的跨国资

<sup>①</sup> [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

本主义——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时期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各层面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中介性,社会发展不再是由经济关系单一决定的,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多元决定,因此詹姆逊强调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总体来进行考察,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的总体化力量。詹姆逊对“生产方式”范畴的重写既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局限,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性地位的强调。

哈维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积累理论的空间重构上。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问题,哈维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从“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与空间修复”、“用时间消灭空间”、“对外贸易与开辟资本积累的新空间”三个方面对空间生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揭示出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关系,即空间生产既是资本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也是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必然结果。哈维对空间生产的分析与批判,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而且阐发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空间向度。

德里克·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则侧重于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变化。德里克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跨国公司为生力军的“弹性生产”。跨国公司的弹性生产既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又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非资本世界、强大资本对相对弱势资本的剥削。哈特和奈格里则强调“新帝国”时期,提供服务和掌握信息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因而那些仍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甚至是农业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和地区被迫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信息经济之外,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边缘。同时,信息经济催生的生产网络模式培养了超越民族国家传统疆界之上的跨国公司。可以看到,德里克和哈特、奈格里都认识到了当前资本主义以跨国公司这一新的权力形式继续推行着资本霸权,它是全球不平等和新的两极分化的根源。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和新发展的分析,晚期马克思主义认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只不过是具体形式上的变化,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发展,本质上仍屈从于资本逻辑。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论是“弹性生产”,亦或是“空间生产”都必须把它看做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战略变化,是马克思定义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简单的再组合。正是因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晚期马克思主义才能拨开当代资本主义令人眼花缭乱的层层迷雾,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仍然是在资本逻辑的唯一统治之下,而且这种统治还在不断深入和强化。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强有力地批判了各种后现代话语脱离资本逻辑抽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弊病。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晚期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后现代背景中存在和发展的,它在反对后现代话语以断裂、不确定性方式对社会的探讨,反对后现代理论对宏大叙事的拒斥的同时,试图以兼容后现代问题的方式来寻找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这一理论倾向突出反映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打通现代性——后现代的主体政治来满足当代的后现代诉求。也就是说,晚期马克思主义认可后现代主义对心理、种族、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强调与重视,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转化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主张将微观和宏观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在总体解放的目标下综合各种局部性和可能性的政治斗争,将自身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可见,晚期马克思主义兼具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这使其理论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另外也说明具有一定的折中主义倾向。在探讨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人们改变现实生活状态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策略,而是强烈地坚持了乌托邦想象。他们虽然提出了将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组织起来的革命策略,但由于这些权力表现为阶级、种族、生态等多种具体目标,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集合各种特殊利益是无法克服的难题,所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以乌托邦理想来描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詹姆逊的认知测绘理论、哈维的辩证时空乌托邦以及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理论、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理论都难以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现实的落脚点。

## 参 考 文 献

### 一、中文文献

#### (一) 中文著作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2.《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4.[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钰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 5.[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6.[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7.[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 8.[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 10.[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11.[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王民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12.[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 14.[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15.[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 16.[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17.[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 18.[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19.[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 20.[英]大卫·哈维:《资本之谜》,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 21.[英]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王志弘译,台湾群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22.[英]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议》,王志弘、王玥民译,台湾群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23.[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24.[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 25.[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2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 27.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28.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29. 蔡禾、张应祥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0. 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31. 董慧:《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7》,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32. 冯雷:《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33. 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34.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35. 付文忠:《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6.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37. 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8.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
39. 刘森林:《辩证法的社会空间》,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0. 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1. 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2. 夏凡:《乌托邦的困境中的希望》,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43. 夏铸九、王志弘主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大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明文书局 1999 年版。
44.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5.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46. 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47. 王雨辰:《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48.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49.余源培、吴晓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50.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51.衣俊卿:《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

52.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53.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54.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5.张一兵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6.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

57.赵光武主编:《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西苑出版社 2000 年版。

58.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59.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

60.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版。

## (二)中文论文

1.[英]大卫·哈维:《列斐弗尔与〈空间生产〉》,黄晓武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 年第 1 期。

2.[英]大卫·哈维:《大卫·哈维谈资本的逻辑与全球金融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0 年第 1 期。

3.[英]大卫·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 4 期。

4.[英]朱迪·考克斯:《如何理解当前阶段的帝国主义——评〈新帝国主义〉等四本著作》,王占宇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4 期。

5.蔡运龙:《大卫·哈维:地理学实证派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中华读书报》2002 年 5 月 29 日。

- 6.车玉玲:《对空间生产的抵抗》,《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 7.陈忠:《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 8.陈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历史与可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 9.程世波:《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论戴维·哈维对空间问题的探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 10.崔丽华:《时空之间——哈维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索》,《燕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 11.段忠桥:《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 12.董慧:《空间、生态与正义的辩证法》,《哲学研究》2011年第8期。
- 13.董慧:《当代资本的空间化实践——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哲学动态》2010年第10期。
- 14.董慧:《大卫·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述评》,《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
- 15.董慧:《现代空间维度的后现代想象——大卫·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探究》,《哲学动态》2009年第8期。
- 16.董慧:《何种后现代——大卫·哈维对后现代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与建构》,《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 17.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18.冯建辉:《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浅析》,《唯实》2010年第7期。
- 19.高峰:《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 20.顾朝林,李平:《哈维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9日。
- 21.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学海》2005年第6期。
- 22.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06年第2期。

23.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4.胡大平:《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空间来探寻希望》,《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25.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26.胡大平:《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7.黄少华:《哈维论后现代社会的时空转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3期。

28.李春敏:《城市与空间的生产》,《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29.李春敏:《资本积累的全球化与空间的生产》,《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

30.李春敏:《近年来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研究综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1.李秀玲:《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思想》,《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2.李秀玲:《“空间生产”思想:从马克思经列斐伏尔到哈维》,《福建论坛》2011年第5期。

33.李春火:《大卫·哈维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学术界》2010年第12期。

34.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35.刘怀玉:《透视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课题》,《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

36.刘元琪:《全球化和个体——评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5期。

37.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38. 强乃社:《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意义》,《现代哲学》2011年第3期。
39. 钱振明:《走向空间正义:让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40. 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41. 孙江:《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现实语境及其矛盾分析》,《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2. 孙江:《空间生产的交往实践唯物主义建构》,《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3. 孙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拜物教批判》,《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44. 孙来斌、颜鹏飞:《依附论的历史演变及当代意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45. 田世锭:《哈维:处在“领土逻辑”下的新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1月13日。
46. 田世锭:《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探析》,《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
47. 田毅鹏、张金荣:《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8. 唐旭昌:《大卫·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9. 唐旭昌:《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
50. 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51. 汪行福:《乌托邦精神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新反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52. 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问题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53. 吴敏:《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
54. 吴瑞财:《全球化:现代性研究的空间转向》,《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5. 魏开、许学强:《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范式述评》,《外国城市》2009年第4期。
56. 阎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兼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57. 仰海峰:《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58. 仰海峰:《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从马克思到哈维》,《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59. 闫军印:《马克思空间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1期。
60. 姚顺良、夏凡:《卢森堡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模式创新及其哲学意蕴》,《学海》2009年第2期。
61. 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62. 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63. 张应祥、蔡禾:《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1期。
64. 张应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5. 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述评》,《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66. 章仁彪、李春敏:《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
67. 庄友刚:《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68. 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 二、外文文献

1. Castree, Noel and Derek Gregory,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2. Castells, Manuel,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2.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3.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7. David Harvey,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1990.

8.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6.

9. 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an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2003.

12.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15.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Verso London, New York, 2006.

16. David Harvey, *Social processes and spatial form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problem of urban planning*,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25, 1970.

17. David Harvey, *What kind of geography for what kind of public policy?*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63, 1974.

18.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sm theory*, Antipode, 7(2), 1975.

19. David Harvey,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 1978.

20. David Harvey,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unten and Marx*, Antipode 13, 1981.

21. David Harvey, *The space-econom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 Marxism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2, 1982.

22. David Harvey, *O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geography: a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anifesto*,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36, 1984.

23. David Harvey,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D. Gregory and J.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1985.

24. David Harvey, *Flexible accumulation through urbanization: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in the American city*, Antipode, vol. 19 1987.

25. David Harvey, *The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lif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3, 1987.

26. David Harvey,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1989.

27.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1992.

28. David Harvey,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8, 1995.

29. David Harvey, *Marxism, Metaphors, and Ecological Politics*, Monthly Reviews, Volume 49, Number 11, April, 1998.

30.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class pow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8.

31. David Harvey, *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 2007.

32. John Paul, III Jones, *David Harvey: Live Theory*, Continuum, 2006.

33. Paul Walker Clarke, *Book Review of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st: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 44, No. 3, 1991.

34. Smith Neil,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94.

##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我之所以选取大卫·哈维作为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缘起于四年前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来我院举办的一场学术讲座。那场讲座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当时的我对“空间”的理解仅仅囿于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概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怎么会和空间扯上关系十分不解。带着这份疑惑和好奇我认真聆听了讲座，讲座尚未结束，我已经兴奋不已，空间理论独特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前沿性深深吸引了我，这不正是我心中苦苦寻觅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吗？在强烈的理论兴趣的支撑下，我经受住了写作过程中的痛苦和煎熬，终于有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

在本书即将交付出版之际，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倒不是论文写作的艰辛过程，而是一张张熟悉而值得我深表谢意的面孔。首先感谢我的导师王雨辰教授。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整整13年求学生涯，最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追随恩师王雨辰教授，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深深启迪和感染着我，我的每一步成长，每一点进步无不浸润着导师的心血与汗水。博士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导师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和力量。当初论文选题时，对于是否有研究价值和能否驾驭，我十分没有把握。王老师就认真研读了哈维的著作，兴奋地告诉我这个人物很有研究意义，并帮我购买复印了相关资料，鼓励我认真做下去。论文写作期间，正值王老师在北京学习，他仍时常询问敦促我的论文写作进展，和我一起分享写作过程中的每一点欣喜和苦恼。每写完一章，他都要我及时寄送给他批注修改，对文章的框架、材料的运用、措辞的斟酌均一一悉心把关，博士论文的完成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智慧。去年，王老师不幸生病入院，在他

住院和身体康复期间,他仍始终牵挂着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一事,令我深受感动。这本书虽然如我性格一般中规中矩,不温不火,远未达到王老师所寄予的充满激情的期望,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认真思索和诚实运用理性的结果,这也算是对老师的些许回报。王老师不独学问做得好,更是至情至性至真之人,师生情谊是他最为看重的,平时对学生的生活、工作都极为关切,嘘寒问暖,让人倍感幸福。学业之外,他与我们学生谈人生、谈生活、谈情感,告诉我们人生智慧和生活哲学,使我们获益良多。师恩如山,唯有铭记在心以表谢意。

本书得以完成还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的刘怀玉教授和胡大平教授。感谢刘怀玉教授引领我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学术道路,感谢胡大平教授不吝赐教,亲手馈赠给我宝贵的学术资料,如果没有两位前辈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恐怕我的博士论文是无法完成的。同时感谢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湖北大学杨鲜兰教授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可风教授、陈食霖教授、龚天平教授、吴宁教授等在博士论文开题、答辩和评阅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意见和热诚鼓励,在此对各位老师表示真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我在财大求学十余年间的诸位师友,请恕我不再一一提名,你们的关心、支持与友爱予我温暖,更促我前行。

博士四年是我人生中最富有意义的一段历程,因为我收获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成果:一是博士论文,二是聪明漂亮的女儿。作为母亲,我不愿错过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唯愿与她时刻相守。但为了完成学业,我不得时常离开她,而每当我写作陷入郁闷苦恼时,回想起她那可爱的脸庞和稚嫩的声音,一切劳累和苦闷便顷刻间消逝了。上天是如此眷顾我,不仅赐予我一个精灵可爱的小天使,更有关爱我的家人和同事始终在背后默默地支持鼓励我,使我能够兼顾学习、工作和女儿,顺利完成博士学业。感谢哲学院的领导和同事给我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在工作上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感谢我的父母、公公婆婆毫无怨言地帮我养育女儿,操持家务,使我能全身心投入论文写作而无任何后顾之忧。感谢我的先生姜曙光,与你的倾诉交流总是我最好的心灵慰藉。尽管这本书家人不一定能看懂,但我唯有以此书表达对他们一路支持与奉献的感恩之情。

回首论文写作的几百个日日夜夜可谓是冷暖甘苦纷呈,既有艰辛的理

论长途跋涉,也有绵薄收获的短暂喜悦。当书稿终于完成之时,欣喜之余却又忐忑不安,受限于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对于本书中存在的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各位师长、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3CZX002)和2013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722013JC005)的项目成果,并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大卫·哈维的历史 - 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SS号 = 13596852

作者 = 张佳著

出版信息 = 张佳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 2014.06 | | 978 - 7 - 01 - 013376 - 8

出版社 = 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014.06

页数 = 253

ISBN号978 - 7 - 01 - 013376 - 8

定价 = 49.00

中图法分类号 = B019.1

内容提要 = 大卫·哈维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书是对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总体考察和评析。本书从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缺失原因的探寻入手，分析了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作出的“过程辩证法”的解读。以“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哈维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地理景观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本书将哈维的历史— . . .

参考文献 = 张佳著 .

大卫·哈维的历史 - 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06 .

试读地址 =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129144&d=920054555A0A6A0D2EB71246FFB139DE>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 王雨辰

导论

第一章 哈维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 一、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弹性”生产方式的转换
- 二、全球化语境中空间问题的凸显
- 三、西方社会城市危机的出现

第二节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 一、社会理论空间维度缺失的原因
- 二、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理论和时代背景
- 三、社会理论空间转向中的哈维

第三节 哈维空间理论建构的思想来源

- 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 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对哈

维的影响

- 三、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 四、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及其对哈维的影响

第二章 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第一节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缘由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
-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二节 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

- 一、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 二、哈维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路径

第三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

-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 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

础

第三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

第一节 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框架

- 一、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理论来源——马克思的资本积累
- 二、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切入点——使用价值
- 三、哈维资本积累理论的主题——空间生产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与危机

- 一、资本初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 二、资本次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 三、资本第三级循环中的矛盾与危机

理论

	第三节	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
		一、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地理集聚与分散
		二、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
		三、全球空间的不平等结构体系
第四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
	第一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
		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和矛盾
		三、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阶级斗争
	第二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批判
		一、全球化空间与资本积累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三、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
	第三节	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空间的批判
		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二、灵活积累体制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三、后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
第五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放政治理论
	第一节	当前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挑战和困境
		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西方左翼理论中“阶级政治”退化的趋势
		三、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与竞争
	第二节	哈维解放政治理论的核心理念
		一、正义的理念
		二、差异化的主张
		三、生态的视角
	第三节	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探寻
		一、替代性方案的设想——辩证时空乌托邦理想
		二、替代性方案的策略
		三、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实现途径
第六章		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
	第一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定位
		一、哈维与晚期马克思主义
		二、哈维与后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
		三、与苏贾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异同的辨析
	第三节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得失
		二、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结语		
附录一		大卫·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综述

附录二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后记